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1995年资助出版

吴启权 著

长征在川 大事记要

1935年1月—1936年8月

6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是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

—谢世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935年1月—1936年8月)

长征在川 大事记要

吴启权 著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王华光

封面设计:文小牛

长征在川大事记要

吴启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激光照排部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地矿局测绘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62千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220-03067-3/K·407 印数1—1000册

定价:13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谢世杰

6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是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多次在四川境内召开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两年。其中，在四川经历的时间达一年零八个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途经四川60%的县，在四川境内成功地实现了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和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创举和人间奇迹，都发生在四川境内。红军在四川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转战，恶劣的斗争环境，敌我力量的生死搏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蒋介石为了追堵、“剿灭”红军和乘机打进四川、控制西南，除派“参谋团”和数万嫡系部队入川之外，仅1935年就坐镇四川150多天，亲自扮演战场指挥官的角色。这样，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反革命的总头目都在四川。另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主要是在懋

功会师后于四川境内发生；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从长征的角度看，也主要发生在四川。红军要和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斗，要和数倍于己、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斗，还要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其局面之严重，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罕有其匹的。

长征红军在四川，主要是转战于四川盆周和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在居住着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四川，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以后更加成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在巴山蜀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唤起了四川各族人民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全川各族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四川儿女参加红军，数以万计的四川儿女英勇捐躯，长眠在长征路上。

红军长征在四川，留给了四川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全川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发扬长征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长征在川大事记要》的作者，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征在川历史的研究。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地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目 录

- 1 写在前面的话 谢世杰
- 1 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综述)
- 37 长征在川大事记要(1935年1月—1936年8月)
- 221 答王怀之和盛明同志
——兼谈长征在川历史的研究

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 光辉的篇章(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光辉历程,在整个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中,中共中央长征的战略方向有九个月是四川或包括四川。中共中央在四川境内多次召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和其它重要会议。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在四川经历的时间最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途经四川近70个县,加上川陕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川属各县,共100多个,占当时四川县份的60%以上。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实现了两次成功的会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主要是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于四川境内发生的;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从长征的角度来看,也主要发生在四川。党和红军在居住着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四川,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展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雏型的政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红军长征的许多奇迹,部分或全部发生在四川。红军长征促进了占

全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各民族人民的大觉醒，四川各族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蒋介石为了追堵、“剿灭”红军和打进四川、控制西南，除派“参谋团”与“中央军”入川外，1935年坐镇四川150多天，亲自扮演战场指挥官的角色。这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中国反革命的总头目都在四川。红军长征在四川，外有强大而凶恶的敌人不惜血本追堵，内有错误路线干扰破坏，还有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其局面之严重，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在人类活动史上是罕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指挥红军将士，终于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四川境内把红军“根本歼灭”的美梦。红军长征在四川，是气势磅礴的长征史诗上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是奉献给整个人类前进的瑰宝——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伟大的长征胜利半个世纪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把全国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建立在四川。这不仅是四川各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四川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相当重视的战略要地

享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周围有巴山秦岭、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环绕，长江及其支流流贯其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素称战略要地。

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发动和领导了苦难深重、具有强烈革命性的四川人民进行了70多次武装斗争。中央红军长征时任总参谋长、先遣司令的刘伯承，早年又曾指挥了由中共四川省(地)委领导

的泸(州)顺(庆)起义。泸顺起义声势浩大,威震全川,坚持了半年之久,可以算是先遣司令刘伯承在四川的一次大练兵。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年底入川后,逐步建起了总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有23个县市苏维埃政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当时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因此,“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①在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前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中也强调:川陕根据地“给了中央红军胜利以有力的配合”。^②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存在,不但对于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对于全中国的革命是个很大支持,而且还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在包括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在内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六军团其时正在这里创造赫赫的战绩,给人民以希望,给中央红军以鼓舞和配合。

同时,在全国各省中,天府之国的四川不但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粮秣补给,而且可以保证最大数量的兵源。

另外,从民国以来到红军长征前的20多年中,实行“防区制”、各据一方的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大小战争达470多次,弄得民不聊生。而蒋介石则早就觊觎着天府之国。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前,蒋介石的势力正准备伺机打进四川,消灭异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48—274页。

②《红色中华》第229期,1934年9月4日出版。

已，控制西南。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就曾利用过四川军阀的矛盾，进行长征的中央红军也可以把握和利用反动营垒内部蒋介石和排外性很强的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战略要地四川更加显山露水，更加显示了它得天独厚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战略方针，是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才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察觉红军要到湘西的前进方向以后，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待红军去钻。而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然机械地坚持去湘西的原定计划。当红军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城以后，临时决定在通道举行讨论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中央会议。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建议放弃北进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前进。李德在他写的《中国纪事》中承认，在这次会议上，“我提请大家考虑……转向北方（湘西），与二军团联系。……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但是毛泽东又“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四方面军）会师”。^①于是，红军自通道改变了方向，折向贵州前进。虽然如此，毛泽东在通道的建议并没有说服李德等人真正解决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①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125页。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局以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①这样，四川第一次被正式提到中共中央长征战略方针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以后，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的决议不但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战略方向的决定，而且更具体化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②

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袭占遵义城。红军总政治部在1月8日发布的《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中，根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创造川贵新苏区”的口号。^③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1月14日）发布的《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中还说：“党的当前任务是在四川、贵州广大区域中与敌人主要是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争取这一次战斗的完全胜利，……来创造四川与贵州的新苏区。”^④中央红军长征以后、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都在其确定的战略方针中包括了四川，那么，遵义会议以后呢？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也提高了四川在中共中央关于长征战略方针上的地位。四川这个战略要地，在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负责人的心目中，是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36页。

②同上，第441页。

③《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30页。

④文电存中央档案馆。

更加重要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陈云，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所拟的报告提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这样写道：“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陈云原注）、经济上都比黔北好。”^①遵义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聂荣臻后来根据文献资料回忆说，刘伯承和他在遵义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向”时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好得多。……一来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住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②

遵义会议另一位参加者、军委主席朱德根据会议决定，于1935年1月16日24时发出了准备渡江进入四川的第一封电报《致各军团电》，说这是“进行新的布置”。^③

为了贯彻遵义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又于1月20日发出了《关于渡（长）江的作战计划》。计划传达了新的党中央不但要渡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而且要“争取四川赤化”的精神。

中央这些决议的安排都说明：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面临如

①《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1—2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第248页。

③文电存中央档案馆。

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问题。黔北地处两江，回旋地域有限，对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的困难。而四川不但兵员充足粮食丰富，军阀内部矛盾（四川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四川军阀内部的矛盾）异常尖锐，特别重要的是中央红军在撤离了全国第一大苏区以后，最好的依托应该是川陕根据地这个第二大苏区。中央红军如果进入四川，协同红四方面军作战，在川西地区转入反攻，既可向东南发展，赤化全川，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可以北出陕甘，继而东指晋、冀，瞰视中原，有利于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中国革命的大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方针，加之中共中央根据19日夜接到红四方面军关于敌人情报的消息，便于1月22日发出《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指出：“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为了使四方面军能配合中央红军的入川战斗，进行“协同作战”，要其“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① 四方面军接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是当务之急，决定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②

还在中央1月22日致四方面军这封电报发出之前，中央红军以北渡长江进入川西为目的，已于1月19日从遵义地区向川黔边境北进。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合股”，于是急电驻川参谋团和云、贵、川军阀部队及尾追中央红军的薛岳部队，要各部队集中兵力向红军压去。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头子刘湘为了阻止红军北渡长江，不

①《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22页。

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4页。

惜血本派出舰队甚至租用商船,沿长江布防,封锁渡口。仅川南地区的川敌兵力,刘湘第一次“截堵”就拟用30个团(实际有28个团)投入布防,第二次则调动了37个团。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参战的红军部队奉命撤出。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踏上了四川的土地,进入古蔺、叙永地区。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红军逼近,红军欲渡长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于2月7日发出了《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为了使广大指战员了解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于2月16日在四川古蔺白沙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敌情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①

中央红军于3月21日晚和22日从四川古蔺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第四次渡赤水河,暂时离开了四川。

虽然中央红军暂时离开了四川,但中共中央所制定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并争取四川赤化”的战略方针并没有改变。当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在离开四川30多天、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以后,又挥师四川了。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说:“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

^①《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24页。

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① 四川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的主要战略方向，这不但是一个“根本方针”，而且还有其政治意义。为此，中革军委还在这一《指示》中专门强调要向广大干部战士解释“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而转入川西的战略方针是遵义会议时已确立的，因此红军总政治部于4月30日在《致各军团政治部电》中指出：“渡江转入川西之基本方针，应向干部及战士进行广大的解释，……这个方针已在遵义会议时确立。”^②

对于中共中央和红军转入川西的战略意图，蒋介石方面和四川军阀也已探知到了。他们在《“匪情”判断》中写道：中央红军“今已北越乌江，似将就其以北地区略事整顿后，转趋泸州、叙永沃野地区，攫取川军饷源，遂求其物资上之满足”，“期与川北徐向前股”、（鄂湘川黔）“萧（克）贺（龙）股”，“势成鼎足”，“果若遂其企图时，即以成都为中心，其军事转向川东谋开拓，以政治向西求发展，妄冀掌握川局，树立通毒国家民族之基础”。^③蒋介石本人当时在成都发布的《劝告绅耆服务桑梓，协助剿匪，拯救民众书》中说：“朱毛溃奔川南”，徐向前部“倾巢西窜，察其企图，实欲会股川西，另创苏区”。^④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参谋团大事记》中也有这方面的佐证：“赣闽边区之朱德毛泽东股，为国军所破，突

①《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48页。

②文电存中央档案馆。

③《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勘乱》（上）第23页，台北1982年8月出版。

④周开庆：《民国川事记要》第586页，台北1974年12月出版。

围于赣南，其目的在西窜四川而盘踞之。”^①既然四川可能会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根据地，那么，“攘外必先安内”、“聚歼”红军是首要任务的蒋介石，也必须把四川作为他反革命的战略大本营。何况蒋介石早就窥伺着四川，完全可以借追堵长征红军之机打进四川。于是蒋介石不但派参谋团和“中央军”入川，还于1935年3月2日亲自出马坐镇四川，一年中在四川共住150多天（加其在滇、黔的日子，达200多天），把四川作为其反革命的战略大本营。蒋介石为了在四川“根本歼灭”红军，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入川时，调动了“合计不下20万人”^②的兵力对付中央红军的3万人（以后的百丈关战斗，仅川军就动用80个团去对付红军的15个团）。川军“通计约合340团，兵量之多，几达全国现额三分之一”。^③蒋介石还嫌兵力不足，除了“中央军”薛岳部3个军8个师约5万人驻在四川之外，以后为防红军从四川进出甘肃、青海、新疆，蒋介石又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包括胡宗南部和青海“马家军”在内的所有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再以后，为了阻止红军从四川西北部北上陕甘，蒋介石又从豫皖边调来“中央军”第三军王均部入甘肃，在夏河两岸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来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到静宁、会宁等地，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成功，第二次开进四川来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召开。会

①贺国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268页。

②《刘湘部在川黔边防堵红军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111页。

③贺国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456页。

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继续北上，到川西会合四方面军。关于这一点，在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党的总责）的夫人刘英的《长征琐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会理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①

在中央红军过了大渡河占领天全后的第二天（6月8日），中央及军委发出指示，提出今后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取懋功、理番”。（因条件限制，中央红军当时还不清楚，6月8日这一天红四方面军已占领懋功，而理番则早在6月3日就被红军占领。）中央及军委在天全发出的指示还强调：中央红军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②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于6月12日在夹金山靠懋功达维一侧山下木城沟一个叫作磨盘石的地方互相“意外会亲人”。6月13日，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其中强调了“解释两大主力的会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③一直到这个时候，“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的提法和遵义会议后“转入川西创立根据地，并争取四川赤化”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意义非常重大，改变

①《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0期第20页。

②《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5期第17页。

③文电存中央档案馆。

了川西北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分割围歼红军的阴谋，为两支红军在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随部队越过大雪山夹金山以后，才了解到懋功等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纵横千余里”的“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至于康区，“情形比懋功还要差。”^①都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不具备建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关系到全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据地的条件。6月16日，中央改变了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这一“总方针”^②。同日发布的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休的规定》也指出：要“报告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川陕甘的意义。”

这样，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改变。不过，当时中央考虑的川陕甘方针，仍然是以四川为中心来发展。如果以四川为中心的发展受到限制，则以陕甘为机动地区。总政治部根据中央这一考虑，于6月18日发布了《关于赤化川陕甘及今后战斗任务的解释大纲》，明确指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③

为了统一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修订和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中央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说：“我们

①《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14页。

②《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14页。

③《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18页。

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这样，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最后确定下来了。与前不同的是把“以四川为中心、以陕甘为机动地区”改变为“以甘南为突击方向”，“而在大、小金川流域只留下少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这是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改变。

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局沙窝会议上，中央除重申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之外，还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川陕甘根据地将“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是“鼓励全中国被压迫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和“散布革命种子”的“发源地”。^②

四川虽然是战略要地，但毕竟比陕甘要远离抗日前线。此前，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出卖华北大部分主权的《何梅协定》已达成。中共中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政治形势，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的战略位置，为了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的口号。

但是，张国焘却在这以后不久，提出了西出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的主张。在中央召开的毛儿盖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东的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8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89—491页。

阎很难来，而北靠黄河，既便于作战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但若向西到青海、新疆，则是退却，对红军也很不利。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对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川陕甘方针作了一些具体调整。但是，张国焘仍然抗拒中央指令，并命令红军南下，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只好率领部分红军于9月10日凌晨离开巴西地区，离开四川。在离开四川当天发布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又特别强调：“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是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①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甘边境的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中央在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作了最坏的打算，以壮大力量为考虑的重点，不得不放弃原定战略方针，提出了经陕北、甘东北向苏联靠近以便获得援助的方针。^②这以后，中央率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占领哈达铺。红军在抵达榜罗镇时，从当地小学提供的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9月28日，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作出把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

综上所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有九个月是四川或包括四川。

不但这样，而且在中央红军已经结束长征四个月以后，当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严重碰壁，被迫于1936年2月撤离天全、芦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对四方面军仍然极为关怀，并于2月4日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504页。

^②参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34页。

致电四方面军，对今后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方案之一仍然在四川：“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红二、六军团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呼应。”^①

由此可见，四川在长征史上，是中共中央相当重视的战略要地。

二、中共中央多次在川召开重要会议； 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主要在川发生

中共中央在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年中，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局会议和其它重要会议。四川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政治局会议开得最多的省。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局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之外，还召开了其它一些重要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5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川南石箱子（当时属古蔺县、建国后划归叙永县辖）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石箱子会议共有三个议题，一是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二是研究仍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的工作问题，三是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撤换党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

2月15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在古蔺县白沙召开会议，拟定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作出了停止李德的军事指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78页。

挥权的决定，通过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红军飞夺泸定桥以后，中央召开了泸定桥会议，决定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和派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组织这两件事。

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政治形势和组织问题。

7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讨论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经验教训。

8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和宣传问题。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教育、宣传和青年团等问题。

9月2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

9月8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性会议。会后，中央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7位与会者的名义发出了命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

9月9日夜，鉴于张国焘不但抗拒中央指令，还命令红军南下，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牙弄三军团驻地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磋商，决定先行北上。

另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又主要是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在四川境内发生的。这就使党和红军不得不在对付数倍于己的敌人“追堵”、对付雪山草地恶劣的

自然环境的同时，与张国焘进行斗争。

众所周知，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不但是从四川开始进行的，而且从红军长征的角度来看，这场斗争也主要是在四川境内发生的。

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于5月18日在茂县召集高级干部开会。会后张国焘宣布成立了内设政治局的“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张国焘等49人组成的“西北联邦政府”，并以此名义，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文告。^①

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才几天，张国焘就同中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方针，并强调两个方面军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这是对仗势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张国焘的当头一棒。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向党伸手要权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并没有死心。两河口会议后，他玩弄阳奉阴违的手段，重新提出川康计划，并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他这样作，是造成中革军委按照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

1935年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地理番县杂谷脑。张国焘竟在此前后，背着慰问团召开“川陕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和其它一些会议，片面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欺骗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还非法“审查”中央的路线，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

^①文告存军事科学院。

接着，张国焘两次策动部分人以“川陕省委”等名义分别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建议”由他任军委主席。虽然早在6月29日，中央常务会议已经决定增补他为军委副主席，但权欲熏心的张国焘并不满足。在他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同时，又于卓克基秘密杀害了要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中共中央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同时，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遂任命张国焘为红命总政委。

为了明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解决《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后造成的危局，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张国焘也参加了沙窝会议，不得不表示同意继续北上。但是，他并不真正拥护北上方针。沙窝会议后不久，他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新疆地区逃跑的主张。因沙窝会议而表面上趋于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再次出现了分歧。中央为了使部队向北行动迅速，为了有利于北上方针的执行，改变了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并于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方针的执行，中央召开了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定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照样拒不执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中央的指令，坚持其西进或南下的方针，加剧分裂党和红军的步骤。后来，他又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央只好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中央于9月12日在川甘边的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指名批判了张国

焘反对中央、退却逃跑、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指出了他犯错误的历史根源，表明了党的原则立场。

中共中央离开四川以后，张国焘先后发布了《大举南下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和原属一方面军建制的五、九军团南下，公开分裂红军。许多在天寒地冻中南下的红军战士，被草地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

还在9月13日，张国焘就于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阿坝会议”），攻击中央方针是“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企图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对拥护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等进行围攻。朱德、刘伯承等人和以徐向前为代表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央离开四川以后，在十分特殊、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与张国焘进行斗争。这些斗争，使红军长征在四川更具曲折性复杂性。

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松岗卓木碉另立中央，使其分裂红军的反党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还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①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行为，朱德、刘伯承等曾表示坚决反对，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

12月5日，张国焘又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和毛泽东，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0页。

……你们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就这样，张国焘从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发展、激化到路线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尖锐对立；从抗拒中央指令到公开另立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反党分裂红军的空前纪录。

还在中共中央离开四川的前一天（9月9日），中央在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和次日发出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就已经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南下是绝路”。^①中央这一预见的正确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张国焘南下后，虽然在战斗规模不是很大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击溃敌人6个旅，取得了胜利，但却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陷入了窘境。特别是在百丈关决战失利以后，南下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损失过半，只剩下4万多人，东进、南出又均不可能。张国焘南下方针严重碰壁。

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将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电告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芦山县任家坝开会，讨论瓦窑堡会议的要点。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对于服从中央决议的态度非常坚决，骑虎难下的张国焘这时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不得不同意北上方案。但是张国焘所讲的北上，并不是指北上与中央会合，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企图保存他的实力地位，以便继续与中央分庭抗礼。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504页。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取消“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的“一切中央”。过了两天，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和负党中央总责的张闻天也向张国焘发来类似的电报。

1936年2月上旬，国民党政府“中央军”薛岳部和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康地区^①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撤去。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仍不忘大搞反党分裂活动。4月1日，他在道孚召开的机关活动分子会上，继续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是左倾掩盖下的退却路线”，并打肿脸充胖子吹嘘他“南下的胜利和意义”。到了5月21日，张国焘还以第二“中央”名义印发《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他在大纲中虽然继续鼓吹“反对毛、周、张、博机会主义”，继续吹嘘“南下反攻的胜利”，但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②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斗争，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从对张国焘日益增长的

^①红军长征时期没有西康省。西康省是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新县制”、实行“川康分治”时将原四川省西康督察区和四川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区（今雅安地区）、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今凉山自治州）合并，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虽然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当时宣统皇帝的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就奏请建省，但未遂。到了1914年，康定县以西被划为川边特别行政区，受四川省节制。1925年改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屯垦区。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西康政务委员会，准备于次年建省，也未果。1935年建置仍属四川省所辖的西康行政督察区，尚包括今属西藏自治区的13县和今属四川省的18县。红军长征时期，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2月2日公布了《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13条，同年8月该“建省委员会”才在雅安成立。

^②《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12—214页。

不满情绪到进行抵制、斗争，加上后来进入四川的以任弼时、贺龙为代表的二、六军团干部战士的共同努力，终于粉碎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红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从雪山草地共同北上，去陕北会合党中央的愿望。

三、四川各族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光辉业绩是各族人民的无价之宝

红军长征来到四川，把光明的曙光送到了土地面积占全国第五位的巴山蜀水，也唤起了人口占全国第一位的四川各族人民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因为红军长征在四川经历的时间最长，其“播种机、宣传队、宣言书”的作用就尤其突出。

长征红军在四川，一面执行频繁的战斗任务，一面积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其中，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大金省委（也称金川省委）、四川省委（也称川康边区省委），加上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建立、延续到长征以后很久的川陕省委，共计建立了4个以红军干部为主体的省委。另外，建立了3个省级苏维埃政府、两个省级少数民族共和国和近20个中共县委、近40个县的革命政权。随着地方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的建立，红军又在四川建立了升钟寺独立师、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绥靖回民支队、绥靖番民骑兵团和形式多样的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仅北川县苏维埃政府就建立了拥有3,200多名队员的11个游击大队。

长征红军在四川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也积极配合、支援红军长征。1935年1月，川军第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中共“军支”策动的嘉陵江防线兵变，有力地

策应了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中共阆（中）南（部）中心县委发动的升钟寺起义，一次就把1,500多人汇进了红军长征的铁流。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和长征红军并肩战斗，掩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1935年5月下旬，当中央红军进入冕宁县境后，中共冕宁地下党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赞许，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为了巩固和扩大冕宁地区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亲自做了加强党在冕宁的具体工作。以后，中央又留下100多名长征红军与冕宁地方武装合队。

红军长征在四川，全川各族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不仅八万多四川儿女长征前参加红军，扩大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在红军踏上长征路以后，四川至少有四万五千人参加了红军。建国后，经过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多次调查，一个人一个人进行核实，红军长征时期（不包括四方面军长征前），旺苍县有12,000多人、江油县有6,000多人、广元县有2,700多人、北川县有1,500多人、平武县有1,100多人参加了红军，古蔺、叙永、天全等县各有800多人参加红军，连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县越西和绥靖（当时总人口不到1万）也分别有800多人和750多人参加红军。数以万计的四川儿女血洒征途，骨埋青山，用鲜血和生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离开四川北上后，各类革命政权的干部、积极分子和游击队员被敌人残杀；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和流散红军，为了珍藏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又有无数各族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十多万人马，先后在四川一年零八个月，每天食用的粮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

以这样说：人民群众忍饥挨饿腾出来的粒粒米粮，是四川各族人民支援长征的颗颗红心。

红军长征在四川，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光辉业绩和卓著功勋，是留给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之宝。由于红军长征在四川主要是战斗在四川盆地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仅以民族问题为例予以说明。

虽然党早期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但由于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前，党主要在汉区开展工作，民族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有的民族问题的主张也还来不及通过实践的检验，这正如长征红军当时在四川指出的：“少数民族工作是党当前的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番人区域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少的。因此，一直到今天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还是在从实际运用中求得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①而四川边陲居住着许多个兄弟民族，这也正如当年长征红军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指出的：“在四川全省居住的五千万人口中间，除汉人占最大多数外，还有藏人、回人、番人、苗人、保保等各种民族。”^②当时，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和充满了革命危机的地区之一。凉山彝族地区保存着奴隶制度，川西北高原（阿坝）和康藏高原东部（甘孜，当时的四川省西康行政督察区）两大藏区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岷江上游

①《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6页。

②1935年5月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

羌族聚居区保存着封建领主制度。这里社会形态不同，宗教信仰各异，阶级关系复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同一民族内部“打冤家”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反动势力“以夷制夷”的怂恿下愈演愈烈。四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是四川军阀事实上的禁区，而且对长征前还未正式打进四川的蒋介石中央政府也呈半独立状态。可是，这里却偏偏奇迹般地红军敞开了大门。数万红军在这里站住了脚，于困境中开拓了新的领域，为北上获得较长时期的休整。这是为什么？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党经过艰辛的探索，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由于长征红军在四川停留时间长，涉及区域广，又有长征入川前已经在其它省制定、实施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作借鉴，所以在四川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雏型，为后来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积累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宝贵经验。

首先，用马列主义作指导，以解放各族人民为宗旨处理民族问题。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不久，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因此，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沙窝会议还把“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作为政治局讨论、研究的七个大问题之一，而且提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①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推动全党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并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687—688页。

且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红军指战员根据沙窝会议的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解决与研究番民族问题。”^①

还在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第一次入川成立的川南特委（该特委主要负责人均由红军师级干部组成、直属中央）所制定的《川南劳苦大众目前斗争纲领》中，就已经提出：居住在川南的“苗、彝、僮、傜、瑶等弱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争取民族解放。”^②川南特委还在叙永县界首山帮助成立了四川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政权“苗民政府”。

在中央红军拟渡金沙江准备第二次进入四川时，中革军委在《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又特别要求各部队“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③总政治部1935年4月30日《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训令》中，也强调“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但是“使红军能顺利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流中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正因为争取了少数民族，所以为红军渡金沙江摆渡的36名汉、彝、傣族船工，仅靠几只小船，不分昼夜摆渡，用7天7夜就把红军大部队渡过了江，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敌人“追剿军”赶到金沙江边时，已是7天以后的事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地区以后，蒋介石曾试图

①1936年6月1日红四方面军红大政治部《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工作的宣传材料》。

②《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第24页。

③《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第48页。

动用十万兵力，利用复杂的地形，特别是利用特殊的彝情，策划其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妄想石达开覆军的历史在凉山彝族地区重演。红军一踏上凉山的土地，立即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以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明地解释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的各项政策。还“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让四川各族人民都了解。红军打开冕宁和越西两县的监狱，释放了数百名被关押的彝、汉族“换班作质，轮流坐监”的“人质”。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顺利打通了大凉山的道路，使红军赢得了抢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成为红军争取少数民族的历史佳话。

与中央红军在凉山彝区争取少数民族一样，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藏羌地区也出色地开展民族工作。红四方面军的文告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①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的当天，徐向前在代表四方面军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②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以少数民族区域为依托，为保卫中国、保卫少数民族的利益而战”，^③后期进入四川的红二、六军团也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他们在滇、川交界的中甸地区时，专门召开了以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连以

①1935年5月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

②《长征新探》第184页。

③《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94页。

上干部会议。红二、六军团一进入四川境内，马上以贺龙的名义张贴、散发《布告》，明确提出：“本军以扶助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成（城）理化进入康川。”军团首长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广大指战员在四川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

第二，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四川的少数民族从与红军接触中亲身感受到，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才没有丝毫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红军主要负责人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冕宁县革命委员会，针对该县彝族占1/3的特点，专门成立了“弱小民族科”。红军在冕宁期间，“弱小民族科”的工作人员深入山寨彝乡开展民族工作。总政治部在凉山彝区发出指示，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作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①与此同时，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报（邓小平和陆定一分别在遵义会议前后负责编辑）连续发表有关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文章。^②中央红军在渡过大渡河后颁发的标语口号中，有14条是“对夷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当中央红军一进入川西北藏族地区，党中央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总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1935年6月第一、

①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

②见1935年5月《红星》报。

二期上发表文章，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并追溯从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及英帝国主义对藏族人民的统治和压榨，分析藏族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影响，说明红军对少数民族应采取的政策。

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以后，也立即组织调查川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并在各级政治部门中增设“少数民族委员会”，吸收当地的少数民族战士参加，还在川陕省苏维埃和西北联邦政府中设立“回番夷民委员会”等机构。同时，四方面军在文告中指出：“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①

由于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红军和少数民族之间出现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不但大批穷苦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甚至出现了“从羌族土司到红军战士”这样鲜为人知的真实传奇。当世袭羌族土司安登榜正遭到“汉官”追捕而四处躲藏、走投无路时，恰遇刚刚进入羌族地区的红军。安登榜看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提倡“回番汉各民族平等”，和国民党“汉官”完全不同，便率领随从毅然参加了红军，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在羌族地区为红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红军战士安登榜在长征路上为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50年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安登榜为革命烈士。

第三、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大胆尝试。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

^①《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4页。

本政策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精神是少数民族在管理内部事务方面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和红军经过在其它省区建立少数民族民主政权的实践，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在进入四川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更加清晰。中央红军在凉山彝区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就提出了“设立夷（彝）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也同时在川西北提出了“实行民族自决权，回、番民自己组织政府（回番民自治区、共和国苏维埃），管回、番民自己的事。”^①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已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冕宁、越西、北川、茂县、汶川、理番、懋功、绥靖、崇化等地帮助建立了县一级的革命政权。随着长征的实践，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沙窝会议决议不但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而且非常英明地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而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或者“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或者“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建立番民革命政府”，而不加区别地在不同民族中“一般地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②

沙窝会议召开半个月后，中共川康省委根据会议精神，又对少数民族政权作了具体规定：“番民群众在政权机关中应占

^①1935年5月红九军政治部印《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

^②《六大以来》（上）第687页。

主要的领导地位。如汉人、回人占少数可成立各民族的自治区政府，在区政府中应当有这些民族的代表。”^①以后，红军各部队就遵照有关规定去帮助少数民族进行自治政府的建设：“番人政府一定要放胆的让番人自己去学习管理自己的政权与运用政权。我们只能站在领导与帮助的地位，去推动政权的工作。”^②

党和红军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其中，在四川阿坝和甘孜两大藏区帮助建立的带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两个省一级的少数民族政权机构，就是有深远影响的典型范例。一个是大小金川等地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格勒”为操嘉绒语藏族的自称，“得沙”为人民之意），一个是包括康区北部各县的波巴人民共和国（“波”为藏族自称，“巴”为人民之意）。这两个愿与红军“订立永远的盟好”的藏族人民政府，不但制定了涉及政治主张、军事党团、统战宗教等政治方面和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法规和条例，而且其政权结构形式也同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波巴政府中不但有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也有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以便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两个具有民族自治政府性质的少数民族人民政府分别履行了八个月和三个月的民族自治、当家作主职责，在藏族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今天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工

^①1935年8月21日《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

^②《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7页。

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四，认真贯彻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

当中央红军还在凉山彝区时，总政治部就向各部队发出指示：“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比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①

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革军委又发出指示：“严禁烧房屋及捣毁喇嘛寺，撕毁藏经和污辱其信仰。”^②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下的懋功县（今小金县），至今仍有当年红军篆刻的许多石刻标语：“彝、回民有保存自己信教、风俗、言语的自由！”“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③

红四方面军也根据党的宗教政策指出：“回番夷民信教自由，尊重回番夷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礼节。”“关于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应当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④

红二军团一进入四川得荣县，就因严守党的宗教政策纪律，受到宗教界人士的欢迎。得荣县城附近的龙绒寺不但请军团长贺龙进寺商议为红军筹粮事宜，而且由寺庙最高决策会议“堪布会议”决定，除赠送红军15,000斤青稞之外，并派喇嘛到附近农村动员藏民出售粮食46,000多斤及大量肉类和酥油。在此前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军团领导人，

①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

②1935年7月8日《中革军委关于组织别动队筹粮办法》。

③不少标语已被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或收入资料集中。

④《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36页。

还到中甸归化寺、巴安（今巴塘）县仁波寺、白玉县白玉寺和呷拖寺拜访宗教界上层人士。

红四方面军为了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既采取军事行动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合击“消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又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通过在康区很有影响的瞻化（今新龙县）和甘孜的喇嘛寺写信给二、六军团入川后北上所要经过的主要寺庙的上层喇嘛和大头人，宣传红军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尊重和帮助藏族人民的政策。理化县（今理塘县）长青科耳寺是康区最大的黄教喇嘛寺，连同其分寺共有喇嘛3,000多人，枪700余支，是理化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同时，该寺还能利用其宗教地位，调动该县所有土司头人武装为其所用。由于红军成功的宗教政策，长青科耳寺不但没有阻击北上的红六军团和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反而支援红军一大批粮食和酥油。

长征红军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统战工作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他们化消极为积极，变阻力为助力，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完成长征大业。尤其是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传到四川以后，这方面的成绩更加卓著。中共金川省党代会的决议规定：“根据上级党的新策略路线，具体地运用到少数民族中去，利用各种机会争取番、回群众在抗日及反蒋战线上的密切联盟”。“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而且决议还规定要“改变对大头人及大喇嘛的

策略。”^①康北炉霍县最大的喇嘛寺寿宁寺有1,500多名喇嘛。该寺大喇嘛曾到成都“谒见”蒋介石，曾表示要竭力抵抗红军。由刘伯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三十军西进炉霍时，为了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寿宁寺也采取了政治争取为主、“围而不打”的方针。当巧取该寺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又电示三十军：“寿宁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炉霍的各界人士亲眼看到了红军优待曾与红军打过仗的被俘喇嘛并让其继续作佛事，严加保护寺庙等事实。这样，许多曾经敌视红军的人也转变了态度，愿与红军合作，并将红军的政策广为宣传，为以后红军由炉霍向甘孜、瞻化进军创造了条件。朱倭等喇嘛寺甚至大开寺门迎接红军。红军的统战工作连续赢得甘孜喇嘛寺等康北三大黄教寺庙的信任和支持，对于稳定康北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区最大的土司德格，在国民党的煽动下曾动员了以骑兵为主的2,000多名藏兵防堵红军。经过红军的统战工作以后，德格土司不但不与红军为敌了，反倒同意他的首席涅巴（头人）夏克刀登，与红军代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并帮助红军筹集了一大批牛、马和粮食。

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从最初听信对红军进行诬蔑的谣言，到后来亲眼看见红军保护经堂、佛像等许多事实，便主动帮助红军，动员其他活佛喇嘛和藏民，大力支援红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自看望格达活佛，鼓励他为藏族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朱德的鼓励使格达的工作更加积极。红军离

^①1936年2月7日《中共金川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金川党的任务决议》。

开四川后，他还保护了大批红军伤病员。1950年，他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前往西藏做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不幸在昌都为西藏和平解放贡献了生命。

另外，红军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据建国后实地调查，长征时期在四川藏羌地区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当地少数民族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60%。解放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等职的杨东生，任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的扎喜旺徐，就是长征时期参加红军的四川藏族青年，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既是党和红军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光辉范例，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共同奋斗的光辉范例。

总之，红军长征在四川努力开展民族工作，制定、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非常成功的民族政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增强了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比如1942年6月，在红军长征经过的羌族聚居区，爆发了茂县北路以羌族为主的人民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茂北事件。”当时羌族群众用红军长征时使用的“共产党政治部”、“共产党青年团”等名义在县城散发传单，而且也是使用红军长征在羌族地区使用过的口号：“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夷人痛苦！”建国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并没有发现当年有共产党员领导和参加这次抗暴斗争，可见红军长征在各族人民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至于红军长征时在四川建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后改称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红军川北(川陕)游击队,更是直到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以后很久,都一直高举红军的大旗,坚持进行英勇的斗争(两支游击队的部分指战员分别战斗到1947年和1940年),给四川各族人民以希望和鼓舞。这两支游击队英勇不屈的事迹,一直被四川人民传颂着。

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英雄业绩,是留给各族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征宝山里,花更大的力气,努力开掘,探寻宝藏。在历史的长河中,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必将万古流芳,代代相传。

※ ※ ※

纵观红军长征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红军长征在四川,是象征中华威、民族魂的长征史诗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长征在川大事记要

(1935年1月—1936年8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2月1日，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0,000多人。12月11日，中央红军右路先头部队占领湘桂边境的湖南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调集重兵于中央红军去湘西的必经地域。12月12日，中共中央临时决定于通道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应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第一次提出：“向四川进军”，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此建议被会议通过后，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前进，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会后，中央红军长驱入黔，12月底前锋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

1935年1月

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渡过乌江后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

3日 受蒋介石派遣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日前离开南昌，是日从汉口乘船赴宜昌转重庆，以监督川军“进剿”红军，并乘机攫取川省军政大权和控制整个西南。

4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出关于反“围剿”战争动员指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会、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省委委员兼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情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作了电告：“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报告了红四方面军力求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意图，并请求指示。

7日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8日，红军总司令部移至遵义。总政治部在8日发布的《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中提出了“创造川贵新苏区”等口号。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

上旬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旺苍坝城内主持召开军政干部会议。

9日 中共四川省委派人邓锡侯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阮自强、李鹏、吴建初等在剑阁县嘉陵江前线发动起义。起义队伍胜利渡过嘉陵江，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四方面军提供了敌人军事部署情况。四方面军为此发了捷报。

10日 蒋介石电令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以有力部队向川南推进，相机进入黔北”；电令“追剿军第二兵团”

薛岳部及贵州王家烈部，向北追剿，务在川黔边境，“消灭”红军。

12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率高级参谋处长、交通电讯班、宪兵连等400余人和政训人员360余人抵重庆。贺国光发表谈话，称红军徐向前部“盘据川北”，朱毛红军又“图窺川南”，因而“川省形势颇趋严重，中央为促进四川剿匪起见，不得不侧重川局，此行营参谋团之由所设也。”

13日 刘湘关于“围剿”中央红军情况致各县县长电称：“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军事部署，极为周密，决于最短期内在黔边”将红军“歼灭。”

同日 川军廖泽旅、穆肃中旅推进至松坎、正安以北地区扼守；川军章安平旅、潘佐旅推进至赤水、古蔺一带布防。

14日 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同时令范子英为“南岸剿匪”第一路指挥，陈万仞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

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还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由于四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比贵州好”，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刘、聂陈述的理由为：（一）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可接应中央红军；（二）四川为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在四川可以大有作为；（三）可利用蒋介石和排外性很强的四川军阀之矛盾。会议接受了刘、聂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

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16日 刘湘由重庆飞赴泸县，与潘文华会商军务。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严令川军各部队增筑“坚固工事，严密防守，倘有疏忽”，被红军冲破，“定照江西剿匪迭例，按军法从事。”

同日24时 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准备渡江进入四川的第一封电报，令红军“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其时，中革军委预定夺取贵州的土城、赤水，相机从宜宾、泸州间渡长江。

中旬 敌薛岳兵团8个师进到乌江南岸，黔军3个师向遵义、湄潭袭击，川军10多个旅40多个团向川南集中，其中两个旅已到松坎以北，对中央红军形成新的包围。

18日 蒋介石布置“川陕会剿”，调嫡系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入川，接替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日 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以追剿军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并会同扼守川南的防堵部队，将红军“合剿而聚歼之”。

同日 中央红军分三路经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河前进。其时，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叙永地方游击队去黔北与红军联系。

同日夜 中革军委接到红四方面军关于敌人情报的来电，印证了滇、黔两省敌人围追的消息。

20日 红军总司令部发布《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

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21日 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的部队到达綦江县石壕，重庆为之震动。是日，敌“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部队下达“用兵之道宜慎”的命令，企图“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中央红军，不让中央红军进入四川。

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革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示四方面军：“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长）江，……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四方面军接电后，于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电报作认真研究。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乃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

同日 刘湘宣称“川南防务，已部署完竣。我一切计划，得以从容完成。我叙南金沙江至老鸦滩最后预备线，亦已布置妥善”。

同日 为打破敌人新的“会剿”，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当日攻占转斗铺，24日克羊模坝后乘势进围昭化，27日占领广元飞机场，29日占领机场东侧敌重要外围阵地乌龙包（五龙堡）。胡宗南部丁德隆旅伤亡惨重。因敌坚守广昭，红军攻广元城不克，乃主动撤围。

23日 蒋介石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划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为特区，委王亦潜任该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率兵阻红二、六军团向川黔推进；委徐源泉任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委上官云相任该部第一路总指挥，遏阻红军向鄂西发展。

25日 红坪县苏维埃政府在李家坪（今广元县青林乡境内）成立。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重新规定川军各路之防堵红军任务，令邓锡侯、田頌尧两部防守昭化，令罗泽洲部防守新政坝至凤仪场，令杨森部填守空隙，令李家钰部策应新政坝，令唐式遵部防守悦来场至城口。

26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各军事长官，务须恪遵上级命令，常住指定地点，非经长官核准，不得擅离”。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颁发进攻红四方面军命令，令胡宗南和川军邓锡侯、田頌尧等各部同时出击。

27日 中央红军以北渡长江进入川西为目的，连日向赤水河地区转移，至本日已全部进入赤水河以东附近地域。在此前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重庆行营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调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黔军和中央军配合，以免“坐失戎机。”

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组建“国际少年先锋队”，师长高厚良。

28日 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川军主力激战失利，遭受较大伤亡，参战部队奉命撤出。与此同时，滇军也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红军。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发出关于筹划长江上游江面防务事宜的训令，决定将“现有各舰艇暨租用商船四艘”一并用来

封锁长江。

29日 中共古蔺地下党、团组织配合中央红军西进，分别在阻击红军之敌的两个团中做瓦解工作，致使1个团溃逃，1个团解散。同日，中革军委鉴于敌军增援，再战不利，指示中央红军“于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各军团遵照这一指示，于是日分别从元厚（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全部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毛泽东一渡赤水后，从古蔺河上游的川、黔两省交界处孙家坝进入四川境内。

30日 红军中央纵队路经古蔺县镇龙山。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负责人刘晓接见当地党团组织负责人邓伯明等，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地方坚持斗争。

同日 南溪、纳溪、江安、长宁、高县、珙县、庆符、筠连、兴文、叙永、古蔺、古宋等川南12县国民党地方势力召开联防会议。在这之前，刘湘发出防堵红军、成立各县联团办事处的训令，规定各县县长兼任联团办事处主任。

1935年2月

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粉碎湘鄂敌人“围剿”给二、六军团发出指示，其中提到：“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刘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呼应。”

同日 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先头部队在叙永县三岔河击溃叙永民团。

2日 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拟通过永宁（叙永）、摩

尼之线，转移到古宋、兴文、长宁地带休息”。红一军团二师分两路向叙永急进，上午完成对叙永东城和西城的包围。

同日 川军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命令范子英、陈万仞、郭勋祺各部堵击红军，以“不入（川）南六县为主旨”。

同日 蒋介石悬“赏洋十万元”，“购缉”“朱（德）、毛（泽东）、徐（向前）”“之一者”；悬“赏洋五万元”，“购缉”“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之一者”。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

3日 红军继续围攻叙永县城。潘文华于是日命令章安平、达凤岗、刘兆藜“各该旅务速前进”，以解叙永之围。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令刘湘转饬川军进剿、守备各军遵行“特别注意事项”。

同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由川北向陕南宁羌敌人阵地发起攻击，开始进行陕南战役。是役，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军先后投入12个团的兵力，占领了宁羌、沔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陕南战役于是月中旬结束后，红四方面军赴陕部队即返回川北。

同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左路军进驻“鸡鸣三省”地域的石箱子（当时属古蔺县辖）。

同日夜至5日凌晨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在石箱子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江的侦察。”会议研究了仍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的工作问题，决定发出要中央分局“立即改变你

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等内容的电报。石箱子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撤换党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

4日 红一军团二师与川军周城虎警卫大队在漏风垭、红梁子一带展开激战。当晚，红军开始撤离叙永城。

同日夜 红三军团进驻黄泥嘴附近，军团长彭德怀接见叙永特区游击队负责人，并决定留下红军干部何宗舟等带领数十名伤员和武器扩充游击队；指定王逸涛任游击队长，何宗舟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当红一军团路经兴文县五村时，由中共（古）宋兴（文）特支领导的“南六游击队”也派人与其取得联系。

月初 红四方面军留下300多名干部、战士，和旺苍、英安（今广元县东北部）、南江及陕西省南郑等县的游击队在旺苍坝瘟祖庙宣布组成“川北边区守留阵地游击队”（简称“川北游击队”、“川陕游击队”或“巴山游击队”）。游击队前期由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任司令，活动于南江、宁强、南郑、广元等地。红军长征期间，游击队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斗。

5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负责人于上午10时以后随中央纵队离开石箱子，向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方向前进。因水田寨的滇军守敌据炮楼阻击扰乱，中央纵队绕行泥泞小道，至深夜23时半方到达只有零散农户的花房子。次日毛泽东等抵达石坎子。再以后，到达威信县县治所在地扎西。

同日 红三军团向天堂坝进发，红九军团及二、三梯队至叙永县分水岭，红五军团到达石箱子，红一军团奉命向长宁西南地域继续移动。

同日 川军罗泽洲暂编二十师占领仪陇县城。

6日 中革军委根据当时态势，拟留川滇边进行战斗以创造新苏区。军委在本日电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考虑渡河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以创造新苏区。”这时，敌恐红军北渡长江，遂沿长江布防，封锁渡口，并集中兵力向红军压来，阻止红军北渡。川南地区的川敌兵力，刘湘第一次截堵拟用30个团（实际有28个团）投入布防；第二次截堵则调动37个团。其它各路敌军相率赶来，红军渡江已不可能，因此，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

7日 中革军委连续两次电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仍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依此方针，我野战军目前任务是：（一）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二）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中央红军根据军委命令，突然转向扎西，从而把尾追之敌甩在后面。

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同日 红军各部均抵扎西附近地区，并按军委7日指示进行缩编。军委在扎西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在川滇黔地区实施机动作战的决策和部署。

同日 蒋介石在集中兵力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共10万余人，开始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同日 潘文华移驻叙府（宜宾），并于是日命令穆肃中部

布防屏山、雷波。

9日 红军作战灵活机动，使潘文华对于红军踪迹“不甚明了”，潘于是日发出“暂定各部任务”的命令。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令刘湘、胡宗南“以陆军空军协同作战”，“派飞机直接侦炸”红军。

10日 改组后的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原兼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等人此前已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免职。刘湘在是日发表的就职宣言中称：“国难当前，安内大亟，剿匪方略，政治与军事并重。将欲推进政治，首须改造机构。”

同日 潘文华报告红军已离川入滇，并令陈万仞、范子英、郭勋祺、章安平、穆肃中各部跟踪红军入滇。同日，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又令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倾出。”

同日 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命令》中说：“一、三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总政治部根据军委命令，抽调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并指定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后王叛变）参加，组成“中共川南特区委员会”，由徐策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另外，又抽调红军干部100多名留在地方，与叙永地方游击队合编，成立由特委领导的红军川南游击队。

11日 中央红军回师东进。军委根据当时敌情，决定“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区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并相机

占领古蔺城。”

同日 刘湘向蒋介石行营报告“川境已无”中央红军。

12日 中央红军选派到川南游击队的400多人，在石坎子集中，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叙永县四合头，然后和主力分手。

同日 潘文华发布金沙江防务的命令。

13日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境内，到达叙永县分水岭，当晚在鱼洞沟宿营。

15日至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古蔺县白沙召开会议，拟定了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的《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作出了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的决定，通过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书中指出：“过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中建立根据地。”同日，军委将中央红军停止渡江计划的决定电告了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

17日 中央红军代号为“巴东”的部队派人与古蔺地下党、团负责人联系，传达了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有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的指示。

18日 国民党政府中央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发出关于川滇边境“朱、毛”和“彭德怀”军情的电报。

同日 潘文华发出命令，称“拟联合滇、黔各友军（将红军）会剿于赤水河以西一带地区”。

同日 红军川南游击队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在叙永五龙山召开合队庆祝大会，并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纵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任命朱绍良为“剿匪边界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副之，专剿陕匪及川、陕边区之匪”。其第一纵队司令官由杨虎城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官由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任。

18日至21日 中央红军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渡过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桐梓疾进。活动于古蔺、古宋地区的游击队，在红三军团十二、十三两个团与敌人进行的战斗中，牵制了敌人，直接配合了战斗。

中旬 红军川北游击队新增了红四军、九军的一部；另外，南江、英安（今旺苍英翠）的地方干部和陕西南褒勉中心县委领导的一个游击队也奉命编入。川北游击队扩编为独立师，共800余人，刘子才任师长，原红三十六团政委王天海任政委。

20日 蒋介石为了乘机完全控制四川，于是日发出命令四川军阀交出政权的电报，称“徐（向前）、张（国焘）盘踞于（长江）北岸，朱毛复窜于（四川）南陲”，而“剿匪须用七分政治，……各军将领已先后宣言打破防区制，交还政权，……殊堪嘉慰。”

同日 潘文华为防止中央红军入川，令魏楷率部“兼程赴古蔺”，令达凤岗旅“兼程赴叙永扼守”，为“第一固定扼守线”；令陈万仞暂驻高县指挥，“分扼横江、滩头、盐津、筠连各点”，为“第二固定扼守线”；令穆肃中、章安平两部，

“仍负雷（波）、屏（山）责任，为第三线”。

20日以后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战斗，插向叙永境内。致使敌人以为还有另一支红军主力留在川南，急令川军田冠五旅、达凤岗旅、范子英旅、魏楷旅在叙永、古蔺堵截。中央红军在二渡赤水后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取得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的重大胜利。

28日 红四方面军将从川陕根据地边沿地区撤下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约2,000余人，在旺苍坝瘟祖庙组建直属方面军总部的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同月 川军二十一军决定“成立剿赤义勇队三百（个）中队”，并在接近红军的地区设五个“区指挥部”。

同月 国民党政府四川省建设厅呈《四川兴筑剿匪公路意见书》，称“经行营规定”，并根据“匪情变迁”，除修筑“五省公路之川黔、川陕、川鄂外，添加川甘、川滇两线。”

1935年3月

1日 刘湘宣誓就任“四川省保安司令”，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等致电，宣布四川省“省府保安处，即于是日成立”。

同日 川军南岸“剿匪”总指挥部发布命令，称“综合情报”估计中央红军欲“与萧贺合股”。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就云阳中共地下组织策应红军而策动云阳暴动一事发出训令。

2日 蒋介石为“督剿”红军，“整理川政”，由汉口飞抵

重庆。次日发布“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不得擅自进退”的手令，命令各军长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略，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4日 为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同日 蒋介石命川军除“第一路追剿军协同陕、甘部队攻宁羌外”，一律停止向前攻击，“力求巩固”。

5日 中革军委决定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红军主力则向西寻机歼敌。

月初 中共川南特委派霍绍文等人到叙永两河口，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并决定南六游击队改称川南游击支队，直属特委领导，继续在当地活动。

月初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和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向敌罗泽洲部发起进攻。红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以夜袭手段，攻占苍溪城东老鸛场、红山庙，歼敌两个团。5日，红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又在红九军一部配合下，于阆中县境内，歼罗敌两个团大部，并乘胜进占仪陇。

5日和8日 红四方面军两次电告中革军委，报告四方面军向仪陇地区进军和扫清嘉陵江沿岸外围之敌的情况。

6日 蒋介石为消除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电刘湘、潘文华：“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干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蒋介石令刘湘、潘文华“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询红四方面军“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及川、甘、陕敌对四方面军的进攻部署。

同日 川军罗泽洲部1个团向红九军缴械投降。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一部向苍溪进击，于11日克服苍溪。

9日 国民党“四川边防军铲共委员会”为“追剿赤匪”发出命令。

同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长干山。

同日 蒋介石电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严加戒备”红军“西窜”。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也于当天令周浑元在仁怀、坛厂“构工固守”，令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率部由刀靶水北上，令川南“剿匪”指挥官率部由桐梓南下。

10日 为了牵制敌人，支援中央红军，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合江石鼎山农民起义爆发。起义队伍组成川滇黔边区叙永工农红军游击纵队，在合江、赤水等地与敌激战。游击纵队在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告失败。

11日 中共中央成立全党全军最重要的机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新三人团），表明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进一步巩固。

同日 红四方面军回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报告敌人动态，提出“目前我军在南路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

12日 蒋介石发出电令，分别惩奖在“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川军各部。该电称，进入川军二、三两路阵地之红军并

非主力，“乃罗泽州部平时未遵令构筑碉堡，加强防御工事，官长督饬不严，精神废弛，临阵则一再撤退，……着即派大员听候查办，一面令饬负责戴罪图功”；“苍溪失陷”，是由于“该总指挥田颂尧督饬不严，着记大过一次”；“杨森部报告多次确实”；而李家钰部左翼固守仪陇部队，“不为罗（泽州）部退军牵动，仍严阵死守，鏖战数日，……着先传令嘉奖，并奖洋五千元”。

13日 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潘文华向郭勋祺、陈万仞、章安平、蒋尚朴、穆肃中各部，发布《布防川南命令》，称中央红军已过枫香坝以西，“似有经打草坝、吴马口渡赤水河西窜模样”；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城后，即暂行停止，扼守待命”；令叙永、古蔺、宜宾、屏山、雷波“各防守部队，务即加紧工作，扼要筑碉。”。

14日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夜进长宁县梅硐乡。以后，梅硐建立了中共区委和游击队。

15日 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敌周浑元部激战失利，当夜撤出战斗。

16日 按照中革军委15日电令，中央红军于是日至17日从茅台渡过赤水河（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古蔺，佯作北渡长江的态势。

同日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主力由仁怀方面渡过赤水河西窜”，为部署“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之目的，拟即分途进剿与堵剿”，电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之周浑元、吴奇伟、郭勋祺、孙渡、王家烈几路重兵齐头向红军压去。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派1个团佯作西进向古蔺游击。

同日 潘文华电令其时在遵义附近的川军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

17日 鉴于中央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于是日电潘文华、孙渡，部署四川叙永和贵州毕节封锁线，令川军陈万仞师于纳溪、叙永、营盘山、赤水河线，令滇军孙渡部于赤水河至毕节线，“扼要先行选择据点，昼夜赶筑碉堡工事”，强调“此线封锁严密与否，关系剿匪前途至巨”。

18日 蒋介石派飞机侦察中央红军动向，发现红军部队向古蔺西南方向移动，判断红军主力又要在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便重新拟定了“聚歼”计划。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转饬外交部密电：“查川黔两省及湘西一带正在进剿赤匪”，“对于剿匪军事区域，暂时停发外人游历护照，以免间谍混入，刺探军情”。

中旬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一团用两天的时间，从旺苍坝将大批伤员送到王家坝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方面军总部表彰。

20日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中央红军“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朱德命令各军团秘密、迅速、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一带东渡赤水河。

21日 潘文华为了在二郎滩、太平渡袭击中央红军，致电陈万仞，令刘兆藜旅及周成虎大队急向叙永天池移动，令魏楷部转移桂花场，令周化成部驻守古蔺城外，令田钟毅独立第三旅开赴合江，令张竭诚率独立第一旅开赴江津，令陈万仞部仍防堵于叙永、赤水河镇一线，与滇军联防，阻止红

军西进。

21日至22日 中央红军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四渡赤水。后红军神速南下，直逼贵阳，将云南敌军调了出来。然后直扑昆明。红军在向昆明守敌虚晃一枪以后，又向金沙江挺进。

23日 蒋介石由重庆抵贵阳“督战”。

同日 四川善后督办拟具川军缩编办法呈报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计划首先整理27个师、119个旅，核计军费，规定限额，令各部自行紧缩，再实行缩编，拟将川军由340个团缩编为210个团。

下旬 中共川陕省委在旺苍城关召开七县县委书记和保卫局长联系会议，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制定了《肃反执行条例》等文件。

28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根据方面军二月下旬作出的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于本日夜首先在苍溪塔子山附近强渡嘉陵江成功。29日拂晓，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成功，31日进攻阆中县城。31日，红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经复兴场攻占剑阁。

29日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同日 蒋介石令“追剿军”沿乌江构筑工事，称“如再任匪西窜，唯各高级将领是问”。同日蒋介石另电江西，令“迅速选调技术精良之工程师及技士多人，克日入川，规划川、黔、陕、鄂等线路政”。

本月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发出训令，称：“近据叙永南各属人士私函及新自各本县到省者，多言此次赤匪经过尚无骚扰，惟当地团队县府命令封仓扶〔拉〕夫，集中粮食，蹂躏

不堪。”

本月 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处下发《民国二十四年度工作概要》，称：由于“本省赤祸蔓延，委员长亲临督剿”，为了“消灭”红军，所以对全省保安队编制、训练、人事调整等作出种种安排。

本月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穿插于长宁、兴文、叙永一带。敌人“追剿”多次扑空。国民党长宁县政府报称：游击纵队“往来灵活，巧于避战”。

1935年4月

2日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1个团攻克天险剑门关，全歼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所率3个团。红九军一部在四军配合下，也于同日攻占南部县城，全歼守敌李炜如部3个团。

同日 因嘉陵江阵地被红四方面军突破，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副军长孙震因“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其残军由“戴罪图功”的孙震“暂率”。

3日 红三十一军和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昭化县城，歼敌1个团。接着，红三十一军主力即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阻击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南下，并以一部包围广元。至4月5日，红四方面军共歼敌7个团加1个营，攻克县城4座，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以西地区。

同日 蒋介石令川军各部 and 胡宗南部分头追剿与堵截，以“拒止”红四方面军“于涪江以东，期于狭小地区歼灭。”

4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公布《施行保安制度步骤布告》，称：“川省频年战乱，政令纷歧，积习相沿，演成防区恶制，团务因以废弛，人民亦同散沙，赤匪遂乘此四分五裂彼疆此界之际，侵入川境”。该布告说，保安制度是蒋介石在“督剿”红军以来，先后在豫、鄂、湘、赣、苏、浙、闽、陕、甘等省“实力奉行”、“收效至宏”的“好办法”，因此在四川推行此制度，是“围剿”红军“义所难辞”之事。

同日 蒋介石急电射洪、三台、绵阳、梓潼、江油、平武等县，命令各县在涪江流域构筑碉堡封锁线，“以为涪江屏蔽”。

月初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剑阁召开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总结陕南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情况。会议讨论并决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

5日 蒋介石“召集剿匪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面示“剿匪方略”，其要旨为“各部队应训练伏兵、游击兵、侦察兵”和“训练山地战”。

7日 蒋介石任命王缙绪为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

8日 蒋介石电刘湘，称“各县长守土有责，尤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否则，“概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同日 邓锡侯以“特急电令”转飭遂宁、射洪、三台、绵阳、什邡、广汉、彭县、茂县、松潘、绵竹、安县、北川等“二十四县军政长官，督饬军民构筑碉堡，屯积粮食”。

10日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苏区。”

同日 红四方面军攻占青川。中坝战役也于次日打响，红

九军二十七师先头部队乘敌不备渡过涪江，乘势包围江油守敌两个旅，占领了中坝、彰明。邓锡侯亲率18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向江油增援。

12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以红四方面军“实力大于”中央红军，“为便刘湘所部集中一方，便于指挥起见”，令川南“追剿”部队，除郭勋祺一师仍驻黔西外，其余部队与扬森部对调。扬森奉命由川北调防屏山、雷波一带。

14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四团攻克平武县城。

15日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攻占江油以南塔子山敌主阵地。接着红四方面军展开全线攻击，歼敌4个团，俘敌3,000人，邓锡侯几被生擒。

中旬 红四方面军进占彰明，后于18日攻占梓潼县城，21日攻克北川县城，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是役，共歼敌12个团，约10,000余人，攻克剑阁、昭化、梓潼、彰明、阆中、南部、平武、北川等县城和重镇，打乱了蒋介石“川陕合剿”的计划。红四方面军在上述地区建立13个县苏维埃政府和1,100多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平武建立中共平南县委员会，在彰明（今江油县境内）建立中共彰明县委员会。当红军进入北川地区时，江油县回族阿訇肖福祯参加红军，后在北川、青川、平武、茂县、绥靖（今金川）、四土（今马尔康）等地的回民和其它民族中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被吸收为川陕省苏维埃回民委员会主席。1936年7月，肖福祯在四土马塘作战中壮烈牺牲。

16日 川黔边“追剿”红军有关各县县长或“代表”在重庆开会，讨论组织军运代办所事宜。蒋介石指定重庆行营运输处处长林湘为会议主席。林湘在会上吹嘘他多年来追随

蒋介石在各省“剿匪”军运中的成绩，同时强调“蒋委座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将徐股及朱毛各匪完全消灭，甚望各位尽力协助中央，办理军运，借利戎机，俾能早除匪患。”

同日 鉴于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并攻占了青川、平武等地，又有向岷江上游的松潘、茂县进军之动向，川军二十八军军长兼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邓锡侯为保其防区，于是日致电蒋介石，称“松茂夷地”不但“阵线过长”，而且“团力缺乏”，“我兵仅备制夷，固未防及赤匪”，要求蒋介石“遴派大员，统帅师旅，驰赴松茂”。

19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二十九军改为陆军第四十一军，孙震任军长。

20日 蒋介石电刘湘，命令“一体实行”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剿匪”时已实施之《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

21日 孙震就嘉陵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彻查失事各级长官”，将其“处分情形”报告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

23日 四川省“保安司令”刘湘电成都、华阳、简阳、崇庆、广汉、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新都、金堂、彭县、双流、什邡、新津、绵阳、绵竹、罗江、德阳、中江、安县、北川、汶川、茂县各县长，称：“现值剿匪军事紧张，本司令部为谋提掣团队，协助防剿之便利，特予省会设置行营”。同日，四川省“保安副司令”费东明就保安司令部成都行营“组建及应分各事”电刘湘。

24日至28日 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团先后命令川军各

部对川南和金沙江沿岸“严密防堵”、“不拘省界”。

26日 刘湘急电绵阳、茂县、松潘、灌县、三台县长，通令盘查持有“难民证”之红四方面军侦察员，称“有二千多份难民证”已经落入红四方面军手中。

同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总部电告所部，称：中央红军主力“图渡金沙江”。

27日 由于中央红军自一月份遵义会议后在川、滇、黔三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主动，红四方面军又胜利突破嘉陵江防线，使敌人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于是日抄发“安定人心”之布告。该布告之重点一是强调“镇静”，一是强调“团结”。

下旬 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地区开会。会议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与一方面军创立川西北根据地方针，决定立即组织土门战役，打开西进通道，向岷江地区发展，积极策应一方面军。土门战役的第一步计划为南打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四方面军攻打成都之态势，以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第二步是突破“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土门，主力乘胜西进。此时，敌人也觉察红军有西移动向，蒋介石参谋团为此制定了“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的作战方案，在土门设立“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屯区‘剿匪’指挥部”，由8个步兵团和少数民族农奴主的马队共约12,000余人在土门一带布防。

28日 蒋介石电告“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可否严令该段之各军民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管理”。龙云于同日电令金沙江南北两岸下属部队毁船

封江，“防止共军北渡”。

29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作战，“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30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致各军团政治部电》，电文中说：“渡江转入川西之基本方针，……已在遵义会议时确定”。

同日 蒋介石急电令川黔边境“剿匪”各县，限期于5月5日前成立“军运代办所”。

本月 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作战期间，在中共阆南中心县委组织和领导下，建立了阆南民主政府，并组成升钟寺独立师。独立师下辖7个大队，共1,500余人，余岱生（于江震）任师长，独立师随即加入红军队伍长征。

本月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红军川北游击队（独立师）在川北与陕南边境地区着手建立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两个乡和1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发展到1200多人。

月底 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土门战役开始。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于漩坪击溃敌孙震部李炜如第十一旅，一举攻占伏泉山。

月底 鉴于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防线，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转饬四川省“剿匪”总司令部致各县雇派民夫输送军米的训令，并将军米区域暂定为营山、顺庆、三台、绵阳地区。

月底 国民党四川保安处就4月25日至27日在大邑县发现中共地下党员所组织的“四川民众自卫军”和“共党冒充”的“参谋团官长”，发出公函，饬令大邑、崇庆等地特别

注意“清剿”，该函强调“川北剿匪军事紧张，……加以共党从中煽惑，苟不迅剿办，诚恐一旦燎原，为祸不堪设想。”

本月下旬至5月上旬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对红四方面军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围攻。川军第六路王缙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右纵队，沿涪江左岸前进；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沿涪江右岸前进；胡宗南部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川军第五路唐式遵之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防止红军南出。

1935年5月

1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击溃敌陶凯部的前进部队，占领墩上。

同日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落堡召开庆祝“五一”大会，纵队政委、川南特委书记徐策在会上作形势报告，颁布了中共川南特委制定的《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十二条。该纲领向川南人民指明了灾难和贫穷的社会根源，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彻底解放的光明道路。

同日 蒋介石电刘湘，委任四川各“行政督察区专员”，以加紧“围剿”红军。

2日 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到达团街。是日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议，博古报告渡金沙江的决定。

同日 红军总司令朱德对渡金沙江作具体部署，指出“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去会理除可走元谋、龙

街大道渡江外，还可经洪门口和皎平渡过江。朱德令红一军团由龙街渡江；令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赶于4日上午到达皎平渡；令红三军团十三团限4日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

同日 担任牵制迷惑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九军团攻占金沙江岸边的东川（会泽）。

同日 四川“剿匪军”第六路总指挥王缙绪为“肃清涪江左岸”、“打断”红四方面军“南下之企图”，命令所部向重华堰、两河口等处进攻，“并接通江油，向西横扫”。

月初 红四方面军在中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各军负责人出席。张国焘在会上强调撤出川陕根据地的目的，提出赤化川、康、陕、甘、青和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

3日 为防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电令刘文辉负责在雅安赶筑飞机场和在雅安、西昌、雷波、昭觉、会理等“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命令邓锡侯“负责办理”松潘、理番、茂县、懋功和“灌县及水闸”的筑碉事宜；命令“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述各地区”。

同日晚 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干部团在皎平渡口渡金沙江成功。其时，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未成功；红十三团在洪门渡架设的浮桥也被激流冲垮。朱德遂命令全军都由皎平渡过江。

月初 红四方面军在北川召开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等领导机关的干部共100余人，张国焘在会上讲话。

4日 四川“剿匪”总指挥刘湘电第六路总指挥王缙绪，称：根据重华堰、江油一带红军已不多等情况判断，红四方面军“似有由北川南进或西进趋茂县之企图”，命令各部向红军“迅速进攻”。

5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会理通安后，于是日帮助群众建立了“通安贫农团”。接着，“彰冠贫农团”、“南阁贫农团”和“会理城郊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

7日 中央红军三军团接替干部团进入会理县城附近。为牵制敌人，使红军主力得以休整和北进，红三军团包围会理县城，展开了七天七夜的攻城战。

同日 红九军团由东川的树桔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东区（今会东县）境内，旋即分兵两路向宁南（披沙）县境进发，并奉命破坏沿江船只，阻止东岸追敌，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和进行休整。

8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令李家钰部“克日取捷经，赴灌县、汶川、茂县。”

9日 中央红军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后面，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10日 红四方面军与敌激战后，占领千佛山主峰佛祖庙。在千佛山战斗中，川军旅长于渊（早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借故迂回，避免与红军交火，并给红军丢下大量辎重，暗地为红军让路。当千佛山、伏泉山等战略要地被红军占领后，敌人失去了川西平原北面的天然屏障，造成红四方面军“南取成都”的态势，成都一带敌人大为震惊。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于同日电令刘湘、王缙绪、邓锡侯、孙震向北川进攻，令胡宗南“速派六团兵力，占领松潘固守”。

同日 蒋介石电刘湘、邓锡侯、田頌尧、杨森、潘文华、李家钰、罗泽洲、唐式遵“并转各师长”，称：“今据四川省政府以援剿匪各省先例，划该省为十八行政督察区”，“所有各区专员，统由本委员长行营遴选任命，……各区驻军对专员应竭力协助。”

同日 刘湘命令王缵绪部迅速转移罗江附近待命，并派部队由茶坪、青杠铺进攻；命令邓锡侯部抽出1个团驰赴土门，巩固茂县防务。

同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各部和胡宗南部“封锁”红四方面军“于青川、平武、松（潘）、茂（县）、北（川）、彰（明）等地区，四面包围，筑碉防守，另以有力纵队”向红军主力进攻。

11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占领大垭口拿下茶坪取安（县）绵（竹）》的捷报。

同日 鉴于中央红军“既（已）渡（过金沙）江”，蒋介石电令薛岳、刘文辉、孙渡，决定动用兵力十万余人，南追北堵，将中央红军主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计”。

同日 国民党政府空军在会理附近轰炸。

12日 北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在此前后，红四方面军帮助建立了中共北川县委和150多个基层革命政权。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镇压反革命和支援前线等工作。赤化（今广元市中区境内）、剑阁、江油、青川、北川、平武等地区还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土地。

同日 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称：为了“严防”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潘移动，“凡现到川北之各部队，……须令其逐

渐筑碉前进，不可长驱直入。”

同日 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停留5天进行休整。本日14时至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还有一、三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会理会议对巩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加强中共中央同红军高级干部间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月上旬、中旬 红四方面军由傅钟、余洪远负责进行大规模筹粮筹款活动，仅在江油、彰明二县筹集的粮食就达900多万斤。被红四方面军解放了的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旺苍、广元、剑阁、青川、平武、梓潼、江油、绵阳、安县、北川就有27,000多人参加了红军。本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其时，红四方面军正规部队有5个军11个师33个团约8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等共约10万人。

13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川军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陶凯指挥的由7个团1个营及地方屯殖军在土门设置的防线发起进攻。经激战，红军占领土门、干沟，并乘胜追击。土门战役至22日结束。是役，川军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红军歼灭万余人。土门战役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日 蒋介石电王缙绪，命令刘兆藜、彭焕章、于渊、章

安平4个旅攻击千佛山。

同日 红九军团在向中革军委报告敌情后，从宁南县华弹渡口向金沙江对岸巧家渡口欲偷渡之敌人射击。后红九军团在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从宁南经普格、西昌小庙到礼州与主力红军会合。

同日 康泽派其别动队赴雅安、雷波、昭觉、西昌、会理一带，刘文辉密令部下“对此务特别留意”，指出别动队要将有关情况“密报委座”。同日，刘文辉电令袁国瑞旅及各团长对红军“奋勇截击，不得临阵退缩”。

15日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攻占上罗。17日攻占玉和场，后进逼珙县县城。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电王缙绪，令其“从速解围”“被困日久”的江油。

同日 国民党“三军联合办事处”和重庆行营参谋团电刘湘：“飭一、二、六路军，限期17日总攻千佛山，夺回全线阵地”，扼阻红四方面军。千佛山战斗至7月14日结束。是役，红四方面军歼敌5,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使红四方面军十万人马顺利通过北川峡谷，向岷江上游地区进军。

同日 中央红军根据军委14日部署，开始撤出会理，向西昌前进。

同日夜 红四方面军占领岷江上游重镇茂县。继后，一部沿岷江南下，进占文镇关；另一部溯岷江而上，向松潘前进。松潘县镇坪白羊羌族土司安登榜日前已在墩上参加红军。在随军长征中，安登榜为红军带路筹粮，开展宣传工作，凭借他的威望劝说阻击红军的羌族土兵队不打红军，并帮助建立羌族村寨的苏维埃政权和番民游击队（安任大队长），使红

军在他带路的羌族地区得以顺利通过。同年8月，安登榜在毛儿盖为红军过草地筹粮时被敌人杀害。

16日 尾追红九军团的国民党第五十三师李韞珩部在巧家附近渡过金沙江进入宁南县境。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为防止中央红军向大渡河和岷江开进，命令杨森所部防守大渡河北岸，在富林至安庆坝和马烈至龚咀之线增筑碉堡；命令犍为团队在杨森部未到之前“先行扼要防守”；命令陈万仞部除留一旅“肃清”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酌留部队分驻泸（州）、宜（宾）外，最少须以两旅协同各该县团队”布防雷波、屏山，再沿岷江左岸赶筑碉堡。

17日 因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对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开展统战工作并获得成功，中央红军轻易占领德昌。中革军委于是日发出红一军团占领德昌的“火急捷报”：“缴获步枪千支，俘虏数百”。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为隔绝”红四方面军“与朱、毛合股”，令李家钰、刘文辉、杨森分别派队负责构筑灌县、新津、名山、大邑、荣经、富林、汉源、泸定桥、康定、芦山、天全“各县城乡碉堡”。

18日 中央红军一军团之第三团向西昌西门接近，未能靠拢。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部第一纵队追剿红军抵达元谋以北的金沙江边，次日开始渡江。

同日 张国焘在茂县召开会议，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简称“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特委常委会由张国焘、陈昌浩等7名委员和李特等4名侯补委员组成。同日还成

立了“番人革命党”，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19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于是日晨抵礼州。当晚进至冕宁县境之松林。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为部署各军团行动发出电令，电文说：“西昌有敌约4团及彝兵二三千人，刘元璋在城内有固守模样。……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

同日 蒋介石乘飞机到西昌上空视察。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以“亮城”为名从17日至19日连续三个晚上焚烧西昌城，烧毁街道28条，民房3,700余家，寺庙10余座，回教礼拜堂4大院。

同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该指示说：“中央红军今后的机动和作战，都密切地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必须严格政治纪律，绝对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利益，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于本月用“西北军区”政治部等名义在川西北藏族、羌族地区发布《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和《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指出“在四川全省居住的五千万人口中间，除汉人占最大多数外，还有藏人、回人、番人、苗人、傈僳等各种民族。”“要深入的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

20日 红一军团先头团于拂晓前到达泸沽。朱德于同日向各军团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我野战军迅速北

进，取得大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

同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野战军渡过金沙江，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已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的实际要求。”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宣布，鉴于“追剿”红军的“军事重心已移川西”，决定“参谋团”由重庆移驻成都。

21日 中革军委同意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变行军路线，以一、五军团、军委纵队和三军团的顺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擦罗向纳平坝、安顺场渡口前进。本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冕宁县城。当地中共地下党员组织人民群众挂红灯、燃鞭炮欢迎红军。

同日，由红二师五团和三军团十一团组成的红军佯动部队在左权、刘亚楼率领下，肩负“吸引、迷惑并钳制（西昌至雅安）大道上正面之敌”的任务，也于是日拂晓占领了登相营，当天下午进入越西县城。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电令邓锡侯、孙震、王缙绪各路军“停止进攻，改取守势”，以防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北川方面，向茂县西竄”和“防其绕理番、懋功而竄雅安或康定，与朱、毛会合”。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三纵（周浑元部）第五、第九十六两个师在巧家附近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

同日 中革军委负责人到达冕宁县城。是日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先会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后召开会议商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冕宁抗捐军事宜，周恩来出席会议。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西昌、冕宁地下党的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本日晚，毛泽东召集陈野苹、廖志高、王首道、李井泉、黄应龙等人开会。中央红军先遣第一团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下，本日从冕宁大桥镇出发进抵彝海。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刘伯承根据彝族风俗，本日在彝海同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歃血为盟。

同日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在越西彝民帮助下，从青杠关出发，在海棠歼敌两个连，活捉越西县长彭灿。

同日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有着与渡金沙江同样的意义”。

同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一部从文镇关、茂县间西渡岷江向西急进。

23日 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陈野苹任主席，李井泉任副主席，朱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同时，有500多人参加的地方武装组织冕宁县抗捐军也正式成立，红军干部黄应龙任总司令，陈野苹任政委，后红军主力部队留下100多人也和抗捐军合队。本日，红军先头部队从大桥镇出发顺利通过冕宁彝区。

同日 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军佯动部队经晒经关于是日到达大渡河边的大树堡。佯动部队在此造船、扎筏、筑工事，佯作渡河准备，并扬言“攻打富林，直取雅安，攻打成都”。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发出电令，称红四方面军主力“已向土门、茂县间急驰雅安或康定”，令北川、土门间邓锡侯各路“确实筑碉，固守防线”。其时，邓锡侯已奉令先调6个团赴懋功一带布防，其余部队陆续西移，所遗清溪河绵阳

方面防务由孙震担任，自伏泉山以西由王缙绪部接替。行营参谋团并命令刘文辉下属驻守雅安、天全、芦山、宝兴的部队，在邓锡侯部到达后，“西移康境，增厚康防”。

24日 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占领了岷江沿岸之重镇茂州之雁门关”时，给各级政治部、处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信。

同日夜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歼敌两个连，缴敌船一只，控制了南岸渡口。

25日 中央红军先遣队第一团一营二连17名勇士，在炮火掩护下，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战胜激流险滩，强渡大渡河成功。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宣布，因其三十八团两名军官“于化林坪之役临阵不前，着即撤职”。27日，三十八团下达关于“临阵退却各级长官有递斩之权”的命令。

26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成都，并在当日的手令中饬“追剿”中央红军各部队“照剿匪手本之原则规定进行”，特别强调“自西昌以北经越西与冕宁时，务应特别组织夷族宣传慰劳队，并派得力人员组织夷族”。

同日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安顺场。红一军团之第一团已全部渡过大渡河。因船只不足，安顺场及其下游仅有渡船4只，红军渡河困难；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于是日在会理令其第五十三师“于29日集中礼州”，令其第二纵队“于26日到达大兴场”，令其第一纵队“限于30日集中西昌待命”；川康边防军与薛岳部队一道由南向北追击中央红军，杨森所部之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两支敌军均与红军仅距几天行程）。在此紧迫形势下，中革

军委决定红一师及干部团继续渡河，沿河东岸北上；中央红军主力沿河西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

同日 中央红军佯动部队由大树堡向安顺场方向转移。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为增援安顺场命令所部向挖角坝开进。

同日 担任中央红军后卫的红九军团在泸沽击溃从西昌尾追而来的刘元琮旅。

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九军军长何畏率领三十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上游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纷纷展开竞赛，决心以英勇战斗、加强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与一方面军会师。部队还展开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

27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主力在雁门关地区，与敌激战，歼敌1,000余人，后红九军一部于29日占领威州。

同日 中央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接受了3天走320里并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经海尔洼北进，于田湾东北端的菩萨岗击溃刘文辉部一个营的阻击，俘敌营长等，并乘胜突破猛虎岗。

同日 蒋介石令薛岳部第五十三师及川军二十四军刘元璋师“编为第五纵队”，委任李韫珩、刘元璋为正、副司令，属第二路军。

同日 为加紧“追剿”红军，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转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军法处组织条例》”(共十条)，令各地执行。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令杨森以两旅兵力，协同刘文辉部，“扫清”已渡过大渡河的红军。

28日 由中共中央直接帮助建立起来的冕宁抗捐军遭当地反动武装暗算而失败。以后，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第二十旅旅长兼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和国民党中央军相继到达冕宁，更加残酷杀害抗捐军指战员。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令第五纵队刘元璋师留置1团守备西昌，其主力于29日向泸沽推进，并选派两个追击队各500人，分别向冕宁越西追击红军；又令李韞珩率第五十三师于29日抵达礼州待命。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在龙八步旅部转奉刘文辉27日关于“我根本任务皆在康（定）泸（定），委座（蒋介石）谆嘱注意者亦在此”的电令。刘还饬袁旅“以掩护泸定为主任务”，特急电令所部“迅速稳慎施行”。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发出电令，将原定抢夺泸定桥的部署提前一天。

29日 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又由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

同日 红四团以一昼夜冒雨行军240里的速度于拂晓6时到达并占领了泸定桥西岸。此前几个钟头，川军二十军三十八团的两个营已进驻了泸定桥县城，并构筑了工事，拆除了靠近西桥头的大部分桥板。红四团在作好总攻准备后，组织红二连22名勇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的，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冲向对岸，占领了桥东头。红四团接着控制了整个泸定城。同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右纵队在龙八步冷碛等地击溃二十四军第四旅的敌人后，向泸

定桥急行军，临近半夜到达泸定桥。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令刘文辉“抽出大渡河方面部队，驰援康（定）、泸（定）”。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五纵队刘元璋部由西昌向北推进，李韞珩率第五十三师抵达礼州。薛岳于是日令刘元璋部6月2日向冕宁“追剿”，令五十三师6月1日向越西“追剿”，强调两支部队“对沿途夷人予以抚慰”。

30日 中央红军一军团直属队及二师全部通过泸定桥。红军过了泸定桥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泸定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并派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会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由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陈梁护送，从天全县灵关经雅安、成都、重庆赴上海。

同日 红四方面军帮助召开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茂县苏维埃政府，另建立了中共茂县委员会。同时，张国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由他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说：“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

同日 川军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绵竹县城。

31日 中革军委根据道路情况，决定将原拟直接向天全集中改为“以攻击化林坪之敌，各个消灭刘敌部队，然后集中天全”。红二师四团于是日攻克泸定和汉源交界的要隘飞越

岭垭口。

同日 蒋介石令薛岳以一、二纵队之一部在西昌、泸沽筑碉守备，主力向汉源推进，以第五纵队向泸定、康定推进合围；又令安县方面孙震部，汶川方面邓锡侯部，雅安、汉源方面刘文辉部，洪雅、荣经方面杨森部合围红军。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五纵队刘元璋部先头到达冕宁。

月底 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除少数地区外均遭敌人破坏。尚存的少数地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仍积极投入以支援红军长征为主的战斗中。

1935 年 6 月

1 日 中央红军攻占化林坪，张闻天在干部大会上作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革军委本日决定：“迅速攻占清溪（当时汉源县县城所在地），并迂迴荣经”。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同日进至汉源西面之富庄。

同日 薛岳根据蒋介石电令，命第九十师欧震部、第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分别于6月3日、4日从西昌出发，经越西，限13日、14日到达汉源；命第五纵队李韞珩部，由冕宁、越西向泸定、康定之线推进。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电川军各部队：“朱、毛、徐、张各匪将会合，恐有回窜，飭各部迅速构筑碉堡工事，限20日完成，实行封锁”。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发布命令，令川军二十一军和李家钰部、孙震部、王缙绪部、杨森部、刘文辉部、郭勋祺

师、王泽浚旅以及胡宗南部、薛岳部分别在灌县、什邡、彭县、绵竹、新津、威州、茂县、平武、松潘、江油、懋功、宝兴、芦山、天全、名山、冕宁、越西等地围堵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并命令别动队派员“分往督促指导”各地构筑碉堡。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步兵二旅旅长余松琳和西康专员公署专员陈启图联名命令封锁中央红军攻占泸定的消息，并规定：若已公布“泸定失陷”，“则以（川军）胜利布告掩贴其上，或撕毁之”。

2日 中央红军全部越过天险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纵队向天全、芦山前进，放弃了夺取清溪、荣经的原订计划，以便与四方面军会合，寻求作战机动。是日晨，红军向富庄附近刘文辉部阵地发起进攻。是日午后，杨森部一三三师杨汉城部由荣经抵汉源附近，援助刘文辉部。

同日 蒋介石在成都发布《劝告四川绅耆服务桑梓，协助剿匪，拯救民众书》，称“朱毛溃奔川南，徐匪倾巢西窜，察其企图，实欲会股川西，另创苏区”。

2日至8日 中央红军从泸定县化林坪出发，陆续进入荣经县境。红军在行军途中，不断遭到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当中央警卫营和毛泽东等人路过荣经县三合乡茶合岗时，两架敌机从水子地方方向飞来，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等人身旁，警卫班长胡长保为保卫毛泽东牺牲。

3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专员通报红军有“由泸定窜天（全）、芦（山）趋势”，而丹巴、九龙“现尚无”红军踪迹。

同日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理番县城。

4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令杨森“先稳固自天全经荣经、

汉源至富林之线，以待薛岳部到达夹击（红军）。同日，薛岳部第九十师抵登相营，第九十二师到礼州。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奉转蒋介石5月29日电令：无论“进剿或堵截，均须利用碉堡稳扎稳打”。

5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先头部队日前从理番县米亚罗沿虹桥沟翻越虹桥雪山进入懋功境内，于是日攻占两河口。红三十军一部计划从汶川耿达、三江一带经卧龙向懋功进军，由于牛头山、皮条河一带早有敌人重兵把守，此路红军未能按计划进入懋功，后折回威州，经理番向懋功开进。

同日 蒋介石于成都行辕召集在成都的川军高级将领，就“剿匪与整军之要道”进行训话，大谈所谓“剿匪的要领”，其中包括“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和“要特注重碉堡工事”等。

同日 刘湘电川军各部队，称中央红军“大部队由蒲麦向荣经大道”进军，而红四方面军“主力徘徊茂县，似有牵制我岷江以东部队，使朱毛夺取雅安之样”，令各部“分割”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防止红军会合。

6日 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均进至天全城外天全河对岸的沙坝村一带，因河深、敌阻均未得渡。中革军委于是日命令部队“以破釜沉舟精神，坚决迅速手段，于6日夜以前不顾一切牺牲渡过天全河”。

同日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抚边。

同日 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7日 中央红军占领天全和始阳。是日9时，红一军团报告“天全守敌已退”，一军团“除以1个团强攻飞仙关”外，“主力继续向西北前进”。

8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一部于是日晨占领懋功（今小金）县城，歼灭“懋（功）、抚（边）、绥（靖）、崇（化）剿匪军团联合办事处”组织的“屯殖军”残部、县“保卫团”及部分区团武装近千人。红七十四团于是日晚乘胜占领懋功以东90里之要镇达维，并向日隆关东面地区警戒，以阻击灌县方面之敌。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命令王缵绪抽调3旅兵力共9个团待命于广汉、新都之间，另抽调3个旅集结于绵竹“候令调遣”。

同日 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命令构筑碉堡封锁线，使“岷江南源西部、松潘东北和新道经重华堰之东区至剑阁”构成三道防线，以阻止红军北进或东进。

同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指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如再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是日夜，红一军团之第一团占领芦山。

9日 继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8日占领宝兴县城以后，红军大部队于是日顺利通过宝兴。

同日 国民党西康专员公署专员陈启图向所属各县通告红军动态，称“毛（泽东）、徐（向前）交会已成事实”。

同日 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昌都类乌齐昌齐第一呼图克图”（受清王朝册封的活佛称号）诺那，诺那表示愿意组织藏

族地方武装防堵红军。后蒋介石于本月22日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以后又任命诺那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

同日 薛岳率其主力“追剿”中央红军到达越西。

同日 日本驻天津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答复。何在与日方秘密会谈后，于7月6日复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史称“何梅协定”）。

10日 中央红军一军团先头第四团在陈先率领下进到宝兴以北。中革军委同日在天全发出指示：“天全至懋功约430里，人烟少，产包谷不丰。……各兵团令10号，在现地不动，并每人需补充7天粮食，加以途中添补，期于到懋功时能余粮4天”。

同日 蒋介石电刘文辉，令其侦察中共川西特委及其游击队。该电称：在大渡河以西设有王首道、王爆、李井泉等负责的川西特委，并有200余人，“武装齐全，仍图施行游击，牵制我军，并赤化冕宁邻近各县，以便将来与朱德匪部会合雅安”。蒋介石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凡匪经过地区及其欲窜方向，必有共匪潜伏，密为组织”。

同日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敦睦邦交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团体。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上旬 红四方面军分别帮助建立了中共理番县委、汶川县县委、懋功县委以及这3个县的苏维埃政府。

12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四团越过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海拔4600多米），与红四方面

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靠懋功县达维一侧的木城沟磨盘石突然相遇，两军意外会师。由此达成了被后人称为“懋功会师”或“达维会师”的一、四方面军的首次会合。红二师在是日的报告中说：“四方面军之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合组成两路军于本月8日占领懋功准备向天全前进，找野战军取得联络，其主力在茂州、理番附近，并带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信”。

同日夜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张国焘、陈昌浩和他本人的名义在理番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当面敌情和四方面军部队位置，提出了当前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表示：红四方面军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指中央红军）”。

13日 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两个团抵达懋功县城。

同日 中央红军一军团第四团由陈先率领到达懋功县城。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是日给各军团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布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捷报”，“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的全部汇合”，“解释两大主力的汇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克服以为汇合后可以放下担子安心休息的情绪”。指令还要求“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兄弟”。

14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共中央和革军委的负责人，翻越夹金山，进抵达维，受到当地四方面军指战员热烈的夹道欢迎。当晚，在达维喇嘛寺前的开阔地

上，两个方面军驻达维部队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联欢会。庆祝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毛泽东以中央红军长征和四方面军作战的胜利，说明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指出红军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朱德在讲话中谈到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会师的意义及今后的任务。讲话结束后，周恩来宣布庆祝演出开始。一方面军战士剧团演出了活报剧和歌舞，并共同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同日 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电蒋介石，谎报“灵关大捷”，称“在芦山，宝兴，天全之灵关，截断朱德匪部约3000余人，失其归路……约2,000余人投江，余悉被生擒”。骗取了蒋介石的传令嘉奖和赏金。

同日 蒋介石发布《劝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其主力“追剿”红军到达汉源县，16日抵荣经。

15日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于是日发布。

同日 中革军委编印出版的《红星》报发表题为《伟大的会合》的社论，指出两大主力的新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大发展的基点”。“我们每个部队都要准备着，在与四方面军亲爱的弟兄们相见时，举

行大规模的以至各连队的联欢会和交换战斗经验。”

同日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一、四方面军会师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发出致敬电：“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的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川西北的最有利的条件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16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继红一军团之后，经日尔、官寨、老营等地，抵达懋功县城，受到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及八十八师部分官兵的列队欢迎。此时，中央红军由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其中除一军团辖第一、第二师外，其余军团均不设师。整个中央红军共有16个建制团。

同日 “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慄”。

同日 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休整的规定，要求中央红军各部到达规定地区后，一律休整三天。指示各部在休整期间，应“开干部会，报告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意义及今后战斗任务”。

同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战略方针问题

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占领大金川东岸要镇崇化。

同日 “追剿”红军的薛岳部李韞珩纵队到达化林坪，吴奇伟纵队到达雅安，周浑元纵队一部在汉源，一部在西昌。

17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懋功城会见李先念，详细询问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及嘉陵江、岷江地区的情况，表达对四方面军的关怀。懋功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为两军主力在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日 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拒绝中央16日电，夸大向东向北发展困难，强调北川一带不易通过，而北打松潘没有粮食，主张经阿坝西进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如有困难，则向南发展。

同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赤化川陕甘及今后任务的解释大纲》。强调今后一、四方面军“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是“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指出“要争取与四方面军全部的会合和达到川西北苏区，不是没有困难”，但“由于有着两大主力不可战胜的会合力量，有着川西北广大群众，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鉴于此时一、四方面军均已到达川西北藏、羌民族聚居区，总政治部的《解释大纲》还特别强调：“政治机关更当努力组织与武装群众，争取少数民族，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

同日 薛岳率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部到达雅安。

19日 中革军委电复张国焘17日电，指出当前应首先突破平武，并速攻松潘，指出：“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成绝大困难，南下雅安等地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同日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抚边。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根据蒋介石电令，为了防止红军“乘隙到处骚扰”，转饬各县将户口调查清楚，办理保甲，并“将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之壮丁，编为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赶紧训练”，还令各地“实行坚壁清野，以促进军事效率，而竟剿匪全功”。

20日 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指出向东向北比西移有利，并通知张国焘“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颁布《全川部署总计划》和《川省碉堡构筑计划》。《计划》称：据参谋团分析，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经过“稍事整理，势必合力会攻汶（川）、灌（县），进而袭取成都，以谋赤化全川；如果不逞，再向甘（肃）青（海）北窜，期达接通国际路线”。

同日 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分别召见邓锡侯、刘文辉、唐式遵、潘文华和刘湘。同日，薛岳也奉召由雅安出发，乘车赴成都“聆训”。

同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杨森部向懋功追击；令第五纵队李韞珩部在泸定、康定一带构筑工事，防止红军西进；令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吴奇伟部“自6月23日起，扩辟雅安机场，限7月10日以前完成”；令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赶筑自邛崃经名山至雅安沿公路两侧碉线”。

21日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团以上干部在懋功县城

天主教堂举行干部同乐会。朱德和博古分别代表中央和总政治部讲话，强调红军目前的有利环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及今后的任务。同乐会还举行会餐和文娱晚会。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令薛岳部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应自25日起，分由雅安、名山一带，开赴绵阳、江油一带集结待命”。

22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发出训令，通缉中共地下党员、阆中县“红军首领”缪吉甫。

23日 红四方面军第二六七团占领康猫寺，得食盐1000多斤，粮七、八石。

24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县两河口。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令各区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县征收局，“应受高级将官指挥”，原因是“川省现值剿匪严重时期”。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司令行营发出训令，规定各县派丁守碉。

25日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500余人突袭距珙县20余里的富兴场。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下达该部向绵阳推进的命令：除第五纵队（司令李韞珩）暂驻康定、泸定及第十三师（师长赵锡光）暂驻荊经、汉源，各建碉守备待命外，其余自6月28日起，开始转进绵阳。同日，薛岳另电第二纵队司令员吴奇伟：“以雅安机场极为重要，令该部全体动员赶筑，勿辞劳苦”。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五师四旅旅长袁国瑞转奉蒋介石

“对于碉堡构筑，认为剿匪唯一手段”的训令，要求“不分昼夜”，赶速于7月10日大体完成。

下旬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规定川军缩编的6项实施原则，令刘湘等遵照执行，规定川军缩减兵额的三分之一，各军不得再行设厂造械弹被服；拟在川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川、滇、黔三省军政官员，由蒋介石、刘湘和陈诚分别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后，又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收容各部编余之军官。

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参加会议的有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中央政治局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主力向北进攻，夺取松潘以北地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同日 蒋介石因刘文辉“其部属一味敷衍，致使朱、毛自由窜渡（大渡河），未收聚歼之效”，乃通令刘文辉“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并严令刘赶筑碉堡。

27日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海拔4564米），抵达卓克基。

同日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题为《接二连三的夜晚》的文章中，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召开、有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全体干部参加的“干部同乐会”，开得十分热烈，博古和朱德在会上讲话，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又一起会餐，

还观看晚会演出。

同日 蒋介石电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四川省政府，令通缉捉拿迎接红军并向红军“报告一切”的灵关高小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等人。

27日和29日 蒋介石先后两次电令各部队“不拘前线后方”立即构筑碉堡，“违者定将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

28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颁布《川甘青边区碉堡封锁线构筑计划》。该计划分析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既可能“东向岷江，西向大金川，磨旋绕窜”，也可能“以理番懋功为新根据地，渐图发展”，但“最堪注意”的是“经陇南或青海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

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政治形势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张国焘。会议议程是：（一）关于目前局势问题；（二）关于组织问题。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势报告。会议决定要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会议通过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中央决定派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理番县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同日 中革军委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向甘南进军。《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的平夷堡等地向北开进。

同日 张国焘虽然同意打松潘，却强调敌情、地形、给养方面的困难，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

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同日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小河击退高县国民党“模范队”、沐爱镇团防和警察分队，进占沐爱镇。后来，当国民党“忠（县）、丰（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率部追来时，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已经转移到云南镇雄、威信一带。

30日 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组成先头部队，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境内进发。

1935年7月

1日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同日 中革军委为克服粮食困难，指示部队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没收土司、反动头人的粮食，应分一部分给群众，绝对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指示还说，不得杀食耕牛、小羊、小猪。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五十三师开始构筑康定泸定线及冷碛汉源一带碉堡；刘元璋一部已到康定，准备向丹巴推进。

同日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放弃北川县城，川军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于翌日报告他已“占领北川”。

2日 刘湘电四川“剿匪”军各路总指挥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唐式遵、王缙绪及其各军、师、旅长和全省各县县长，命令通缉“当朱毛到时，竟敢接应欢迎，事后仍留后方工作”的灵关小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强调“毋使

漏网，是为至要”。

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第三座大雪山长板山（即亚克夏山，海拔4800多米）。然后经马河坝、昌德等地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昌德山，再经上打古、中打古，下打古，翻越第五座大雪山塔鲁岗（拖罗岗，即打古山），后来到达沙窝。

同日 中革军委规定，为了保障松潘战役的胜利，每人必须带足15斤粮食。

月初 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周兴、金维映等组成的中共中央慰问团抵达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理番县杂谷脑，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张国焘却在此前后背着中央慰问团召开“川陕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和其它一些会议，片面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欺骗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非法“审查”中央路线，说“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

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藏族地区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因此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运动。”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一、二期上，分别发表了《关于夷（彝）民中的工作》和《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前文追述了中央红军通过凉山彝区时开展工作的具体方针、方法和口号；第二篇文章追溯了从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及英帝国主义对藏族人民的统治和压榨，分析藏族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影响，说明

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应采取的政策。

同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强调克服粮食困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求在没收、收买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及其第一纵队向东移动，预定取道邛崃、新津、成都、德阳而达绵阳。第二路军第五纵队（李韞珩部）同日开始在泸定附近筑碉堡工事。

4日 蒋介石在成都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各部队：“应构筑纵横碉线，并于碉堡之外缘挖外壕，设置鹿柴、竹钉等副防御，以期巩固”。

5日 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指出没收土司的粮食、牲畜要向群众解释，对群众的粮食一定要用钱买或茶叶换，若无钱时要给购粮证明，说清以后付。后来，针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困难，又规定除前线部队外，红军指战员都要参加筹粮工作。所规定的具体筹粮区域为：红一军团全部及三十军一部在毛儿盖、波罗子（即今小黑水地区），三军团全部和三十一军一部在芦花沿黑水河至茂县西部地区，五、九军团及九军一部在卓克基、马尔康及抚边等地。

6日 在理番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中共中央慰问团成员李富春致电中央，反映张国焘“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并提出了人选和增加军委常委等意见。

同日 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分别率红四方面军部队，从理番、茂县、平夷堡地区出发，向松潘前进。

7日 蒋介石颁布“碉楼系剿匪自卫的唯一武器”等7条标语。

8日 中革军委组织别动队，上山招回少数民族，收集粮食，规定对地里成熟的麦子、青稞由筹粮机关指定部队收割，统筹分配，不得自由收割。

同日 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对凯丰在《前进报》上对西北联邦政府的批评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批评是不正确的。

上旬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陈宏代理参谋长，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

上旬 国民党各部队按蒋介石的命令缩小包围圈围堵红军。其时，胡宗南部主力已占领松潘、黄胜关一带；川军第二路军（孙震部）在北川一带，第三路军（李家钰部）与第五路军（范绍增部）在安县一带，第一路军（邓锡侯部）在汶川一带。

9日 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增设军委常委、并由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等要求。

同日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率两个团东向黑水石碉楼接应徐向前及其率领的四方面军一部，并协同围攻石碉楼等地袭击红军的当地土兵。

同日 由红一军团和三十军组成的先头部队，根据《松潘战役计划》，奉命于月初从康猫寺出发，本日到达毛儿盖。是日下午，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部一个加强营展开战斗并包围了该敌。

同日 担任中央红军掩护任务的第三十七团从宝兴县境内进抵懋功县达维，成为最后一支北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部队。

10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要其率领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勿再延迟，以免敌占先机。

同日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表题为《以进攻的战斗力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社论除了重点论述创造川陕甘苏区的问题外，还谈到“必须加紧少数民族的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

同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经进入“人迹稀少”之“松潘荒凉地带”，为了“困毙”红军，命令胡宗南部严密防堵。同日，蒋介石还命令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一纵队于7月11日续向绵阳前进，到达成都附近时，官长可来听训；该路军已完成之邛崃、新津各地之碉堡封锁线，在无部队接防前，可先交地方民团守备”。

11日 薛岳到达成都，并于是日率该总部及吴奇伟纵队欧震师已到达成都的连以上军官在成都行辕“晋见”蒋介石，听候蒋训话。蒋介石在题为《中央军追剿赤匪之意义及其经过之成绩》的“训话”中，大谈“剿赤壮举”，以励将士效命。还特别强调：“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训话”以后，蒋介石又召集薛岳部师以上军官开会。蒋在会上对红军在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动向作了两种估计：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阳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以会合在陕甘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

部。会上，蒋命令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胡部第二纵队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漳腊、黄胜关一带，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早在红一、四方军懋功会合之初，为防红军进出甘、青、新，蒋介石便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包括胡宗南部和“马家军”在内的所有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为切实阻止红军从四川西北部的地区北上，蒋介石日后又从豫皖边调来国民党第三军王均部入甘肃，在夏河两岸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来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到甘肃静宁、会宁等地，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同日 蒋介石以薛岳部东调，命令双流至康定各段碉堡封锁线的守备任务以川军为主，即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守备双流至新津和名山至雅安线，四十五军（李家钰部）守备雅安至泸定线，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守备泸定至康定线。

12日 蒋介石电令川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王缙绪和川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孙震“各以一部会攻墩上、土门，孙部并应迅速接金川溪以右之防”。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四旅参谋长米刚致函三十八团团团长，称：别动队警告，如不限期在7月15日前完成灵关至宝兴筑碉工事，将报请蒋介石“以纵匪论罪”。

13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成都，本日在成都正式办公。

同日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边境的长官司受到忠（县）丰（都）石（柱）联团清乡司令周化成和5个区民

团的伏击，与敌人恶战。游击纵队战斗失利，伤亡100多人，纵队政委徐策、副政委张凤光等先后牺牲。

14日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在簸箕坝召开会议，总结川南游击队从成立到发展再到长官司失利，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组成新的领导班子，由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和游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纵队司令员，带领游击队员继续在川、滇、黔边区独立作战，打击和牵制敌人，以配合主力红军的战斗。

同日 蒋介石电刘湘，命令广元、平武、松潘、宝兴、剑阁、南江、巴中、万源、宣汉、达县、渠县、大竹、梁山、开江、万县共23个县“亟应一律援例设立军运夫车船舶代办所，友资协助军运”，配合“围剿”红军。

同日夜 红军先头部队在毛儿盖追击被红军包围后溃逃的胡宗南部一个加强营，俘敌近百。

16日 红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在追击毛儿盖逃敌中又俘敌3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6挺、电台1部。

同日 薛岳电呈蒋介石，称江油、旧州、平武、青川一带缺粮，请“迅速运粮”。

17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在黑水石碉楼附近击落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副队长所驾飞机，并将该副队长及其队员俘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为此印发了《空前大捷报》的传单，对击落敌机的部队予以通报表扬。在此前后，国民党空军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和轰炸。

同日 川军李家钰部进占威州。

中旬 鉴于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减员甚大，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

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经中共中央和军委批准，从红四方面军抽调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二七〇团和第八十八师直属队，共1,600余人给红三军团；抽调第四军第二九四团1,000余人，给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

18日 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致电朱德，建议“集中军事领导”，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黑水芦花研究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和凯丰。会议决定张国焘任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任军委常委，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共中央常委会工作，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于同日发布命令：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于同日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同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欧震师到达江油。次日薛岳率总部及周化南旅也抵江油。

同日 蒋介石电王缵绪、李家钰，命令王部在占领墩上、土门以后，和已经占领威州的李部同向岷江上游重镇茂县进攻，若限期在7月23日占领茂县，则“各奖洋三万元以资鼓励”。

同日 鉴于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地土豪借围剿红军而加

重对四川人民的剥削，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于是日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传饬蒋介石手令：“严禁各乡士绅，以筑碉为名，强捐勒索”。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颁布《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该大纲判断，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穿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同日 红一军团在距松潘城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部廖昂旅展开战斗。同时，红四军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进攻，给胡部丁德隆旅以沉重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城仅二三十里的地方。岷江以东的红军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和两个营长。

同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对有关事宜作了明确规定，使正在参加筹粮活动的红军指战员，既加紧筹粮工作，又能注意执行群众纪律。

19日 国民党政府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在松潘牦牛沟（牟尼沟）的新阵地被红军突破，红军进到离松潘城仅十里之遥的地方。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团惊呼“松潘情势，极为严重”。

同日 蒋介石令胡宗南集中兵力，严加戒备，“保持松潘要点”；令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一纵队以5个团的兵力“星夜驰赴”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防务。

同日 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对6月29

日颁布的《松潘战役计划》进行了修改。原计划对客观条件估计不足，红军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遇到了严重缺粮、张国焘延误等各种困难，加之敌军已先机抢占松潘，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装备较差，虽以多路突击，但仍不能在松潘地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至本月底，《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停止执行。

中旬至下旬 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四军大部与胡宗南部在松潘西面和南面形成拉锯之势，红三十一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另有部分在理番、卓克基等地之外，主力部队则在松潘的毛儿盖和黑水的芦花一带筹粮。

20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诺那、向传义等5名委员到职。下旬，诺那率“西康宣慰使公署”人员和—个特务大队进入康区。

同日 川军李家钰部由威州进到茂县文镇；王缙绪部由茂县乾沟向茂县县城开进，23日进占茂县县城。

21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关于—、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取消了一、四方面军番号，将—方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为加强前方作战的统一指挥，利于迅速北上，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重新任命了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曾日山、参谋长曹里怀；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

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同日 中革军委重新部署松潘战役，决定第一纵队由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第二纵队由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三纵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杨尚昆任政委；第四纵队由倪志亮任司令员、董振堂任副司令员、周纯全任政委；第五纵队由詹才芳任司令员兼政委。

同日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插入筠连县境，突袭大乐瓦，活捉该县最大的土豪，占领巡司镇，进而抵达距筠连县城仅五六里的卡子关。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保安司令行营发布训令，转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行营”关于碉堡封锁“乃剿匪之成功与否”的“当务之急”的命令，并颁发《四川省碉堡构筑计划》、《碉堡构筑守备赏罚条例》和《查碉组织大纲》。

2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黑水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讨论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至川陕苏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徐向前、凯丰、刘伯承、陈昌浩，共13人。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报告，徐向前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四方面军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存在某些缺点。毛泽东在会上说，四方面军在鄂豫

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这之前几天，毛泽东在芦花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作为对徐向前任总指挥的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23日 中共中央指示，懋功地区的地方工作应以抚边为中心，地方工作统归李井泉负责。

同日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撤离北川进入岷江上游地区。

24日 川军杨森部追击红军，占领懋功县达维。同日，薛岳部欧震师在平武、古城、旧州一线布防。

25日 蒋介石电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征编运输军粮的铁肩队。该电称：“川陕甘青边区，山高路险，地瘠民贫，番汉杂处，习食殊异，连年共匪灾害”。蒋根据“前在赣省堵剿”时，“由赣省府负责各县征募少壮丁夫，编成铁肩队”的经验，命令刘湘“负责援例募编铁肩队”，以最迅速方法，分区限期令各县一次共募28,000名，编为280个队，统归重庆行营运输处直接指挥，分配到川北江油地区担任运输。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按此电令，制定了《四川各县征募丁夫组织铁肩队办法》，规定从7月29日起，“每县逐日交到一百名，勿稍迟误”。

同日 川军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电所部务必限期完成“碉堡之分段修筑……及其他防线上种种准备”。

同日 蒋介石为封锁红军于大小金川以东地区、令川军第四路军（杨森部）攻取懋功；令第五十三师（李韞珩部）以一部守备康定雅安间碉堡封锁线，其主力则推进至丹巴以北，攻取崇化、绥靖两要点，并构筑大金川沿岸碉堡封锁线。杨

森率所部3个师，于是日进攻据守懋功城之红五军团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后卫部队撤走后，杨森部于26日占领懋功城。

26日 川军刘文辉部占领崇化。27日占领绥靖，随即在大金川筑碉。

同日 刘湘向川康边境各军和薛岳通电，转告西藏拉萨热振呼克图电称：为防止红军进入青海、西康，除已经电令随时防堵、“与追剿各军切取联络”外，又已“飭藏东防守官兵协同中央各军”，“并正筹划添调藏军赴前线追剿”。

28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陆续经过绵阳调至涪江上游，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接替了胡宗南在平武一带的防务，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奉令于是日“全部集中待命”。

30日 青海国民党政府马步芳部，已在黄河以南临夏、夏河、同仁及黑错将其防堵红军事宣布防完毕。

31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因未弄清红军情况，决定巩固松潘等处防务，于是日电令胡宗南部主力控置于南坪、郎盖间，以其一部“筑碉巩固”漳腊、南坪、西固封锁线，其余守备松潘附近各阵地；令薛岳部吴奇伟纵队以一部接守平武至瓜墩线，主力控置于平武；令薛岳部周浑元纵队控置青川、碧口、宁羌及广元、昭化、江油、绵阳、北川一带。其时，杨森部已进至抚边对岸，邓锡侯部已向理番方向追进。

1935年8月

1日 红军总司令部发出攻占阿坝、进军夏河流域的指示。要求对松潘之敌进行钳制，将原第四、第五纵队合为第

二纵队，由倪志亮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向马尔康、卓克基、梭磨转移。

同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政府推行卖国政策、内战政策造成的民族危机，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同日 国民党政府重庆“戒严司令部”宣布撤销，刘湘令许绍宗师开重庆，“负责维护川东各县秩序”。

2日 蒋介石为使胡宗南纵队集中全力扼守松潘，令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一纵队第九十师于3日接替水晶堡一带防务，要第二路军与胡宗南纵队“取得联络，完成平武、松潘间坚固封锁线”。胡宗南部主力集结松潘地区，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红军先后突击松潘未能得手。

3日 鉴于《松潘战役计划》难以实现，中革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计划》将部队分为一、二、三纵队和右路军，一纵队为攻占阿坝的先头兵团，二纵队为各方的钳制部队，三纵队为总预备队。接着，根据此战役的需要，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将在毛儿盖以西以南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军划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

政委张国焘指挥；将在毛儿盖以东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直接指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同日 张闻天通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请准予明4日10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同日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题为《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中报道了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的“热烈的慰劳”。仅三十一军组织的慰劳品，就有衣服近500套，草鞋1,400双，毯子100床。本日的《红星》报还发表题为《为筹集充足粮食而斗争》的社论，指出：“筹集充足的粮食，是当前的极重要的战斗任务”。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欧震师奉命接替平武至高庄坝防务。

同日 国民党政府空军第六队队长王伯岳及一名队员驾机在羊角塘一带对红军进行低空侦察时，为避红军仰射的弹雨，于慌乱中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4日至6日 中共中央于毛儿盖十八寨之一的沙窝(今血洛)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11人。会议共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政治局提出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会议通过了5日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

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目前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发展。《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进一步肯定了北上领导全国抗日的方针，强调维护红军团结的重要性，号召同怀疑中央方针、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6日 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指出“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草原的地域时”，必须了解敌人骑兵的特性和战术规律，掌握步兵对敌人骑兵作战要充分利用地形、运用密集的火力等“战斗概则”。

同日 红军一部由茂县较场坝出发袭击松潘包子寺胡宗南部阵地。

7日 红军第一纵队先头部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占领马尔康北面大藏寺。是时，红军左路军各部的所在位置为：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五军、九军二十五师在马尔康、马塘、大藏寺一带，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由理番至卓克基路上，三十二军在马尔康至松岗线，九军二十七师位于党坝、抚边线，三十三军在耿达、草坡至理番一带。

8日 中革军委正式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周恩来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任命陈昌浩兼政治部主任，周昆为参谋长。

同日 川军杨森部李朝信旅由懋功溯抚边河在魏家山一带向红军阵地发动攻击，是日占领抚边。

10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在毛儿

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决定“以有力之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并以其主力控制之，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并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人大部于松潘城附近”。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组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各部队，共分九组”，规定各组“定10日到达，15日左右开始点验”。要求对川军各部人枪“名实相符”、“以便切实整顿”。

11日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发出关于实现总司令部夏洮战役计划的指示，要求一、三军团分别在波罗子、芦花集结。作好过草地物资准备和政治动员工作。

同日 蒋介石在峨眉军官训练团训话。峨眉军官训练团于本月和9月共办两期，调训川、滇、黔三省军政官员和团营。蒋介石的《总理遗教六讲》即在此所讲。

12日 川军邓锡侯部杨宗礼旅日前从灌县出发，经耿达尾追红军于是日抵达草坡一带，准备向马岭山进攻。

13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特务营一部及第五十九师1个团，由江油出发，后经重华堰、马角坝、雁门坝、乔庄，于18日到达甘肃文县碧口。

14日 蒋介石因汪精卫辞职事，自成都飞九江，然后去南京。

15日 红军左路军开始经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同日 中共中央就改变《夏洮战役计划》中有关主力攻取阿坝的规定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强调“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中旬 红军左路军主力第一纵队向阿坝进发。一路以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康猫寺一带经龙日坝到达档格哈里玛山西南时，同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即阿坝）支队司令的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之2,000余骑兵相遇。红军初战不利，被迫后撤；旋因后续部队赶到，乃将土兵击退，转进至四寨一带。与此同时，红九军二十五师和红五军从马尔康、大藏寺一带出发，翻过安德山，在四寨会合了九十三师。

18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进占赫章。

同日 陈昌浩、徐向前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同日 叶剑英率右路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定南三团由毛儿盖出发，进入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向班佑、包座进军。右路军大部队于21日开始过草地。

19日 红军左路军九军二十五师四团进占查理寺，总司令部亦于是日由大藏寺向查理寺跟进。同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奉命率五军主力由查理寺向班佑探路前进。

同日 中共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到会的有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议程为：（一）常委分工问题；（二）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议还决定，常委会议每周至少开一次。

同日 张国焘连发两电给徐向前、陈昌浩，说“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阿坝仍需取得，一

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道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等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

20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部由碧口出发，24日到达文县县城。

同日 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次日攻占川西北重镇阿坝。

同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索花喇嘛寺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行动问题的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进军。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战役方针之补充决定》，是对两河口会议决议的补充。《决定》对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川陕甘方针中关于“红军应首先夺取松潘、占领松潘以北地区”等内容作了调整，明确提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指出，这样作还“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川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决定》同时指出，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主张，“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同日 红一方面军发布《北进前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要求通过各种方式，深入解释北上过草地的意义和将要遇到

的各种困难，作好充分的思想与物资准备。

同日20时 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致电时在阿坝的朱德、张国焘。

21日 中共川康省委于查理寺发出《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指示说：“在川陕甘地区内有川陕老苏区，有陕甘赤区，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九军的活跃，有回番民的解放斗争”，“我们在通过草地时”必须努力进行争取番民群众和在“严守阶级路线”的前提下“多多收集”粮食等各项工作，并“依据我们党对番民的政纲提出具体的口号，宣布敌人的罪恶，……切实说明此次北进的意义”。

同日 红军后卫部队遵照中央“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的指示，放弃了原来在川西北控制的13座县城之最后一座——理番县城薛城，川军范绍增一部和邓锡侯的1个团于是日占领薛城。

22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由毛儿盖出发进入水草地去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徐、陈行动。

23日 红三军（团）抵达毛儿盖。

同日 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成都。

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决议电告张国焘，指出“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强调如果违背这一方针，将使红军“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该电还明确指出“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左

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东岸，然后（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同日 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而“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力请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同日 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一部进抵班佑以南之贡巴龙山一带，击溃班佑土官泽旺扎西指挥的若尔盖十二部落千余兵丁的阻击，并乘胜占领班佑。

25日 蒋介石“嘉勉克服理番将士，并发奖金二万元，内以一万五千奖范绍增部，以五千元奖邓锡侯部”。

同日 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击溃由求吉寺前来侦察的胡宗南部康庄团1个连。

同日 胡宗南接到其部下关于红军北进的电报。次日，胡宗南令伍诚仁师（即武器精良的第四十九师，共计12,000多人）于27日由松潘漳腊向上、下包座和阿西茸方向推进，企图在包座河一线堵击红军东进北上。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令三十军消灭达戒寺守敌，并相机歼敌援兵；令四军一部消灭求吉寺之敌并控制要道；令一军集结于巴西、班佑地区。

同日 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击溃胡宗南部“游击第二支队”，进占巴西，接着又占领了上藏寺、牙弄寨等地。

27日 蒋介石在峨眉电胡宗南“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积极分路进击”红军，“并再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

28日 张国焘指令川康省委应留守在阿坝并迅速在阿

坝查理寺一带布置各方面工作。

同日 蒋介石获悉其时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有进入川、鄂边区之势”，下达手令，命第二路军停止北进，由薛岳率其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一纵队移驻川、鄂边区防堵二、六军团。薛岳奉命也于月令该部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之一团及第九十九师之一营，均沿嘉陵江南下，开往川东万县和湖北利川待命，该部留川北之第五师、第三十师、第九十六师及新编第二十五师皆驻川北原防，归第二纵队周浑元指挥。

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参加会议的有王稼祥、李维汉、凯丰。会议决定：（一）近期尽可能出一期至两期《干部必读》等；（二）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建设、党的建设、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材料；（三）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此外，会议对青年团的问题也作了研究。

同日 红三十军和四军一部奉令发起包座战役，红一军（团）奉令集中巴西，为此战役的后备队。红三十军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打法，重创敌军。是役至31日夜结束，共毙、伤胡宗南部伍诚仁师官兵4,000余人，俘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牛马800多头及电台、粮食和其它军用物资，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门户。敌代师长伍诚仁受重伤逃回松潘后，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而免职。包座战役的胜利，解除了红军从四川进入陕甘的障碍。

同日 陈昌浩关于右路军攻打上包座敌人之行动部署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且提出：“左路宜很快向此（包座）方向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川南。游击纵队出敌不意，突破敌设在筠连、庆符的三道防线，国民党筠连县县长弃城逃遁。游击纵队占领川南咽喉要地筠连县城，捣毁县府，打开监狱，救出无辜群众200多人，并在城内展开宣传工作。游击纵队此举威胁了泸州的敌人，整个川南地区为之震惊。川南六县官绅联名控告“忠（县）丰（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不大出力”。

30日 由于中共中央和徐向前等人的不断催促，加之在左路军的朱德一再要求张国焘放弃西进方针而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不得不于是日与朱德联名发出“关于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致倪志亮、周纯全的电令，但同时张国焘仍然强调“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将来三十一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吴奇伟所部交防完毕，即由南坝向江油开拔。同日，薛岳率特务营和1个团亦由文县南下，9月1日到达碧口。

1935年9月

1日 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向前发展，这是由于：红二、六军团的胜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调薛岳部10个师去川东；“川敌除孙震外，似均不受蒋令”；截至8月30日，薛岳部周浑元纵队主力尚在平武、

广元、昭化线；包座战役红军“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而“蒋令胡部绕道文县开西固，计程近千里”；红军如果从下包座地区“去西固5天左右，去岷州6天，路大、房多、粮足”。电报提出如下计划：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以第一、第三两军（团）控制川甘交界的罗达地区，第四、第三十两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置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可与胡敌5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即以两个支队分别向东南之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在金鸡关击落敌机一架。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按计划突袭兴文县建武守敌李品三部，在途中受已换防的川军所阻，遂改变计划撤向玉秀。

2日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参加会议的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会议主要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一方面军工作方针作了报告，指出自沙窝会议后，由于长途行军的疲劳衰弱，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整顿休息；说明了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对一方面军工作的指示信。

同日 薛岳率特务营和1个团到达昭化。4日由亭子口出发，经苍溪、阆中、南部，于6日到达南充。

月初 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定召开“宣慰大会”，并与康区各大寺庙活佛和土司头人策划防堵红军事宜。

3日 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五军（团）日前进抵嘎曲河（白河）。张国焘排斥朱德、刘伯承对左路军的领导，借口河水上涨，渡河困难，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是日强令部队“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同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还提出要右路军“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的主张。

同日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苏区工作的指示》。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向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下达指令，命令杀害7月在长官司战斗中受重伤被俘的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代理参谋长陈宏。陈宏在刑场上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给宜宾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4日 国民党南溪县长密令各乡“严密防范”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

同日 中共中央任命周子昆为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任命朱瑞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同日 川军李家钰部进至平夷堡。

同日 国民党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及其直属队于是日从江油出发，6日到绵阳，14日到三台，18日到射洪，20日到蓬溪，22日到南充。

5日 红军右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巴西会议精神，发出从7日到13日的整顿计划，要求前线各军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筹备粮食，恢复体力，准备前进。

同日 红一军（团）月初奉令由巴西、阿西茸北进，于是日抵达川甘边界的高吉村（即今甘肃省迭布县俄界村）。

同日 张国焘在返回阿坝途中于箭步塘再次电令左路军先头兵团退回阿坝，并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卓克基等地的红军部队停止北上。

同日 川军刘文辉部占领党坝。

6日 红一方面军指示一军（团）主力集结俄界，向罗达侦察前进。同时，传达总政治部决定：命令一、三军（团）在原地休整，加强军事、政治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

7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击溃敌李品三部，占领“川南六县之孔道”、江安县第一富镇梅桥，并在此开展宣传活动，将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人。

8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致电时在阿坝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请示“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指出“中（央）政（治）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同日 川军邓锡侯部占领梦笔山。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特务营和1个团日前从南充出发，于是日到达合川。次日，到达重庆。而该总部及第一纵队所属各部队，均从本月22日起至11月11日止结集于南充。

同日夜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共7人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电令张国焘北上，是日夜22

时，中央以上述7人的名义发出了“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三同志”的电报，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强调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地形、给养以及部队发展方面均极端不利，只有向北才有前途；要求张国焘从革命前途考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同日夜 张国焘以朱德和他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徐、陈研究后报告了中共中央。

9日 中共中央电张国焘，指出：“陈（昌浩）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人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同日夜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牙弄三军团驻地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鉴于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拒绝执行北上方针，公然违抗命令，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会议为贯彻已定的北上正确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

同日夜 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仍坚持南下方针，强调“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功）、丹（巴）、绥（靖）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江）、南（江）、巴（中）地形险。南方粮不缺。……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均优于洮（河）、夏（河），邛（崃）、大（邑）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

甚无益”。并说“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鳖”。

10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率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于是日凌晨从巴西地区出发，先到阿西集中，遂离开四川向甘肃境内进发(其时红一军团已在俄界)，是日夜到达拉界宿营。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因不明真相，曾企图拦阻，徐向前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四军、三十军归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政治局在致徐、陈电报中说：“8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是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战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同日 川军邓锡侯部占领大秋地。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以聚歼红军于川甘边地区，并阻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为目的，命令川、甘边区各部队“主力快速”、分别集中如下地点：于学忠主力控置天水，严守陇西徽县等地；万耀煌师主力控置康县，在略阳、康县、成县筑碉防守；周浑元部主力控置武都，一部防守文县；胡

宗南部除固守西固、南坪、松潘原线外，主力应先控置西固；王均部主力应在陇西原防；毛秉文部仍暂住固原、平凉一带；刘湘部应抽调20个团以上的兵力，逐渐向江油、平武、碧口推进，“准备与陇南各军，合围夹击之用”。

11日 中共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中央还在电令中要求张国焘立即答复北上部署。

同日 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在兴文县博望山与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会合，被编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

同日 国民党江安县长向四川省第六行政区专员报告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日前占领梅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情况。

12日 张国焘于是日接连发出两封电报给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攻击“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路”“不拖死也会冻死”；污蔑中央“反造分裂重反团结，……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煽诱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 张国焘电令右路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南返。

同日 中共中央在川甘边界的高吉（俄界）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

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是他“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俄界会议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经过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会议还决定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缩编组成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3日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高吉村，继续北上。

同日 张国焘在阿坝格尔底寺大殿内，以川康省委名义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会议作出决议，污蔑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提出“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向北逃跑”的口号。张国焘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扬言对“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张国焘又策动一些人对拥护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朱德在阿坝会议上严正警告张国焘：“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张国焘还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大小会议，灌输反对“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等思想。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进占长宁县梅硐乡。后获悉敌军追来，便退至古佛台，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取得胜利。

14日 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希望他率左路军北上。电报说明中央率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

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

同日 红军四军、三十军奉命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经过茫茫草地南下。

同日 川军杨森部占领虹桥山。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令刘湘飭“最前线防守部队，……仍须严密筑碉，力求巩固；……至追击部队，不必急进，注意详侦，稳进”。

15日 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强调“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才是真正配合全国红军的行动”。

同日 胡宗南纵队一部进占上、下包座地区。其时，薛岳部周浑元纵队谢溥福师、赵锡光师、万耀煌师集结于川北及甘陕以南地区；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及第一〇四师（原四川“剿匪”第三路军）李家钰部在岷江东岸及涪江流域；川军第二十一军唐式遵部范绍增师几个旅分别在理番县薛城至杂谷脑线和威州、汶川线；川军范绍增师周绍轩旅和川军四十五军（原二十八军）谢无圻旅在灌县沿岷江筑碉，川军杨森部主力6个旅又1个团务精练司令部在绥靖、崇化、丹巴、金汤、天全、紫石关；川军邓锡侯部（不含谢无圻旅）在日隆关、牛头山和双河场、横山岗、大川场、太平场；川军第二十一军佟毅旅在大邑；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李韞珩部在康定及其附近地区。

16日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陕北红军会合。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

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郭述申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17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抄发蒋介石关于整顿军纪训令，称“本委员长深知剿匪要领，不仅凭军事，尤在整饬军纪，爱护地方，与匪争民”。蒋介石在训令中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整理不遑，……尤以估拉民夫、估住民房两事结怨更深。一人于彼，举室惊惶；一宅驻军，全村奔避。”为了与红军“争民”，蒋介石“特印发规章”，“令仰该省政府遵照，并飭属一体遵照”。

同日 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守敌鲁大昌一部。

同日 红三十军和四军经过几天艰苦行军第二次越过水草地，分别于是日和18日返回毛儿盖。然后继续南行，经黑水芦花等地向卓克基、马尔康方向移动。

同日 张国焘关于南下部署致电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等，说九军四团“约于今日由大金川西岸进取绥靖”；九十三师应沿大金川东岸与九军齐头并进，经松岗或大藏寺取党坝向崇化进；二十七师经梦笔山向两河口佯攻；三十二军巩固卓克基、马尔康、松岗、梭磨地区；九十一师固守查理寺、安坝、阿坝地区；九十师和五军为总预备队，接九十三师后“随总部南下”。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经古宋县踏水桥，连续攻占纳溪县文昌宫和上马乡，然后兵分两路，占领永宁河中游重镇叙篷溪（护国镇）。国民党纳溪县政府惊呼“形势严重”，飞报上司求援。

18日 张国焘电令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用全力

……南下打开绥（靖）、崇（化）、丹（巴）进路”，“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同日 红军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部队在哈达铺休整期间，红一、三军负责人致电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说由于一、三军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敌鲁大昌部队，缴获甚多。并说此地物资丰富，回汉民族各半，群众基础好，望四方面军北进，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中旬 以国民党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任总司令的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奉蒋介石电令，采取措施，加强在川、陕、甘边区的防务。

中旬和下旬 驻扎在阿坝一带的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和左路军第一纵队奉命南下，到查理寺后兵分两路：一部按北上原路经石匠宫（四寨）、卡尔古、大藏寺到达卓木碉（脚木足）一带；另一部经按坝（安坝）、草登等地到达松岗。

19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获悉川军教导师一部偕富顺、隆昌两县团防追来，于是日上午后撤向合江县石顶山。

22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攻打叙永县天池镇。敌民团被击溃，叙永县城告急。

23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鉴于7月所招募的在川北地区运送军粮的铁肩队“多系欺骗而来”，“病逃甚多”，不得不于是日训令采取“改善办法”，并令各县仍按月“募夫100名递送补充，限25号以前到达江油”。

同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川军二十军杨森部“堵剿朱毛有功”，特电杨森及全体官兵“嘉慰”。

同日 鉴于红军一部北上，一部南下，蒋介石电令刘湘部以主力在川北之北川、茂县一带，扼要防堵红四方面军南

下，以一部向川西方向“追剿”；令国民党第二路军薛岳部周浑元纵队即由平武、旧州一带向武都、文县推进，防止红军北进，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在南充待命；令第二路军第五纵队李韞珩部在康定、丹巴一带，防止红军由松岗一带南渡大金川；令川陕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及青海马步芳所部，分别在陇南及青海南部黄河沿岸一带，扼要防堵。

24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由川南进入川黔边赤水县宝元乡，利用有利地形重创敌“边防二路”一团1个营。是时，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和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分别召见叛徒王逸涛，策划消灭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事宜。后蒋介石委任王逸涛为重庆行营川南招抚特派员，王不断提供游击纵队情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还在叙永专门设立“招抚特派员办事处”。

25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制定《川西北边区清剿计划》。川西北边区以黄河及省界为界，西至大金川河流，南自威州经理番至古尔沟，东到漳腊沿岷江经松潘、茂县至威州。在此区域内共划分为阿坝（司令官杨宗礼）、壤口（司令官李树华）、卓克基（司令官余松琳）、包座（司令官彭诚孚）和毛儿盖（司令官范绍增）等5个清剿区，每区配置兵力6个团，“限期”将红军进行“清剿”。

同日 刘文辉“遵照委座电令”，对川军二十四军实行缩编，任命陈光藻、刘元瑭、唐英分别为第一、二、三师师长（每师各辖两个步兵旅）。

26日 蒋介石决定设立由他任总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下辖由朱绍良、于学忠、杨虎城分别任总司令的一、二、三路军和三

个防区，两个总预备队，一个骑兵军。

27日 红军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根据当时才了解到的陕北苏区和陕甘红军的情况，作出了把陕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正确决策，宣布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下旬 国民党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向所属各县下达“围剿”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命令，特别提到“长宁所属各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决定“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29日 战斗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是日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任弼时遂以密码给周恩来去电联络：“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自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军总部的电报密码为张国焘控制，任弼时的这封电报次日为张国焘收到。

30日 张国焘没有把任弼时发给周恩来寻找中央的电报转告中央和周恩来，而于是日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的名义给红二、六军团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同日 国民党合江县政府下达命令，令该县“各营、团”防堵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

1935年10月

1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到达武都，在此增筑碉堡，以完成在川北、陕南一带对红军的包围。该纵队第十三师亦于是日经陕南开赴康县、成县，其潘旅则仍在宁羌、广元、昭化一线守备。

2日 蒋介石批准刘湘辞去二十一军军长兼职。此前，刘湘曾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兼职事，蒋以“剿匪军事紧张，嘱其继续负责”，只是将有10多个师的原二十一军编为3个军，即由唐式遵任军长的二十一军，由潘文华任军长的二十三军，由王缙绪任军长的四十四军。这3个军仍“统归刘湘直辖”。

月初 奉命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三十二军，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绰斯甲以北地区。是时草地朔风凛冽，天寒地冻，部队减员甚大。

月初 蒋介石在成都提出：为使“中央”与地方配合得更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应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重庆行营辖区为川、康、滇、黔和西藏。所有西南各省军队，重庆行营都以“委员长”名义进行指挥，所有省区民、财、建、教都在其控制之列。

3日 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

4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电令青海马步芳部注意“侦防”在阿坝方面的红军。

5日 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的白莎喇嘛庙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

人。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团的中央”等，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使其分裂红军的反党活动达到了高潮。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许多干部坚持全党团结，一直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

6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避开敌军的围攻，绕道进占长宁县首镇安宁桥。后川滇两省敌军在四川境内“会剿”游击纵队，游击纵队遂向滇黔边转移。

7日 张国焘在卓木碉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提出“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为达到此战役目的，《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和右侧支队。以第五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共8个团为右纵队，沿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大部共16个团为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以第三十三军等部驻守马塘、卓克基、马尔康地区，进行策应。

同日 蒋介石因“剿匪军事”的需要，由成都飞赴西安。10日抵洛阳。13日飞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剿匪”军事。14日飞抵南京。

8日 红军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向观音河对岸

之敌发出攻击。守敌刘文辉部余松琳旅两个连，裹胁1,000多名绰斯甲土兵，事先已将河上的铁索桥砍断，并在河西岸筑有防御工事。由于敌人猛烈阻击，河水湍急，红军强渡未能奏效。次日夜，红军改变战术。

同日 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的红军，下令设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蒋的职权。宜昌行辕下辖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二十六军等。陈诚动用的兵力共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多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总共约30万之众，“围剿”红二、六军团。使其向东不能进入江西，向西不能沿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向北不能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回师洪湖。

同日 邓锡侯奉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之命率部由大秋地向阿坝方向前进，与红军相持于档岗梁子。此前，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还命杨森部速向卓克基进剿，并限15日占领；命刘文辉部除留两团于雅安附近之外全部移驻康北丹巴、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防止红军南下；命西康宣慰使诺那，“动员民兵防剿”；命李韫珩部，专防泸定、康定与雅江一线；命李家钰部岷江部队，定期移驻西昌各县，所有松潘至威州遗防，由王缙绪派队接守；命刘湘抽调二十一军15个团以上兵力，进驻雅安附近。

同日 川军杨森部占领两河口。

9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颁发《“划区绥靖办法大纲”训令》，将红军所到过及其时仍有红军的四川94县（不包括正筹建的“西康建设会”所辖之范围）划分为8个绥靖区。第一区司令官李家钰，司令部设西昌，管区10县；第二区司令官邓锡侯，司令部设崇庆，管区17县；第三区司令官杨森，司令

部设宜宾，管区11县；第四区司令官刘文辉，司令部设雅安，管区6县；第五区司令官孙震，司令部设绵阳，管区18县；第六区司令官唐式遵，管区川北14县；第七区司令官潘文华，管区川南9县；第八区司令官许绍宗，管区涪陵、酉阳、黔江等9县。

10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电令第五十三师李韞珩部“扼守靖化、崇化、大金川沿岸”，严防红军渡过大金川河。

11日 红军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突袭驻守绰斯甲的李韞珩部，是日夜占领绰斯甲。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通飭严防红军侦察密令，称“此次派到灌县一线”进行侦察的红军“总共80余名”，命令“所属一律严为防范”。

12日夜 红四方面占领绥靖。守敌余松琳部向甘孜、道孚溃退。红三十军同日占领崇化。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电令其驻防丹巴部队死守；令杨森部出万林向红军侧击；令李韞珩部主力控置康定；令马步芳部驻青海玉树之骑兵南移康境，向德格、甘孜以东地区活动。

13日 红四军一部进占独松。

15日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部在两河口击溃杨森部第七旅，并星夜猛追溃敌。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奔袭川黔要道上之燕子口，缴获部分枪支，并截获敌人从重庆运来的几十匹马驮的物资。

同日 朱德、张国焘联名发出《关于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给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同志》的电报指示。指出：红

二、六军团“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亦）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电报并说明“上述意见供给参考，……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

16日 红四军进占丹巴县城，敌旅长余松琳率部溃退至大炮山一带。

同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专员陈启图电刘文辉，称“绥（靖）既不守，金川之险，已不能扼”。要求调派军队遏止红军西进。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到达水田坝。

17日 红九军一部在与敌激战后攻占抚边。

同日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召开会议，讨论朱德、张国焘15日电指示精神及二、六军团新的行动方针问题。

18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消灭抚边河东岸杨森部两个营。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兵出将军碑、达维”，截断敌人后路。

19日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

同日 朱德、张国焘再次电二、六军团负责人，重申15日电示内容，并说“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电报仍强调由二、六

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行动方针。

20日 由于蒋介石“剿匪军事之重心”的变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于是日结束，重庆行营定于11月1日正式成立。

同日 红三十军和九军二十七师击溃杨森部杨汉诚、李朝信两个旅，占领懋功县城。

同日 张国焘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此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以后，“以主力乘胜迅速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组织进攻。

21日 由于刘文辉和杨森部失守绥靖、崇化等地，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于是日至27日先后发出如下命令：（一）杨森部固守天全（不含）、宝兴至大碛碛碛线；（二）刘文辉部固守金汤，守备天全、泸定与雅安、汉源、泸定线；（三）邓锡侯部守宝兴（不含）、经大川场、万家坪、水磨沟、耿达桥至幺姑娘塘碛线；（四）范绍增部仍守理番、关口至幺姑娘塘及关口至大秋地线；（五）刘湘所部除郭勋祺部9团集中天全外，另派18个团由绵竹、广汉西开，逐次集中天全、名山、邛崃、雅安；（六）刘湘应增厚沿岷江防务，及酌量控置兵力于北川，并严令孙震部加强与戒备其时在北川、江油、平武、松潘一线原防，以防止红军回击涪江及嘉陵江地区；（七）李家钰部以一旅守冕宁、九龙，一旅防守上自泸定（不含），下至大树堡（不含）沿大渡河南岸，其余部队暂开西昌。

22日 刘文辉复电西康专员陈启图，称派往康北道孚、炉霍的国民党军队未到来之前，“应饬调民兵扼守碉堡，施行坚壁清野，依情况饬遵，务须节节抵抗”。

同日 红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日隆关击溃邓锡侯部李勋伯团，占领日隆关。至此，历时15天的《绥崇丹懋战役》结束。是役，红军击溃敌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17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俘获人枪各3,000，占领丹巴、懋功两县城和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及达维、日隆关等要镇，达到了战役目的。

24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贵州黔西县遭1,000多敌人包围。游击纵队付出惨重牺牲冲出敌包围圈后，又与强敌连续作战。当游击纵队回到川滇边境时，只剩下200多人。

下旬 红四方面军主力移至奎庸、金汤、懋功以南一带。

25日 红军大金省军区司令员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张克求于是日发出《给各县游击队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大金省军区所属各县游击队应完成以下七项任务：（一）“应以最大努力去消灭地主反动武装；”；（二）“防止敌人小部队扰乱我军的后方”；（三）“分散敌人兵力，使我军攻击容易”；（四）“侦察敌人主力所在”；（五）“破坏敌人组织与交通或焚毁其粮食子弹”；（六）“破坏敌人之策源地及扰乱敌人之后方”；（七）“截夺敌人运来的生活品”。此前，中共绥靖县委员会已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建立。

27日 蒋介石电刘湘处分绵阳县长鲜英。电称，为追剿红军而抢修的川陕路“绵阳县境路基仅成百分之七十八，路面仅成百分之四十，……民工反而减少”，鲜英以后“若不改正”，“即予撤职，押送本行营以军法惩处”。

同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专员陈启图电刘文辉，称他虽已“飞令道（孚）、炉（霍）、甘（孜）、邓（柯）、石（渠）、瞻（化）各县长飞调民土兵团，分扎要隘，严守碉堡，认真坚壁清野”，但是“若无军队为中坚，殊难得其死力”。要求蒋介石派李韫珩部到道孚、炉霍、甘孜防堵红军。

同日 红五军到达丹巴接防；红四军进攻金汤，并于次日占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越过夹金山，歼灭杨森部第一旅团和地方团队共约1,7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为相机袭取天全致电倪志亮、许世友“速侦察金汤通宝兴大小道路，……先以小部向天全侦察制敌，大部集结前进”。

28日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部到达懋功县汉牛。

同日 徐向前、陈昌浩在达维致电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集结兵力，“以便在宝兴彻底消灭杨森，并乘胜进芦山”。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在行营参谋团行将结束、归并重庆行营的“最后纪念周”会上，就参谋团入川以来的经过和四川军事政治近况发表讲话。

29日 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翻越夹金山到前线指挥。

30日 驻防盐井坪之杨森部第六混成旅林相侯团获悉红军将至，乃望风而逃，红军遂占领盐井坪。

同日 蒋介石行营参谋团通令各部，称参谋团奉令结束，成立行营，而行营将由成都移驻重庆，关于围剿红军的战略由行营颁布，至于布局作战事项，仍由刘湘负责指挥。

31日 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除通报有关蒋介石和日本的“密讯”以及中央红军已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和

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外，特别指出：如果南下受阻后，“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

同日 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率红军中纵队一部沿东河而下，占领离宝兴县城7公里的新磨房。

本月 中共大金省委员会成立，省委机关驻绥靖（今金川）老街，省委书记邵式平，副书记何柱成，秘书长李志用，组织部长陈庆先，宣传部长李中权（后张然和），财政部长吴永康，妇女部长吴朝祥，土地部长余洪远。同时，还成立了少共大金省委，吴树德（吴瑞林）和郭先虎先后任书记，熊作方任组织部长，谢明任宣传部长。

本月 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金汤设制局苏维埃政府于月底在金汤宣告成立。

本月 在蒋介石行营参谋团于本月底结束以前，所有川军缩编情形如下：（一）第二十军仍以杨森任军长，规定所部缩编为3个师，共14个团（因其时正与红军作战，尚未实行）；（二）将第二十三军之一师及新编第二十三师并入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缩编。对原第二十一军，新编为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四十四军，在参谋团结束以前，仅规定为83个团，而应编为若干师，尚未决定；（三）第二十四军仍以刘文辉任军长，所部经规定缩编为3个师，共16个团；（四）原第二十八军，因番号重复，改为第四十五军，仍以邓锡侯任军长，所部缩编为5个师（陈鼎勋、黄隐、马毓智、杨秀春和陈离分别任师长），共24个团；（五）原第二十九军，因番号重复，改为第四十一军，以孙震任军长，所部缩编为3个师（王铭章、曾宪栋和孙震分别任师长），共19个团；（六）新

编第六师改为第一〇四师，仍以李家钰任师长，共属9个团。以上六部，共缩编为116个团。

1935年11月

1日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夺取宝兴县城，消灭杨森3个旅，俘敌1,500多人，并乘胜进占灵关和双河场。

同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正式成立。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对记者说：川、滇、黔、陕、甘、宁、青各省军政均受行营指挥。

同日 重庆行营为防止红四方面军从宝兴、芦山、天全东出和南进，于是日规定如下部署：（一）刘湘督饬二十军唐式遵、二十三军潘文华、四十四军王缙绪，各以一部固守名山以北阵地，抽出主力进出名山雅安；（二）四十一军孙震部只留3个团于绵阳、江油、安县，其余16个团悉开新津，转进洪雅，沿雅河布防，主力控置于观音场；（三）二十一军杨森部守洪雅，并布防于名山、草坝场之线；（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死守雅安、汉源两点；（五）中央军四军吴奇伟部、三十六军周浑元部及杨步飞师归入第二路军序列，归薛岳率领，由川北经新都、新津、蒲江、洪雅，取捷径向荣经、汉源一带堵截；（六）派别动队两个中队赴西昌、会理等8县，“办理组训民众，构筑碉堡，及坚壁清野事宜”。

2日 红四方面军负责人陈昌浩、徐向前到达宝兴，并于是日致电王树声、李先念，指出“我们目前战略：在运动战中首先消灭杨国桢、饶国华两师，然后集中打郭勋祺或邓锡侯”。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赶赴邛崃坐镇，指挥川军各部围剿红军。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在芦山县城北面任家坝与敌教导师杨国桢部章安平旅展开战斗。次日，战斗进入激烈阶段。国民党政府第三航空队两次出动飞机进行轰炸。

月初 刘湘为确保川康交通及名山、芦山、天全与雅安各要点，将川军作如下部署：（一）第一路军邓锡侯部主力，扼守灌县、大邑川西之线，一部扼守三角堰地区；（二）郭勋祺部在名山、万古场一带构工防守；（三）第二路军之第四十一军孙震部，集结周公水、大兴场、草堰场一带，由抚边、懋功转进至洪雅、中山坪、白庙子一带，与第一路军及郭勋祺师连系，堵击南进红军；（四）王缙绪部守备三角堰地区；（五）潘文华部主力扼守名山、车岭，一部守备芦山附近；（六）川康军十二旅，主力守备雅安，一部守备天全；（七）第三路军李家钰部，由茂县向富林、西昌一带推进。

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4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鉴于根据地日益缩小，十多倍于红二、六军团的敌人不断逼近，会议决定突破敌人的“围剿”，作突围前的准备。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三航空队10余架飞机对芦山任家坝一带红四方面军阵地狂轰滥炸，使前来增援的红军两个团

造成较大伤亡。

同日 红四方军第四军进攻底兴。

上旬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二郎滩渡过赤水河，重返川南。

5日 蒋介石宜昌行辕发布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封锁的密令。

同日 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二十七师攻占大川场，歼灭邓锡侯部林翼如旅。红军前锋抵近邛崃、大邑县境。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进抵泸定县城附近的五里沟，与敌李韞珩部对峙，掩护红四军向天全进攻。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教导师杨国祯部在芦山城内放火烧毁东街。

6日 张国焘电陈昌浩、徐向前，提出“宜查明沿金川南岸转移兵力即取康（定）泸（定）办法”。

同日 红四方面军突破三角堰川军阵地，进至马湖营。

同日 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随时规划颁行“剿匪战略”，由刘湘负责指挥前方作战，各军（含李韞珩部）应仍归刘湘指挥。

同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城防司令部参谋处致函康定县政府，“飭派便探四处侦察匪情”。次日，康定县长华浩然“飞飭”该县七、八两区区长派人探察红军消息，命令所属“严守各处隘口”，防止红军化装入境。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中央军十六军军长李韞珩派兵前往孔玉、葛坝等处“游击镇摄”。

7日 陈昌浩、徐向前复电张国焘，不同意“进军康定、泸定，以道孚为战略方向”。复电还指出：“如马上进西康，补

(给)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同日 红四方面军右纵队从泸定岚安乡出发,翻越二郎山马鞍腰山口,沿昂州河向天全的两河口进攻,继占紫石关、大岗山。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继续攻打芦山城,守敌教导师长杨国桢称“与芦山城共存亡”,给各旅长以重赏、重罚特权。

8日 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二师进逼天全城西郊,与郭勋祺“模范师”二旅徐元勋团激战。后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指挥红军歼灭徐团。

9日 红四方面军攻入天全旧城,直捣守敌“模范师”师部,敌师长郭勋祺几被生擒。

同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占领五家口(雅安上里场)。刘文辉下令砍断雅安河上浮桥,集中兵力守雅安城。川军“天、芦、名、邛作战四川南路剿匪军”总指挥潘文华闻讯后将其总部从名山转移到蒲江县大塘铺。

同日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固守横山岗。电报还指出:“速发动群众分粮、分田,夺取小资产阶级,号召抗日反蒋,设法与邛(崃)、大(邑)白区党游击队联络”。

10日 红四方面军右纵队四军和三十军占领天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

12日 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并发布《关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指示》。鉴于红四方面军已南下,中央指出:“关于方针你们目

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同日 川军教导师师长杨国祯率残部经飞仙关溃逃雅安。红军在经过10天的血战后，于是日晨攻进芦山城。至此，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一大片土地，毙、伤、俘敌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张国焘于是日致电红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夸大个别战斗的胜利，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同日 准备重新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举行第一次部长联系会议。参加会议有邵式平、郭纯德、余洪远、张然和、罗大洲、康克清、杨中行、刘杞等。会议决定18日召开群众大会，以通电形式发出宣言和布告，正式宣布西北联邦政府重新建立。

同日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调其主力王缙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及邓锡侯、李家钰部，连同原来的兵力，共80余团，集结邛崃、大邑、蒲江、名山等县。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总部及吴奇伟纵队奉蒋介石命令由南充向成都“星夜兼程进发”。周浑元纵队也奉令由武都“驰赴成都集中”，其川北及陕南之线仅留第十三师、第一四〇师在广元、昭化、绵阳一带防守待命。

13日 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率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二七九团到达中里场，其中一部向棉花山、蒙顶山开进。红四方面军共集中15个团，由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进攻。

同日 名山县城被红四方面军占领。雅安城内川军被围。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4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总部及吴奇伟纵队到达遂宁，后经乐至于19日到达简阳。

同日 蒋介石电令刘湘固守邛（崃）、名（山）、雅（安）、荄（经）、汉（源）、泸（定）、康（定）之线，“并设法打通名（山）雅（安）交通”。该电称：“探报天（全）芦（山）失守，名（山）雅（安）告急。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所作所为能力，以致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应严飭各高级将领负责坚守名雅，倘再有疏失，决以军法从事”。

中旬 红四方面军在芦山县成立中共四川省委（也称“川康边区省委”，书记傅钟）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省委（书记罗华民）。在此前后，宝兴、天全、芦山、太平、雅安、荄经等县也相继成立中共县委、共青团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抽调大批干部在此区域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肃清土匪，支援前线等活动。

中旬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途经古蔺县镇龙山、鱼岔、坛厂等地，迭遭川军追堵，减员甚大。是时，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命令川南各县“尽力协助军队”，“剿灭”红军川滇黔游击

纵队。

16日 陈昌浩致电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现抗日反蒋潮流正发展，决调王维舟同志任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请即令王到芦山前敌政治部”。

同日 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攻占百丈，并于是日下午乘胜占领黑竹及治安场，后敌援军赶到，红军攻势受挫，红四军一部由天全翻老君山进入雅安城郊朱家岩、紫石里等地。

同日 徐向前致电张国焘：“迫邛（崃）方（面）之敌后退击之，以打到岷江西岸为目的”，歼灭郭勋祺、李家钰、杨国桢部。

同日 西北联邦政府召开第三次部长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以张然和为主任，以罗大洲、吴永康、张琴秋、余洪远、克基（藏族）等为成员的“条例起草委员会”。

同日 国民党政府空军飞机2架向尚无红军一兵一卒的荣经县城“繁盛街市”和县属东区、南区两个场镇投掷十多枚炸弹，并用机关枪扫射，炸死炸伤数十人。荣经县长电呈四川“剿匪”总部“制止空军”，并惊呼：“城未陷，轰炸先施，误会耶？抑有他故耶？”

同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长华浩然向中央军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报告：西康宣慰使诺那“擅调民兵自用，将通匪区路线放弃不顾”。

17日 张国焘致电周纯全和川康省委，提出组织格勒得沙政府和把川康省委改为川西省委，电报说格勒得沙政府“包括大小金川18土司区域，北至阿坝、毛儿盖，东至松（潘）、茂（县）、汶（川），西至雅砻江，南达木坪、康定”；

川西省委则应“在夹金山以南进行工作”。

1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今金川）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重新成立，来自绥靖、崇化、丹巴、绰斯甲、党坝等地的150多名代表和绥靖附近的军民近2,000人参加了大会。重建后的西北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熊国炳、刘伯承、马显文（回族）、兰卡（藏族）在会上宣告就职。作为西北联邦政府组成部分的格勒得沙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也于同日宣告成立，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由克基（藏族）担任，副主席为杨海山（藏族）、孟兴发（藏族）和马显文（回族）。由各地游击队组织的格勒得沙中央政府民族革命军也于是日成立。以后，波巴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也加入了西北联邦政府。重建后的西北联邦政府最初以金川流域为中心开展工作，后随四方面军主力西迁康北。至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西北联邦政府在四川境内的工作才在无形中结束。

19日 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刘家坪、瑞塔铺分别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开始突围。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的部队为：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第二军团，辖第四师（3个团）、第五师（2个团）、第六师（3个团）；萧克、王震领导的第六军团，辖第十六师（3个团）、第十七师（3个团）、第十八师（3个团）。其时，红二、六军团共17,000多人。

同日 刘湘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东北、东、南三面向名山县百丈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阵地反扑。

20日 红六军团突破敌人的防御，渡过澧水。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九十师（师长欧震）到达成都。

21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在雅河架设浮桥，准备南攻荣经、汉源。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之一部，由名山分向大兴场、蒲江与洪雅方向前进。

同日 薛岳率总部及直属部队到达成都，至27日在成都待命。

同日夜和次日 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沅江封锁线，下旬进入湘中地带。

同日 徐向前致电张国焘、陈昌浩，提出关于作战方针的建议。建议指出：由于红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阔，布置极难”；而敌人兵力已集结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拟集兵在夹门关对面及朱家坝、石碑岗、蒙顶山、金鸡关一线。抽出兵力集中整理补充……若该方不易得手，敌方续进，即先予敌人杀伤，然后另行大举击敌”。红军在百丈、黑竹、鹤森场、夹门关等地与敌人作战持续七昼夜，歼敌万余人。但由于张国焘的整个战略方针的错误和川军集中80个团以上的兵力对付红军的15个团，红军虽付出很大代价，死亡四、五千人，仍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2日，百丈关被川军突破，红军与川军展开巷战。下旬，红军撤出百丈地区。“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结束。是役系张国焘率军南下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转折点，也是其南下方针失败的开始。

21日至24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亲自指挥，选择陕甘根据地的直罗镇为战场，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2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长向中央军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和西康行政督察专员陈启图报告西康宣慰使诺那派员随带马队400余名，在该县二、五两区扰害，还“乱抢人民糈粃、青棵，宰杀猪羊”等情况。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转奉蒋介石关于“湘鄂川黔边区邻匪及接近邻匪各县”都要“严密保甲组织及成立清乡善后委员会”的命令，飭“本省各县，……自应遵令重新设立，以应清剿之需”。

23日 许世友率红四军一部占领荣经。成都的富户因“荣经失守，洪雅告急”，昼夜乘车逃往重庆，重庆为之震动。

24日 川军二十四军步兵四旅旅长袁国瑞转奉刘文辉命令，飭下属各部注意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回连士兵的“行动言语”，并且“此后不得再为收补此类逃回士兵，募补新兵一律停止”。

下旬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召开会议。鉴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只剩下100多人，决定将纵队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余泽鸿、刘干臣、刘复初率领，在川南坚持斗争；第二支队由龙厚生等率领，去滇黔边活动。

25日 张国焘为固守原有阵地致电陈昌浩、徐向前，并告知红二、六军团“已由大庸、桑植间突出封锁线行动，要求我们助他消息”。

同日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部围攻汉源县城（今清溪），一部进抵大渡河南岸的富林镇。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在由川南赴滇黔边的途中，于兴文县炭厂遭到川军陈万仞部袭击，队伍被打散，游击纵队分队活动的计划暴露。川军几路并进，对拟在川南

活动的第一支队跟踪追击，江安、长宁、兴文、古宋四县的国民党政府也增派保安中队“助军协剿”。

27日 陈昌浩致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倪志亮和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执行“部队半月整编计划”。

同日 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不计劳乏……经洪雅取捷径向荃经汉源一带”围剿红军。薛岳部于28日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于30日到达彭山县谢家镇。

同日 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政府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健：迅速围歼红二、六军团，“毋任流窜”；更不能使其经黔、滇、康、川等省边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并提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同日 国民党芦山县政府在邛崃县城东街设立“流亡”行署。

30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第三十六军抵洪雅，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第四军到丹棱。

本月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进驻天全县红岩坝。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宣传部长兼政治课主任教员张际春。

本月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罗南辉、董振堂、杨克明：“为充实军力，交换经验，统一指挥，节约干部起见，决将五、三十三军两军合编为五军。董任军长，南辉副，黄（超）为

政委，克明仍为政治（部）主任。直辖4个团，不设师。”

本月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等人，要他们迅速掀起抗日反蒋宣传的高潮。

本月 中共崇化县委员会和懋功、绥靖、崇化三个县苏维埃政府以及丹巴县格勒得沙共和国政府先后建立。

本月 国民党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就安县县长9月报告川军第六路军在该县几个场镇估拉应送邓锡侯部的数百名夫役，造成“人民均皆逃匿，田谷亦多霉滥未收”的影响一事，发出训令，禁止“估拉运米力夫情事”。

本月 国民党政府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鉴于“现在窜川赤匪尚未肃清，各县清共工作自应积极进行”，训令各县做好“清共、侦缉、宣传各种工作”，并“检发清共概况表式”，飭各区县“每届月终逐一详填呈报本署”。

1935年12月

1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部由彭山县谢家场到眉山县万胜场，次日抵丹棱县母店。

2日 芦山方面红四方面军10,000余人，与川军第一路军邓锡侯部，第四路军杨森部，第五路军范绍增部，对峙于五家口、新山镇、大兴场、新市场与水口坝一带。

同日 由荣经东进之红三十三军一部，进至将军坡、晏场一带，与国民党洪雅县团队对峙。

同日 国民党政府四川“剿匪总部军事联络组”，奉令改为“军事督察组”，分前敌“剿匪”军事为以下10组：邓锡侯军，李韞珩军，刘文辉军，杨森军，李家钰师，郭勋祺师，范

绍增师，饶国华师，郭昌明师。

同日 原奉令开往峨眉、乐山集中，“以巩固川西后方”之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行经眉山，奉蒋介石命令改归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指挥。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基于当前状况”，令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以有力一部驰援将军坡洪雅团队，并占领两河口，向大河边、炳灵寺一带游击，掩护主力向荣经推进”。

同日夜 红四方面军一部围攻汉源县城，战斗异常激烈。

3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抵洪雅。其时，杨森部守备雅安、洪雅间，孙震部守备雅江以南地区。薛岳“商请”杨森统一指挥洪雅各机关，严密守备城防；电令周浑元部先向沙坪、望鱼石、炳灵寺之线前进，以“消灭”荣经附近的红军。

4日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指示该军应集中兵力坚决巩固土巴垭口及木板燎通思经坝要点，“迅速筑工坚守”。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电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转饬汉源县长协同国民党驻军固守汉源。

5日 陈昌浩、徐向前为“勿轻收阵地”分别致电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倪志亮。

同日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同志”：“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

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6日 红四方面军一部再攻汉源。

同日 红四方面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就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基本任务、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等问题作出了《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决议》。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十六军军长李韞珩因康定县第七区区长报告红军攻碉堡请派援军一事，向康定县县长华浩然发出指令，并飭派部队“驰援”。

8日 国民党政府第三航空队飞机自成都飞临荣经上空，将荣经城南铁索桥及城北红军架设的浮桥炸毁一座。

同日 川军占领木梯老、九顶山和玉林山之线。

同日 刘湘出巡邛崃前线，向官兵训话。

9日 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同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在雅安以南的孔坪、望鱼石之线交战。

同日 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固守九顶山、木梯老阵地致电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倪志亮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同日 国民党政府汉源县长向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报告红军封锁汉源县城和富林镇并占领渡河点的情况。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三航空队配合薛岳第一、二纵队进攻荣经。薛岳离开洪雅到雅安晏场，其部下奉命开始向四居

坪、马鞍山、羊子岭之线攻击。在“两纵队屡次进攻，均无进展”的情况下，薛岳乃“电请”刘湘飭所部向名山方面红军进攻，以期牵制；并请第三航空队于10日派机群进攻。薛岳部第五十九师于是日占领天台山、鹿子山，第九十师占领白果坪。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长宁梅硐被川军包围。游击纵队突围后，仅剩下30余人。

10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一、二纵队在空军机群猛炸红军阵地的配合下，继续向荣经进攻。该部第九十师于是日占领四居坪，第五十九师占领禄皇山。

上旬和中旬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在二、六军团主力长征之后，奉命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兜圈子”，牵制敌人，策应主力突围，多次出入于鄂西南和川东南一带，本月上旬和中旬进入秀山、酉阳。

11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五十九师占领九龙山，第九十师占领马鞍山、樊山岗。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三航空大队的飞机在雅安南面的观音场、福音场和西面的新添站上空侦察轰炸。

同日 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主力退出湘中，转移到贵州的石阡、黄平、镇远地区，以摆脱12个师又1个旅的敌军追击，创造新根据地。

12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运输处第一分队汽车四队两辆从重庆为“围剿”红军的部队运载军棉服的军车，在简阳县大山东麓道上被五、六百民夫捣毁。

13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由洪雅向荣经推进，该第五十九师占领马皇岗、观音铺。

同日 在邛崃、名山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与敌人相持于蒙山山脉及镇西山之线。

同日 蒋介石训令四川省政府飭查川康边境各县、屯长未能“固守待援”、“与城共存亡”，以致“城池失陷”，“亟应查明严究”。

同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在酉阳东北部渡酉水。

14日 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政府军队战斗进入激烈状态。红三十二军撤离汉源向荣经的荣河场、张家山开去。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九十师占领麂子岗、福兴场、羊子岭。薛岳惊呼在荣经与红军作战“鏖战最烈，牺牲甚大”。

15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九十师欧震部在第二路军其他部、川军和第三航空队的配合下占领荣经。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于是日连电蒋介石报告占领经过。国民党中央政府奖赏第五十九、第九十两个师各3,000元。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转移到江安县碗厂坡，追敌跟至，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余泽鸿牺牲。

15日至23日 雅安县苏维埃政府在中里召开县苏维埃第一届代表会议，讨论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等议案。以后，天全、芦山等县也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

16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所辖川军各部队，用100余团的兵力，在名山、雅安、邛崃和川西其它地区配合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围剿”红四方面军。其守备位置为：邓锡侯部24个团守灌县大邑以西之三线；王铭章部6个团于洪雅及观音铺荣经之线集结待命；曾栋宪部6个团集结草坝场、水口一带；孙震部6个团集结周公水、大兴场一带；李家

钰部9个团于大树堡、富林、西昌一带守备；杨森部7个团集结洪雅及中山坪、青江堰一带守备；唐式遵部16个团驻木梯老、三角堰一带守备；王缙绪部16个团驻三角堰、朱家场一带守备；潘文华部16个团驻万古场、名山、车岭一带守备；郭勋祺部8个团驻名山、万古场一带防守；川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约10个旅驻邛崃一带守备；川康军12个旅驻雅安、紫石里及汉源一带守备；余松琳旅3个团于泗坪场、新庙场一带守备。

17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所剩20多人撤到踏水桥，决定留下包括纵队司令员刘干臣在内的伤员到农民家里医治，其余人员上山隐蔽。后刘干臣在古宋县东坝与前来搜查的敌人英勇拼杀，壮烈牺牲。已上连天山隐蔽的游击队员，依靠群众，避开敌人，克服困难，保存了力量。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邛崃电令川军二十军教导师杨国桢部章安平、石照益两个旅“即行进驻治安场待命”。

17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于23日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议于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瓦

窑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的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重要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还阐述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久，中共中央将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和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回国的消息，向时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18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县长华浩然发出训令，不准该县第七区明羌民团因红军占领青箐而准备后撤。

22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进至湖北利川和四川石柱之间。

23日 川军二十四军旅长袁国瑞转报荣经、天全红军动态，其中提到红军“在新场、始阳间共搭浮桥七八座，现正搜集当地所有粮食，转运天全、宝兴”。

24日 刘湘赴大邑，与邓锡侯会商“剿匪”办法，后返回邛崃。

25日 杨森率所属师旅长3人，由洪雅抵邛崃向刘湘报告战况。

26日 中共四川省委在芦山县任家坝召开省委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省委书记傅钟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在会上作报告。会议作出了《四川省委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工作决定》，指出四川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为以下六项：（一）“抗日反蒋运动在赤区的组织工作；（二）肃反与“打反动”工作；（三）动员运输与集中粮食问题；（四）供给红军物资需要问题；（五）组织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与扩大红军工作；（六）统一财政和发展经济问题。

27日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还在这一报告里第一次对“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的长征的伟大意义进行了科学的论述：“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7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三营在彭水县东北方向与敌九十二师两个团激战，掩护红十八师主力于次日黎明从黔江西北的贾角山安全渡过濯河。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离开邛崃回到成都。

29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3,000余人抵达鄂、川交界的朝阳寺。后红十八师冲破敌人的阻截，进入四川黔江县境，顺利南下。

30日 川军二十四军一三七师第三旅向所部转告关于红四方面军“正急造木筏”、“疏开清漪桥河口之累石，使水引入雅河，企图偷渡”等情况。

同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进至黔江县南部的两河。

31日 红二、六军团主力渡沅江。

同日 蒋介石命令第二路军薛岳部“即日攻取天全、芦山”，并令刘湘饬所部协攻。是日，薛岳决定先进攻红三十二军在荃经西北之懒板凳、王家山、荃河场一带阵地，然后于天全、芦山地域“歼灭”红四方面军主力。

月底 红四方面军发表《人民抗日救国大同盟十大纲领》，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救国。

本月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鉴于各地为对付红军而构筑的碉堡，不少“逾期已久尚未完成，及已成碉堡相继坍毁情事”，发出训令，要各地“自定限期分别完成”，否则“皆分别予以惩处”。

本月 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守备康（定）泸（定）有功，赏洋10,000元”。

1936年1月

1日 在中共金川省委的组织与领导下，格勒得沙（嘉戎藏语：“格勒”意即“藏族”，“得沙”意即“百姓”）革命党中央党部于是日（“格勒得沙共和国2年1月1日”）发布《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党章明确指出：“本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纲提出“十二大主张”：（一）格勒要独立，要自由平等。（二）打倒压迫格勒的川军二十四军、二十八军和一切汉官、军阀、国民党。（三）打倒强占格勒的康藏的英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四）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政府。（五）废除土司制度。（六）没收汉官、军阀、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给格勒得沙。（七）取消川军二十四军、二十八军、汉官、军阀、国民党的一切捐税厘金。（八）反对天主教、基督教，不反对喇嘛教。（九）发展格勒文化教育。（十）成立格勒得沙自己的革命军、自卫军。（十一）格勒、格巴（汉人）、回回（回族）一律平等。（十二）联合苏维埃红军及赞成本政纲的任何团体、政府和军队。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南进，“并压迫于雅河北岸”，与川军“一举而歼灭其主力于天

芦地区之目的”，决定先攻击驻守在懒板凳、王家山、小河场的红军。是日上午，薛岳部第一纵队第九十二师由大田坝出发，下午利用浓雾大雪，向红军阵地进攻。战斗进行到次日上午，红军后撤，薛岳部占领懒板凳、王家山。

同日 国民党中央政府元旦授勋：刘湘给予二等云麾勋章，郭汝栋给予四等宝鼎勋章。

同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经甘溪进入酉阳县草坝场（现属黔江）。接着，经高庄、楠木菁、菊花坝、三岔坝、双桥、金家坝、马蝗井、关子门等地，于7日进入贵州省松桃县的甘龙。9日，到达江口的红六军团驻地，与主力会合。10日，红十八师随同二、六军团主力长征。

2日 川军四十一军孙震部两个旅“接扼”名山、雅安境内白庙子至草坝场间第二十军防务，并在此加固阵地。

4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第七区区长向康定县长报告在鱼通地区与红军作战和该区长“统驭民兵，迭次击退”红军的经过。康定县长于11日将此情况向十六军军长李韞珩和西康行政督察专员陈启图转报，并要求给该区长拨子弹。后李韞珩命令所部拨给1,000余发子弹。

6日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致电已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诬蔑中央路线为“机会主义路线”。电文还说，中共中央“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形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的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对敌人。”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二、六军团西进，特作出如下规定：（一）黔军固守铜仁、省溪，守备扎佐经息烽再

经石阡至龚滩乌江沿岸，并控置重兵于遵义。(二)新三十四团由永绥延守至四川秀山，徐源泉部由来凤延增至四川黔江。川军许绍宗师守备龚滩、酉阳、秀山之线，防止红二、六军团“回窜”。(三)刘建绪部“不分畸域”，尾红二、六军团“穷追”。

7日夜 红四方面军一部由仙峰山经牛路沟，袭击薛岳部土地岗阵地。

10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与原红一方面军五军团月前奉命合编为红军第五军，是日在丹巴合编完毕。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令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和川康善后督办公署：“严饬纠正士兵扰民恶习。”

同日夜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一部袭击驻守在惠台端的红军。

11日夜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九十二师一部，乘雪夜“衣白棉衣”偷袭青松岭红军阵地。

12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在重庆报告“此次晋京谒蒋委员长经过”。称：“此后行营大部分政治指导工作，将归划行政院主办。其他与剿匪有直接关系者，如川康黔各省，仍由行营负责办理。”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攻占毛牛等地。

13日 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第二中央。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由重庆飞抵成都，刘湘等到凤凰山机场迎接。顾祝同此次成都之行“系与刘湘暨各将领晤商剿匪军事进展事宜”。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在荣经向川军各部密报红军动态，称徐向前在天全，朱德在芦山。

14日和15日 薛岳再向川军各部电告红军动态。称：“据探报”始阳红军甚多；红军“四川抗日救国总指挥王维舟”率部“最近五六天向灵关、宝兴方向去”；许世友率部在泗田坝、陈家坝一带；罗炳辉部在月来山、仙峰山一带。

16日 中共中央秘书处将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决议案》内容摘要致电张国焘，并责成转告红二、六军团。其主要内容为：（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一个新的时期，这大大地扩大了民族革命的路线。（二）在此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最广泛地建立下层的中上层的统一战线。（三）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四）目前的民族革命高潮，同大革命时期不同之处在于苏维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胜利了，苏维埃与红军是反日的基本力量，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中心。（五）为了保证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一切政策、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争取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六）党必须同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七）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大量培养干部，使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同日 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同日 红四方面军从是日起召开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预备会议。为防敌机轰炸，会议没有在县城召开，而改在芦山县清源乡大板桥村举行。由于其时前方战斗紧急，各县县委书记都没有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全、芦山、宝兴、雅安、太平、名山等县的县、区、乡苏维埃代表300余人。

会议由熊国炳和傅钟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紧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以扩大红军为中心，完成包括地方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后天全、芦山、宝兴、雅安、荣经、名山六县共有4,000多人参加红军，其中名山、荣经两县各在700人以上。张国焘在预备会上作了两次报告，讲了“大会的意见”、“大会的任务”、“党怎样来领导苏维埃”和“怎样组织大会”等内容。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向川军转告红军动态，称：“朱德在陈家岗（永兴场附近），徐向前在五家口，王维舟驻天全县政府，许世友军部在安乐村（新场北12里），罗炳辉率其残部在沙坪（天全西5里）。”

17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离开成都飞返重庆。

18日 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正式举行。大会的主要口号是“建立四川省苏维埃的政权”，“成都的政权再不是四川人民的政权”。熊国炳在大会上以“四川省苏维埃当前的任务”为题作正报告，傅钟作副报告。熊国炳报告的重点是：（一）什么是苏维埃？（二）苏维埃与红军的关系。（三）为什么要推翻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四）苏维埃与游击队的关系。（五）红军保护自由贸易，恢复商业。（六）粮食、财政的统一及一切物资都要保障红军战斗前线的供应。（七）镇压反革命，巩固苏区根据地。（八）苏维埃的劳动纪律。（九）要注意从政治上清理苏维埃政府。大会共进行了三天，正式成立了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下设省军区指挥部、省保卫局、省革命法庭、省工农银行、省财委会、省粮食委员会、省交通委员会、省教育文化委员

会和省工农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大会选举熊国炳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维海为省保卫局长，何长工和张广才分别担任省粮食总局正副局长，王建安为政治部主任。

20日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师、团政治部（处）工作纲要（草案）》，指出“政治部、处是共产党与苏维埃在红军中的代表机关”。《纲要》包括师、团政治部（处）“在红军中的重要”、“工作内容”和“怎样工作”等几个方面。

同日 川军四十一军孙震部推进至梯子岩、小垭子、尖峰山之线，红军退入大垭山、清泉山、仙宫顶一带工事内。

21日 共青团四川省委组织建立的“少先模范团”于是日在芦山成立。从1月1日至20日，芦山县动员520人，天全县动员400余人，雅安县动员170人，宝兴县和太平县分别动员90余人参加少先模范团。这支总数为1,275人的队伍在誓师后即武装开赴前线。

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而张国焘这种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共中央除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23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二、六军团渡乌江，乃命令黔军第十三团由綦江开遵义，令川军许绍宗师由龚滩开南川、綦江，令川军二十军杨森部由洪雅开赤水待命。

24日 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

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要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日，张闻天为了党内统一，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为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25日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电罗南辉并金川省委说：“番民工作甚重要，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一个决议，就是提倡佛教并派班禅赴藏与我争取番民”，需“调查甘孜、道孚及西北各地情形，进行向西北发展的各种准备工作。”电报还说：“日占华北，组织冀察自治政务委员会，……你们应即广为宣传，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并与少数民族工作亲密联系。……原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调任懋功县委书记。”

27日 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和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说“对目前策略路线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与此同时，张国焘又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同日 川军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鉴于非驱逐战不能肃清名（山）雅（安）马路南侧”的红军，乃于是日到草坝场，29日到梯子岩、老鸡山、尖峰山“亲自观察”，后决心攻击当面之红军部队。

28日 张国焘在宝兴境内召开的红四方面军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报告中，张国焘一方面用他的意思讲解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宣称“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深刻的讨论”；另一方面又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各干各的。”还表示“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在同一会议上，张国焘还作了《艰苦卓绝争取我们的胜利》的报告，提出“我们首先消灭李抱冰（李韞珩），用迂回战术消灭薛岳，在川康创造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争取与二、六军团的会合，配合陕北红军，与外蒙、苏联具体配合起来。”

29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在重庆宴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和四十四军军长王缙绪等，“对剿匪事宜，有所指示。”其时，杨森部正奉令前去堵截红二、六军团。

同日 国民党中央政府“指令”行政院，准给予四川江油县一“创办联团”、助剿红军有功的“县民”“一等剿赤奖状”。

30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第五师之一部，攻击并占领陈家坝东两河口濫池附近之线。

同日夜 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杨学瑞旅两个连，偷袭红四方面军设在四平山的阵地。

31日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为贯彻中共中

央瓦堡会议决议精神，联合发出“联字（3）号通知”：《关于重新分配土地》。此通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作了修改、补充，并指出：“决定从1936年2月5日到15日为重新分配土地的十日运动。”

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第二十军杨森部直接归重庆行营指挥。

同日 川军四十一军孙震部为了“恢复名（山）雅（安）交通之任务，并除去匪之攻击凭据计”，在红军增援部队未到之前，向驻守在清泉山、仙宫顶、金鸡关一带的红三十一军阵地发动进攻。

本月 四川省抗日救国同盟（主席王维舟）在芦山县思延乡观音寺召集各县部分盟员进行短期军事训练。

本月 由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增设了学制半年的“政治连”，连长皮定钧。政治连的学员是各军的支部书记和部分排长。同时，红军大学还设有由张宗逊兼科长的“高级指挥科”，由曹里怀任科长的“上级指挥科”，由李井泉任科长的“上级政治科”，培训各级红军干部，学制均为3个月。另外，红军大学还增办了“附属步兵学校”，校长仍由刘伯承兼任。“红军大学”和“附属步兵学校”在校总人数曾达1,500余人。

本月 正当川滇敌人宣布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已被全部消灭、“剿匪胜利结束”时，隐蔽在连天山密林中的游击纵队人员全部下山，前往长宁、兴文一带活动。原来被打散的游击队员陆续归队，队伍逐步扩大。

1936年2月

1日至3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堵红二、六军团，先后规定如下部署：（一）自宜宾至雷波防务由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派队负责；巧家、雷波防务由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派队负责；巧家至盐场由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负责，并侧重宁南方面。（二）许绍宗部西开叙永，以一部推进扎西，一部守威信。（三）改令杨森部以两团推进盐津，两团控置牛街，主力集结于高县、珙县一带。（四）其他各部分别追堵。

3日 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黔西。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判断红四方面军“最有利之行动即在维持现阵地，从事整理补充，待萧（克）贺（龙）入川，而后集中主力，向我薄弱之一部突围南窜，与之会合。”遂决定在二、六军团未入川南以前，先对红四方面军“采取攻势，以收各个击破之效为要”。

月初 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在雅河以北的大川场、高兴场、五家口、蒙顶山、白芷庙之线，与敌四十五军、四十四军、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四十一军各一部，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之线对峙。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在雅河以南的飞仙关、新场、仙峰山之线，与敌二十四军及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对峙。蒋介石重庆行营令各部一面固守阵地，一面整训，“俟准备完妥后”，即由刘湘“抽出有力部队，自名山进占蒙顶山，直取芦山”；令薛岳“预派一部”，控置观音铺以北地区，与刘湘同时进攻，直取

天全，以期达成迫使红四方面军“复返天（全）、芦（山）以北地区之目的”。

4日 因“军务紧张”，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由成都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行营主任顾祝同商量“消灭”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办法。

5日 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大定。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于同日在贵州黔西城召开会议，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建立根据地，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并组成了中共川滇黔省委。

同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建省委员会主席刘文辉电国民党中央政府，“报告藏番扰康，请示应付办法”。

6日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兴文县洛柏林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游击纵队的教训，决定继续贯彻原中共川南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选举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三人组成特委，刘复初任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龙厚生任纵队司令员，李青云任特派员。游击纵队下设两个大队。后游击纵队在兴文县博望山一带休整、扩军，并委派金燧秘密组建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开展活动。

同日 刘湘由重庆飞返成都。

7日 中共金川省第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金川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秘书局1月16日电告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提出了“党的策略是要开展团结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去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决议也提出了“反对党内关门主义”。决议还根据金川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提出了“一切为自己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坚决反卖国汉官军阀国民党统治，及坚决反日反英帝国主义的分子，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阿訇，不论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决议指出“金川党目前中心工作”是“上面所指出的策略，要争取番、回、汉广大群众在抗日反蒋战线上的密切联盟猛烈的开展，要保证党在联盟中的领导权。”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官、各师师长及参谋长参加的幕僚会议，商议“进剿”红军“机宜”，并制定出如下作战方针：以“收复”天全、芦山之目的，决于本月11日拂晓，向当面之红军攻击前进，在空军配合下，以主力向寨子山、李家山、金花庙地区，实行中央突破，压迫红军于荥经河以西、天全河以南地区“而歼之”，“依战果之扩张，确占天、芦各要点”。

7日和8日 张国焘自称的“总政治部”，也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对白色官兵宣传鼓动的口号与标语》、《对民团、绿林弟兄的标语大纲》、《目前适用标语口号》和《关于白兵工作运动周的决定》等文件，主要内容为联合一切武装力量抗日反蒋。

8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保全廖承志、曾中生的生命电示张国焘：“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指出“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1营1连的被捕，地方组织全部

坍台”。可是张国焘已在此半年前于四土卓克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

同日 薛岳发布《第一号作战训令》。称“本路军以攻占新场、老君山之目的”，拟于11日向仙峰老君山之红军第四、第三十两军攻击前进，占领飞仙关、始阳和天全；其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集结于望头岩附近，于11日攻击新场、谢家坪以南地区的红军；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于11日前夺取老君山，11日攻占李家山和关口、大冈；空军于11日以两机侦炸飞仙关、天全河两岸，三机协助战斗轮流轰炸。

9日 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地下党策应下占领毕节。接着，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颁布布告，宣告革命政权的诞生和红二、六军团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后红二、六军团还在毕节组建抗日救国军，并派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司令员阮俊臣、政委欧崇廷率队到川滇边境寻找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由成都到邛崃“督剿”红四方面军。

上旬 中共中央电红四方面军：“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中央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供其选择：（一）北上陕甘。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二）就地发展。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二、

六军团则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呼应。（三）南下转战。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中央认为这三个方案中，“北上陕甘”为上策。

上旬 国民党政府空军第三和第六航空大队的飞机，先自成都、雅安机场起飞，后又增加使用新修的荣经机场，从本月上旬起每日出动飞机4至6架，对四方面军部队及阵地轰炸、扫射，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红军用枪、炮仰射飞机，也使国民党政府空军“数度发生机毁人亡事件”。

10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了确保“极关重要”的金沙江防务，防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乃补充规定如下：江防部署除原定宜宾、雷波、巧家一带分别由刘湘、龙云、李家钰负责之外，其余部队布防大渡河及西昌、会理两城。同时，专门制定《组夷办法》，称“雷波以下归四川第五行政专员，以上归宁属江夷民团指挥部，依夷人氏系，分别号召”。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一部由荣经出发，经底坝、四里坡、后叙坝到达铜厂沟王庄宿营，“以便于前线直接指挥”。薛岳并于同日分别电刘湘、刘文辉、孙震，“请各飭部迅即协同进击，以收围歼之效”。

同日 由于红四方面军原留在川北的红军川北游击队近期在广元、南江境内活动加剧，蒋介石重庆行营于是日电令唐式遵部“截堵”。

11日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经过讨论，一致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四方面军继续北上的方案。红四方面军于是日发布《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行动计划》。计划指出：“现敌

人正在大邑、康定、大渡河线上及其前面一带地区，构成碉堡封锁线，企图围困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红四方面军为了更有力地策应红二、六军团行动，“并取得在广大地区在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红九十一师两个团），位邓生、晓磧、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推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发展”。根据此计划，红四方面军共编为三个纵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向康北转移。第一纵队由总部直接指挥，辖三十军、四军、五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第二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政委詹才芳，辖三十一军和三十二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陈海松，辖九军的二十七师和军直属七十六团。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占领新场、仙峰山一带。川军各部“协同”薛岳部，在飞机配合下，开始向红军阵地发起总攻。同日，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由邛崃前线返回成都。

13日 红四方面军四军第三十五团在峡口坝遭到敌人9个团的攻击，全团伤亡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均牺牲。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率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及少数幕僚，赴新场前方视察地形，当即决定于14日推进至雅河南岸，15日续向飞仙关、始阳、天全攻击。

14日 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给游击队战斗连中党、团员的一封信》，指出“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决心要把全中国卖尽的，所以派他走狗薛岳匪军来拼命的向我们抗日红军作绝望的进攻。”信中号召共产党员和共产青年团员“更直接参加和指导着目前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游击

战争”，动员群众“坚决消灭薛岳卖国匪军”。

中旬 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在隆冬季节第二次翻越雪山夹金山（原属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则是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各军师团的出发地点为：三十军八十九师为先头部队，从芦山青龙场出发；八十八师从天全始阳出发；四军和三十二军从天全出发；二十五师从镇西山、宝盛场出发；九十三师从飞仙关、罗绳山出发；九十一师从罗绳山出发；二十七师和七十六团从宝盛场、公义场和太平场出发。

15日 刘伯承、李先念、程世才率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四方面军直属一部撤离天全、芦山，于是日夜宿宝兴。19日抵懋功达维。红军大学、总供应部跟进。

同日 陈昌浩、徐向前电示周纯全，在达维、懋功为四方面军西进布置营地、筹集粮食。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致函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请将川康边境各县屯失守情形及其时日详为查明”。

同日 薛岳部在川军和炮兵、空军配合下强行渡过雅河，以20个团的兵力进攻始阳。于是日上午和下午分别占领始阳和天全城。

16日 薛岳部第六十一师占领飞仙关。

17日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周纯全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告诉西进红军各部从天全、芦山、宝兴返回懋功的具体日期及筹粮、修桥等事宜。

同日 川军四十五军邓锡侯部杨秀春师占领大川场。

同日 薛岳部第六十一师占领芦山，旋即将芦山城防交川军唐式遵部范绍增师担任。蒋介石重庆行营除将岷江、涪

江、嘉陵江沿岸及川陕公路等重要碉线，“分段责成驻军及地方政府培修”外，又规定部署如下：（一）邓锡侯抽派一部，由大川场出盐井坪截击红军。（二）唐式遵抽派一部，尾红军追击。（三）刘文辉抽兵4个团推进金汤，余部防守雅安，维护雅安、荥经、汉源间交通。（四）孙震部以4个团分驻江油、平武，两个团分驻安县、北川，一个团驻绵阳，其余以6个团驻松潘，6个团担任松潘叠溪间沿岷江布防。（五）叠溪（不含）至灌县防务，由刘湘分段派队负责。（六）其他各部均在原地待命。

18日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指出“我军决转移兵力先取毛牛、道（孚）、（炉）霍、康（定）、甘（孜）等县，消灭李抱冰部”。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第五十九师于是日下午占领灵关及其东西高地。后蒋介石给“节节胜利”的薛岳部“犒赏洋10,000元”，“空军奖给洋2,000元”。

19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第八区区长报告在白玉、毛牛等处与红军作战和“扰乱”红军后方的经过。该报告称红军还在丹巴“住女兵约300人”；“丹东土司率民兵在攻取距丹巴80里之大桑；东马民兵亦扰乱匪队后方”；汉牛“有民兵百余名，与懋功马队长率民兵200余名”联络防堵红军。

20日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筹集柴草、布置收容致电时在懋功的周纯全、刘伯承、李先念、程世才，并告知以下敌情：“杨国桢师开灌县，孙震向江油方向移动，邓敌杨旅集卧龙，相机犯巴郎山，邓和两旅在理番、杂谷脑线；李（韞珩）敌有犯丹巴企图，此刻尚未动员，灵关本日发现少数敌，薛岳部在天（全）、芦（山）休息待命；饶国华师向宝兴，

自乾（刘文辉）4团开金汤，余该部将来全在大金川布防。”

同日 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

21日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和副军长罗南辉并转刘伯承、程世才和李先念，命令红五军配合三十军一部在毛牛沟、东谷一带布置侧面阵地，诱敌深入，消灭主力到丹巴后，决定暂缓进攻康定，拟先取道孚，然后再转攻泰宁，截毛牛村后路。其时，丹东世袭土司肉孜，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和西康“宣慰使”诺那的唆使，纠集200多人枪，在独郎沟口堵住红军从丹巴西进道孚的道路，并不断对红军进行骚扰。红五军在丹巴藏民独立师的配合下，突袭丹东土司武装，经半日激战，将其全部击溃。

同日 川军周重生旅占领宝盛场，郭勋祺师占领青龙场，陈兰亭师占领三益场（今雅安下里乡），赵逸泉团占领公义场，刘文辉部渡过羌江占领多营坪。

22日 薛岳部为“巩固天（全）芦（山）阵地”，截至本日止，其第一、第二两纵队共完成碉堡213座。

23日 陈昌浩、徐向前致电董振堂、黄超、罗南辉并转刘伯承、程世才、李先念，指出“我军团粮道及完成战略计划，应先取道孚，然后再转取泰宁”。

同日，陈昌浩、徐向前为布置红三十二军行动，于是日致电该军军长罗炳辉和政委李干辉。

同日 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向康区北部转移结束。至此，张国焘南下方针完全失败。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率3个旅为

追击队，计划尾红四方面军后卫进大碛碛和达维，于是日占领宝兴，旋即占领盐井坪。

25日 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唐式遵、潘文华、孙震、王缵绪、范绍增、李家钰、黄隐等15人因“围剿”红军有功，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陆军中将。次日，许绍宗、郭勋祺、饶国华、彭诚孚、杨国桢、陈万仞、王铭章、杨秀春、陈离、夏炯、陈兰亭、穆肃中等40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

26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为围剿红四方面军，命令下属各部修筑由飞仙关至天全一段长约40华里的公路，并限于3月3日以前完成。后薛岳将其第四军配置于荣经雅安线，第三十六军配置于雅安天全线，第六十一师在荣经，第九十二师在天全。

下旬 红四方面军先头三十军由丹巴向道孚进军，隆冬季节翻越长征中最高、海拔达5,800米的党岭大雪山。不计其数的红三十军和其他军的红军指战员，先后在严寒中都被党岭山的狂风雪浪所吞噬。其时，正在道孚的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闻红军将来道孚的消息后立即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灵雀寺的上层喇嘛研究防堵红军的部署，诺那在向灵雀寺留下一部分武器后即去炉霍。

27日 红二、六军团在贵州遭到川、滇、黔敌军共90个团兵力的“围剿”，于是日撤出毕节。后红二、六军团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进军，计划将敌人尽量向西调动，使敌疲惫，然后再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安顺地区。

同日 国民党政府康定县长华浩然向十六军军长李韞珩报告红军撤离宝兴、懋功的情况。

28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由荣经迁雅安。薛

岳于3月8日由始阳到雅安“坐镇”。

同日夜 红四方面军先头三十军进入道孚县城。道孚灵雀寺的喇嘛全部退入城北寺庙内及后山的碉堡，凭借高墙深院与红军对峙。红三十军连夜将灵雀寺包围，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攻占了寺庙后山的碉堡，控制了制高点。

29日 道孚灵雀寺住持堪布麻倾翁（国民党员）派出40多个喇嘛组成“敢死队”，几次冲出寺庙，企图夺回被红三十军占领的制高点碉堡，均告失败。

1936年3月

1日 红三十军占领灵雀寺，控制了整个道孚城。

同日 陈昌浩、徐向前命令红三十二军继续向康定佯动，牵制敌人。

2日 张国焘致电金川省委书记邵式平：“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现在金川省委的任务更加重大了，必须立即向干部和群众大大解释这次行动的意义，主要是须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发出布告，分别“悬赏购缉”红二、六军团负责人。该布告称：“凡生擒贺龙、萧克者，赏洋80,000元，斩获首级者5,000元”。生擒“团长一名赏洋3,000元，斩获首级者2,000元”。

月初 红四方面军发布《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是时，敌情已发生变化，薛岳部6个师集结天全、芦山、雅安待命，既可能北调甘南，又可能增援康定，还可能调川南堵截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文辉部

的4个团也集中康定附近。《补充计划》决定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于道孚、炉霍、甘孜一带，相机取康定，把过去的强攻康定改为佯攻康定，以牵制康定之敌。《补充计划》还规定，要“学习康、藏、青、新、甘、宁、陕情形（包括地形、气候、政治、经济等）”，要了解“西北敌情”。

月初 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奉红二、六军团负责人之命，前往川滇边境寻找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由于道路被敌人封锁，部队行动困难，第三支队暂去黄塘梁子整训。

4日 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袭取炉霍、甘孜致电徐向前等人，电报并指出决定由何长工（正）、李先念（副）、李天焕、曾日三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全力筹集粮食和牛羊肉，要求“达到供平均每人15天需用数量。”

5日 红三十军派所部二六九团从道孚南下，直取泰宁。泰宁民团一触即溃，团总率残部逃向康定。

同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刘伯承、程世才率领下，从道孚出发，沿鲜水河向炉霍进发。

同日 国民党四川“剿匪”总司令部致函四川省政府，复告所查明的懋功、抚边、崇化、绥靖、雅安、名山、芦山、宝兴、天全、荥经、金汤等各县、屯分别被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占领的日期。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发表谈话，称红四方面军“全部仅二三万人左右。经我军长驱痛剿，逃据川边。……我再尾追痛击，即可将其全部消灭”。

6日 蒋介石电令刘湘，为给小河营与平武运送军粮，限本月12日前在昭化、剑阁两县各征壮丁800名。

7日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就大金川地区有关工作部

署如下：（一）绥靖番民骑兵连不编入红五军，仍单独训练与扩大。（二）绰斯甲以上归红五军指挥，绰斯甲以下绥靖、崇化一带归金川军区，倪志亮暂兼司令员，邵式平兼政委。（三）“速训练各部人员打骑兵，学番话，食畜牛羊，节粮，收松香造船”。

同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在炉霍城东将军梁子击溃寿灵寺喇嘛派驻炉霍的武装，遂乘胜进占炉霍县城老街，敌县长闻风逃跑。红八十八师鉴于寿灵寺内有1,500多名受过国民党宣传的持枪喇嘛，便将寺庙包围起来，力争和平解决。

8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由始阳返回雅安。

10日 陈昌浩致电周纯全，命令红三十二军全部开回懋功。

同日 月前东渡黄河、打退山西军阀阎锡山部队反攻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于是日又歼敌约两个团。本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召开会议，商讨政治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红二、六军团“到北方来是上策”，如不能北上，应在当地“推动与团结抗日力量，使抗日力量增加比重。”会议提出要设法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联系。同月，中共中央电张国焘索要与红二、六军团的通讯密码，张国焘置之不理。

11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由雅安飞蓉，同日在成都发表关于“痛剿川西朱德、徐向前匪部情形”的谈话。次日，薛岳偕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由蓉飞渝，向蒋介石重庆行营“请示要公”。

13日 张国焘、陈昌浩关于九军、三十军的行动致电徐

向前、刘伯承等人，其中说“三十军一部续围（寿灵）喇嘛寺，并准备全军出甘孜”。

15日 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抵道孚。

同日晚 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吹嘘南下方针，说“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张国焘还在会上提出“向西北转进”的计划。

17日 不愿与红军和解的寿灵寺喇嘛，联络炉霍的朱倭，甘孜的东谷、白利、阿都等土司头人武装，对包围寿灵寺的红八十八师发起里外夹击，红八十八师1团长和部分战士牺牲。

20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运输处鉴于为“围剿”红军运送军粮的民夫紧缺，于是日电刘湘，“请转饬”剑阁、昭化两县“勉力办理，幸勿推诿”照送民夫一事。

21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给“川中各军”下达命令：“保存革命史绩，所有纪念物品，概须送首都陈列”。

23日 红二、六军团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同敌人5个纵队10多个师的兵力周旋了一个多月，转战千余里，于是日在宣威以北地区击溃滇敌两个旅的阻击，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同日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在李先念率领下，从道孚赶到炉霍，会同八十八师加强对寿灵寺的包围。

24日 包围寿灵寺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突然撤去对该寺的包围，佯向西面甘孜方向移动；八十九师则在寺东面隐蔽，并暗中准备梯子等攻城工具。

25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突然夜袭寿灵寺，除国民党“边政设计委员会”西康助理员格聪活佛率少数喇嘛逃走外，寺内喇嘛大都作了俘虏。红军从寿灵寺共获取粮食10,000多石、羊毛100,000多斤、盐40,000余斤及贵重药材、金银器皿、武器弹药。红军对寿灵寺庙严加保护，优待被俘喇嘛，让其照常作佛事，并给其匀出部分粮食。

同日 朱德、张国焘电示红二、六军团：“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你们尚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则在滇黔边活动亦好。”电报还提出了5个点渡江北进的方案，供其选择。

26日 中共中央电示四方面军“第一步宜向川陕甘三省及陕南行动为宜”。

27日 张国焘、徐向前致电陈昌浩，提出“寿灵寺被俘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另外，命令红四军从炉霍向瞻化（今新龙县）进军。

28日 红二、六军团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由于该地区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亦好，红二、六军团拟在此创建根据地。

同日 红三十军离开炉霍向甘孜进发。其时，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从甘孜派出别动大队和部分甘孜地方武装，欲联合炉霍朱倭觉日喇嘛寺的武装于两县交界处凭险阻击红军。

29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进到炉霍朱倭地界。此前，由于寿灵寺世袭相子（管家）益西多吉目睹红军保护寺庙和优

待被俘喇嘛的事实；已劝说觉日寺喇嘛不与红军为敌。当红军于是日到达朱倭，觉日寺活佛率众喇嘛大开寺门迎接红军。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所派在此阻击红军的别动队见势逃走。

同日 红二、六军团负责人贺龙、任弼时将拟于盘县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电告朱德、张国焘，请求电示。电报说：红二、六军团“在滇黔边的敌我力量下，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电报同时也提出愿意渡过金沙江北上：“我们渡河技术虽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但是，“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在一二天内电告”。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就北盘江江防及在盘县一带“歼灭”红二、六军团等事宜作了部署。

30日 朱德、张国焘复电红二、六军团，指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同北进，可先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准备较长时期的运动战”。不过，“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红二、六军团接电后经过研究，决定放弃在盘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准备抢渡金沙江，北进与“主力红军”会合。

同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翻越海拔4,000米的罗锅梁子，向甘孜进发。红八十八师在与甘孜喇嘛寺和平谈判成功之后，不费一枪一弹进驻甘孜。至此，红四方面军在进军康北途中，连续赢得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黄教（格鲁派）寺庙的信任和支持，这对于稳定政教合一的康北形势，

起了重大的作用。

31日 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亦资孔地区，在平彝附近冲破滇敌孙渡纵队的防线后，向滇中急进。

本月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派金燧回到兴文县洛柏林，秘密建立川南游击支队。后金燧任游击支队队长，梅岷区委书记戴德昌兼支队政委。后川南游击支队派出30多人到兴文县青联乡开展工作。

本月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向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指出“以西北广大地区为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要求我们以极大的努力与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运用我们过去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的经验，在党的新的策略路线下，来进行少数民族的工作”。提出“扩大少数民族中原有的赤区，创造新的赤区，争取这些区域成为西北抗日根据地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主张。根据“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明确指示各部队“对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在宗教问题上，提出“我们仍然应该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但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

1936年4月

1日 红四方面军发布《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指示》分析红四方面军自转移兵力至康北地区后，敌人“必估计我有两种企图：（一）南进康（定）雅（江）期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北进甘、青与陕北红军相呼应。”《指示》提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是“为实现西北

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最近的行动计划”，则是：（一）首先消灭李韞珩，配合红二、六军团。（二）首先赤化康北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发展”。《指示》要求：三十军“应即侦察康、甘、青一带情形，准备北进的计划”；三十二军“应即准备巩固现阵地及东渡岷江的各种计划”；五军“应即定出由观音菩萨河北进阿坝、班佑的计划，以及观音区与炉（霍）、甘（孜）区打通的计划”；全军应“深入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动员”。

同日 红四方面军发出《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提出四五两月为战斗准备时期，“为要坚决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必须细心的耐烦的有系统的研究西康以及整个西北的地形道路、社会情况”，要“研究西北地区的敌情——回兵、藏兵、骑兵、番兵情形及其战术”。责成红四军、三十军司令部将过去打薛岳的经验悉心研究，并将结果报告总部，“以使用之教育全军”。要求组织创造有2,000马匹的骑兵（其中大金省委应增助200匹）。提出在三十军于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已扩大红军200名的基础上，全军应扩大2400名红军。《指示》还对准备战斗、训练计划、供给计划、卫生计划和政治保证计划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以“配合二、六军团开展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斗”。

同日 张国焘在道孚召开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共中央，说中央北上抗日“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吹嘘“南下的胜利和意义”，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根据

地”。但同时强调“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4日至6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围剿”红二、六军团，规定如下部署：（一）刘建绪部各纵队，均归龙云统一指挥。（二）杨森全部，由高县、珙县一带经昭通向云南巧家、四川宁南方向移动。（三）李家钰驻会理部队，由通安延伸，沿金沙江上游至门香村布防。原驻大渡河部队，进驻西昌；西昌部队，进驻会理。

6日 红二军团攻占寻甸。

同日 红四军十师顺利进占瞻化。此前，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因联合觉日喇嘛寺和甘孜喇嘛寺阻击红军的两次行动均遭临阵反戈，便从已不能立足的康北逃到瞻化。瞻化河西头人巴登多吉将诺那等人及电台交红四军，表示不与红军为敌。红四军将诺那等人送往甘孜，由红军总部五局看管。五局局长王维舟耐心给诺那做工作，使诺那思想起了变化，教红军学藏文。后诺那身患伤寒，经医治无效，死于甘孜。

7日 红六军团抵普渡河东岸胡家村。

8日 蒋介石电刘湘：“查川陕公路沿线各县征役繁重确属实情，但军粮转运尤属重要，兹为兼顾民力军运起见，即希转饬田专员，转令应募民夫之昭化、剑阁、广元、苍溪、阆中等五县”，除已募解者外，“欠募之夫可设法改征骡马代替”。

上旬 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此前，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军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三十二军及九

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道孚、炉霍；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溃敌两个团，完成任务后，亦从懋功、丹巴向炉霍地区转移。

上旬 为了精简机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好北上的准备，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序列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倪志亮。全军辖5个军1个骑兵师，共约40,000余人。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干，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师，各师直辖营，不设团部。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第十三师、第十五师。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七师、教导师，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九师，每师3个团，第九十师暂缺。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师、第九十六师。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全师200余人。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张宗逊。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10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昆明发表谈话，称：“萧克、贺龙匪部最近企图，似有窜渡金沙江，或盘据川西，谋与朱德、徐向前匪部合股之模样”。

12日 朱德、张国焘关于完成四、五两月准备工作，会

合红二、六军团北上致电陈昌浩。指出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薛岳部（总部仍设雅安）周浑元纵队接李韞珩部防守，李则可能移守康东雅江。电报说：“依情况二、六军难在江南支持”、“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40日内可接通。途中困难很多但可能克服”。并告知陈昌浩“已和二、六军商由中甸、定乡、稻城、理化或雅江北进”。要求红四方面军各部“努力筹集资粮，完成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这样“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和实现北上的胜利”。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就“川康黔三省政情”发表谈话，说：“川省保甲之编成者80余县，黔省尚未办竣，西康正妥筹拟订”。称：拟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所占区域之东南两面“广建碉堡”，而“现在三省最普遍最严重之病象为匪与灾民”。

14日 道孚600多名藏族群众（包括各区120多名代表）与红军举行联欢。其时，甘孜白利寺住持活佛格达，在红军秋毫无犯、保护寺庙的事实教育下，已从怀疑红军转变为热爱红军，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藏民，宣传红军宗旨，动员藏民拿出粮食支援红军，仅白利寺一次就交出“拥护红军粮食134石”。后朱德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旋，格达担任甘孜波巴政府要职。

15日 道孚县波巴依得瓦（藏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由觉洛（藏族）和张德喜、荣中（藏族）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的道孚波巴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以及《土地暂行条例》、《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条例》、《波巴依得瓦独立军暂行条例》、《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关于商业的暂行条例》等。接着，泰宁、炉霍、甘孜等地的波巴政府也

相继成立。康东地区的雅江县藏族农民在红军帮助下，成立了农民协会。

16日 红四方面军总部为纪念“五一”，拟举行全军大型体育比赛，于是日在炉霍寿灵寺成立“红场委员会”，确定了许多为实战需要而设立的比赛项目。张国焘、曾传六、李卓然、李特、王新亭、黄火青、李伯钊、张琴秋、刘瑞龙等负责人均系比赛的裁判员。“红场委员会”为体育比赛作了一系列的筹备工作。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为接应红二、六军团，日前派出红四军和三十二军一部，从道孚南下雅江。红四军十一师于是日歼灭敌十六军五十三师别动队100余人占领东俄洛，切断了敌人援助雅江的必经之路。

同日 蒋介石日前由南京出发，经汉口、宜昌、巫山、万县，于是日抵重庆。

17日 红二、六军团攻占姚安。

同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成都，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等“特发起盛大欢迎”。

18日 波巴依得瓦革命党公布其《党纲》，提出“打倒汉官、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药山、土地、财产，分给波巴依得瓦”，决定“联合红军和赞助波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同日 红二、六军团电告朱德、张国焘：“决采鹤庆、丽江、中甸路，快则10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江边。金沙江流急，无造船工人，架桥无时试验，提议三十二军进到江边接应。”朱德、张国焘接电后立即复电，认为“三十二军再去（江边）迎接之任务，以时间计算已赶不到江边”，希望二、六

军团“自行设法渡江”。

同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会上训词。

19日 张国焘、朱德将红二、六军团的近况转告徐向前，并指出：“我们已复三十二军及四军两团均已到雅江”。

同日 红三十二军先头强渡雅砻江，击溃国民党政府雅江县长临时纠集起的团防士兵，占领康南咽喉雅江城。

同日 蒋介石在成都召集特务团及宪兵团全体员兵训话。

20日 “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政治检查处”发布其《组织大纲》，提出“在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正式加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时，中央政治检查处即直接受西北联邦保卫局之领导和指挥”，以“保障在政治上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军阀阴谋破坏”。

同日 红二、六军团攻取宾川。

同日 张国焘、朱德关于迎接二、六军团的进一步部署致电徐向前、王树声，指出“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实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韞珩）敌，并伸到稻城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我们主张树声先率九十三师两团经扎坝去雅（江），向前续带九十三师跟进，该方由向前统一指挥”。“必要时还准备将九十一师也开到雅江去”。电报另通报蒋介石“现在蓉，当然是计划隔断我与贺（龙）、萧（克）会合”。

同日 蒋介石在成都向“在川各军”发出手令：“抽调精锐，合力追剿，期一鼓歼灭”红四方面军。

21日 徐向前复电张国焘、朱德：“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

同日 张国焘决定派王树声、李先念等随徐向前行动。

同日 国民党政府四川第六专员公署电宜宾、江安、南溪、高县、珙县、兴文、庆符、筠连、长宁各县县长，转饬“注意防范”，因红军“已派多数人员到内地工作，投身工厂内及车夫集团中。”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于是日规定如下部署：（甲）川康方面：（一）唐式遵所部编足20个团，首先巩固现阵地，继即派一部，经懋功向丹巴开进。（二）邓锡侯所部派10个团，经达维先占抚边、两河口，再向崇化、绥靖推进，并控置两团于大秋地为北进据地。（三）刘文辉部派4团进驻金汤。（四）以上各部到达目的地后，即沿大金川连接布防。（五）李韞珩部派两团进驻雅江，防止红四方面军南下，并阻隔红二、六军团与之会合；其泸定瓦斯沟一带遗防，由三十六军派5团接替。（六）松潘、叠溪、北川间，由孙震部3团扼守，并另派1团守平武。至于叠溪、茂县及威州、理番、杂谷脑两段，由刘湘各派两团分别扼守。（乙）川西方面：（一）李家钰部10个团守备金沙江及西昌、会理两重点。（二）杨森部遵前令速开宁南、巧家。（三）如果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时，即须在金沙江、大渡河间地区进行“歼灭”。（四）刘湘派兵10个团，经荣经开赴汉源、大树堡、安顺场、松林口一带，准备策应。（丙）滇康方面：（一）“追剿军”孙渡、懋崧甫、李觉、郭汝栋等纵队，应压迫红军于金沙江右岸，“以便夹击歼灭之”。（二）如红军渡过金沙江，则郭汝栋、李觉、懋崧甫各部，仍渡江“追剿”。

22日 蒋介石由成都飞昆明。

23日 代表红军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与代表康区最大土司德格的首席军事涅巴（头人）夏克刀登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根据《协定》规定，红军不进入德格地区，德格土司也不进攻红军，并帮助红军筹集一批牛马和粮食。此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西康宣慰使”诺那宣传和利用的德格土司，曾派夏克刀登率领以骑兵为主的2,000土兵奔袭驻甘孜绒巴岔的红军，被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指挥二六五团智歼。夏克刀登被俘后，李先念等曾向其宣传红军的政策。此后，夏克刀登留在甘孜，为红军筹集粮草，后出任甘孜中央波巴政府的领导职务。

同日 红二、六军团占鹤庆，次日占丽江，进到金沙江边的石鼓镇，将追敌远远甩在后面。

24日 国民党政府四川第十六专员公署专员向四川省政府报告茂县、理番、抚边、懋功、绥靖、崇化6县、屯被红军占领的日期及其有关情况。

25日 红二、六军团从石鼓、巨甸两处开始渡金沙江。至27日，全军渡过了水深流急的金沙江。

27日 朱德、张国焘关于商议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行动方向致电徐向前，指出二、六军团“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提出拟约陈昌浩“五一”后来炉霍，要徐向前“亦于五一前后来炉共商大计”。

同日 朱德代表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电贺红二、六军团迅速渡过金沙江：“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同日 红四方面军应红二、六军团要求，于是日电令三

十二军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去接应二、六军团。

同日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发布《关于骑兵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

29日 张国焘在其“第二”中央的“中央局会议”上作《关于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的报告》。提出“党的策略是领导广大番人下层群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直至成立完全独立的波巴依得瓦共和国”。张国焘在报告中还谈了“政权问题”，“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信教自由”，“还俗自由”，“政教分离”，“土地政策”以及“迅速建立波巴革命党与波巴青年团”等问题。

同日 红二、六军团沿金沙江东岸行进，翻越玉龙大雪山，经清香树，于30日到达川滇交界的云南中甸县。

同日 红三十二军翻越剪子湾山，由雅江向理化进发，当日击溃阻击红军的国民党政府雅江四区区长崇西土司的武装。

本月 胡宗南部特遣司令1个团，“围剿”红军川北（川陕）游击队（独立师）。由于游击队负责人刘子才轻敌，游击队在铁炉坝被围。后游击队虽经英勇战斗，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在此后近两个月里，胡宗南接连派重兵对游击队“围剿”。游击队被迫移至广元县三道河，又遭叛徒勾结敌军围攻，只剩下50余人。

1936年5月

1日 “波巴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甘孜举行。德格、甘孜、道孚、炉霍、泰宁、雅江、理化、白玉、邓柯、石渠、

同普等12个县的代表700多人出席会议，格勒得沙共和国有4个县派代表列席会议。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波巴独立政府组织大纲》、《波巴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检查处暂行条例草案》等。《宣言》说：“大会热烈欢迎中国抗日红军赞助波巴独立的诚意，决定与之订立永远的盟好”。5日，选举产生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德格县的多德为主席，甘孜县的达结、孔撒（萨）为副主席。

1日至4日 红二、六军团利用在中甸休整的机会，召开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在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问题。3日，贺龙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向康南各族各界人民发表安民布告，指出“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慌逃散”。

1日和4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对滇康方面和川西方面先后规定如下部署：（一）樊崧甫部进驻盐边、盐源，并扼守雅砻江两岸各渡口，与李家钰部切取联络，互相策应；对于冕宁以南雅砻江两岸各渡口之防务，及其船只，均须分别负责管理。（二）郭汝栋部守华坪、永北之线，并扼守金沙江东岸。（三）孙渡部守丽江、石鼓、巨甸、维西之线。（四）李家钰部分驻冕宁、泸沽、西昌、德昌、会理一带。（五）刘湘所部郭勋祺师，星夜驰赴大树堡与李家钰部切取联络，又增派10团，前后共20团。（六）杨森部酌留一部驻防宁南、巧家，主力向西昌推进。

3日 蒋介石为消灭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令乐山

等16县，“征募石工5700名，随带应用工具，修筑川康公路。限20日派员送至雅安交差”。

5日 红二、六军团决定分左、右两路纵队北进。六军团为右纵队，计划经定乡（今乡城县）、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计划经得荣、巴安（今巴塘县）、白玉向甘孜前进。二军团先于六军团于是日离开中甸向得荣进发。

同日 蒋介石在“视察川滇黔三省”后回到南京，发表《巡视川滇黔三省之感想》。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决定放弃“反蒋”的口号，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商讨抗日救亡办法。通电实质上宣布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日 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企图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是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东征历时75天，消灭敌军17,000余人，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红一方面军通过东征到黄河以东进行抗日，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

6日 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为“速筹粮欢迎二、六军(团)”致电红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告知红二、六军团已安全渡过金沙江，到达中甸，红二军团经巴安北进，红六军团计划7日由中甸经定乡至义敦；命令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委员桂干生“勿再前进，速筹粮欢迎”。

同日 红二军团到达中甸与得荣交界的三家村。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十六军李韞珩部李清猷旅占领雅江县城。日前，留守雅江的红四军十一师，为了保障红二、六军团及迎接二、六军团的三十二军的侧翼安全，阻击敌人渡雅江西进，乃主动撤离县城，退到西岸扼江防守。

同日 蒋介石为消灭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命令修建川康、川滇两条公路，“指拨川善后公债500万元，作为筑路费。川康路限3个月完成，行营公路监理处已派队测勘，定15日兴工，由薛岳及刘文辉所部兵工修筑”。川康公路计划由雅安经天全、泸定到康定，全长200公里；川滇公路计划由隆昌起经泸州、叙永、赤水、毕节、咸宁到定威，全长805公里。

同日 波巴青年团临时中央公布《波巴青年团章程》，提出该组织“是波巴青年的革命的政治组织，他吸收了广大的波巴青年参加兴番灭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7日 红二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师越过岗顶河，进入得荣境内的扎拉亚卡山，遭到得荣阿村头人组织的100多名藏族武装的突然袭击，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等人牺牲。红四师迅速组织反击，击溃敌人，占领山口，打开了进军得荣的门户。

9日 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向定乡、稻城挺进。次日，

开始翻越海拔4000多米、其时仍铺着积雪的大雪山和小雪山。红军战士不畏雪山艰险，在狂风大雪中奋勇攀登。

10日 国民党政府中央军暂编五旅二团三营士兵在中尉连副陶树清带领下于川黔边起义。后起义队伍与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合并，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抗日先遣队共八九百人，编为3个队，在川滇黔边区打击反动民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川滇黔边区各县国民党政府和民团纷纷告急。

同日 红二军团占领得荣县城。鉴于该城仅有的十几户人在听信反动宣传后均已出逃，部队无法筹粮，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翻山越岭，亲自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该县龙绒寺喇嘛在亲眼目睹红军所作所为以后，欣然同意贺龙等人到该寺筹粮。经“堪布会议”（寺庙最高决策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000斤，并协助红军在藏民中购到46000多斤粮食和大批牛羊肉与酥油。

11日 鉴于“川中剿匪军事，近又呈紧张状态，因萧贺残部，已窜至盐源边境，企图由宁属北窜，与朱徐合股”，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调大军进剿，以期彻底肃清”。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前往雅安飞机场检阅其总部特务营、迫击炮营及其他直属部队。

12日和15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合股”，对川康甘青方面规定如下部署：（一）邓锡侯、唐式遵、刘文辉三部，应遵前令规定兵力，占领大秋地，及沿大金川左岸自绥靖经崇化、丹巴，至金汤之线，确实封锁之。刘文辉并应负责守备泸定至安顺场之线。（二）周浑元、李韞珩两部，仍固守康定、泸定，并构成康定雅江封

锁线。(三)潘文华率郭勋祺、范绍增两师和熊玉璋旅，进驻汉源、大树堡、越西至泸沽，及安顺场以下大渡河一带，“严密封锁之”。(四)以上各部须扼要各集相当兵力于其封锁线后方。(五)令驻巴安之十六军(李韞珩部)参谋长沈凤盛兼任巴安区警备司令，指挥巴安、得荣、义敦、白玉、武城、德格、邓柯、石渠等八县防剿事宜；“所有以上各县驻军、民兵及别动队，概归其统一指挥”。(六)青海甘肃边区，“仍旧巩固原有之封锁线，但青海部队，应速出兵两团进驻德格固守，并策应巴安驻军”。与此同时，重庆行营对滇康方面也作了部署。

14日 红二军团离开得荣向巴安进发。由于部队所带粮食不足，遂边行军边筹粮。

同日 红六军团抵达康南重镇定乡县城。此前，红四方面军已通过瞻化喇嘛寺写信给定乡、稻城的喇嘛寺，宣传红军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并告知红军兵力强大，劝其不要与红军为敌。当红六军团于是日一进入定乡县城，便受到定乡最大的喇嘛寺代表的欢迎。红六军团指战员严守军纪，军团负责人萧克、王震等还亲自去喇嘛寺参观访问，赠送礼物。喇嘛寺号召四乡藏民卖给六军团一大批粮食。

15日 川军二十一军唐式遵部占领崇化。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向蒋介石禀报川康边境各县、屯1935年分别被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占领的情形。四川省政府详细报告了宝兴、芦山、天全、名山、理番、茂县、懋功、抚边、绥靖、崇化各县、屯“遭陷实情及时日”，称“现在懋(功)抚(边)新收，绥(靖)崇(化)尚待规复。松潘、汶川，匪曾局部扰害，县城无恙。雅安属境虽重遭匪扰，

县城亦幸始终保全”。该报告还说除荣经县长先弃城出走、应由保安处“依照军法严缉归案”之外，其他的县长、屯员“尚无事先退走，摇动军民情事”。

同日 张国焘在纪念马克思诞生118周年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迫近了，这将要更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汇合各方面的斗争经验，提出我们的战斗力”。“我们和红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张国焘说：“现在公开宣布了波巴成立，组织了波巴的中央政府，并宣告了参加联邦政府，成为西北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而“倘若我们有一部分番民骑兵和我们一块去西北活动，这对我们是莫大的帮助”。

17日 红六军团在定乡县城召开全军团积极分子会议。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会师西北与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战斗任务的报告，动员部队继续北进。红六军团在定乡共休整6天。

18日 中共中央用林育英、周恩来的名义，发出《对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由四方面供给等问题致张国焘、朱德电》。电文说：“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电令，使中央与二、六军团仍不能直接联系。

同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指示：两

广出兵北上抗日，^①虽另有企图和极不坚定，但出兵抗日这一点是进步，应予赞助和响应。反对蒋介石破坏两广抗日、制造内战的一切阴谋诡计，提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实行抗日纲领，使两广发动的北上抗日达到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同日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有利条件，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000余人，组成西征野战军（又称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征野战军于是日进行西征作战，经过两个多月战斗，开辟纵横400余里新区。

20日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夏曦（按：当时不知夏已牺牲）等人，热烈欢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采取北上的方针。电报说：“关于红（一方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创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署”。“国际已有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电报还特别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的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

^①指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

军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及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①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奋斗为目标”。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唐式遵部占领丹巴。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派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傅真吾到南京，“商川省军政预标”。

同日 红六军团在各界群众的欢送下，离开定乡，沿硕曲河上行，翻越无名山向稻城前进。

同日 向巴安进发的红二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师在巴安仁波喇嘛寺前受阻。此前，仁波寺的500余名喇嘛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凭借有利地形用武力封锁了去巴安的必经之道。红四师遂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后贺龙、任弼时赶到，争取了当地较有影响的拉波喇嘛，由其出面使冲突得以和平解决。在双方谈判后，仁波寺将寺内粮食和寺庙牲畜售与红二军团。拉波喇嘛经动员以后随红军北进，担任贺龙等人的翻译，一直跟随到达甘孜，后在返回巴安途中，于理化被国民党政府军队杀害。

21日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关于迎接红二、六军团致电红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和王宏坤，指出23日红六军团能抵

^①虽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5日才奉中央电令，在甘孜由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正式组成，但这之前，在中央的电报中已有“第二方面军”的提法，实际上系指二、六军团。

稻城；告知“已令三十二军即在甲洼、摩拉等（待）六军（团）”；提出红六军团到摩拉后“究走何路开瞻化，何地粮、房多能容六军（团）住止休息，望即查告”；要求“瞻化即须准备粮、牛、羊供六军（团）”。

同日 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印发《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大纲》除继续鼓吹“反对毛、周、张、博机会主义”，吹嘘“南下反攻的胜利”外，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一方面停留川康将不得不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斗争对象，这就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另方面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

22日 红六军团主力经桑霍村进入稻城。部队在此休整期间，六军团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批评了长途行军中的不良倾向，部署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军、政工作的具体任务。

24日 红二军团从任波喇嘛寺进至中咱，在此休整5天。

25日 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四、二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一）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按：指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目前议事日程下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二）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

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26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于是日分别检阅其第九十师和第五十九师队伍。其时，薛岳在奉蒋介石之命、实行“总理兵工政策”修筑川康公路之前，先“督筑雅安环城公路，作其枢纽”。此环城公路于是年夏初竣工。

29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首长，重申“对（张）国焘关系承认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过去分歧不必谈，务与之协和团结为目标”。电报还指出：二、六军团6月可至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中央方针，6月底北上，7月底到夏、洮，二、六军团跟进。并指出：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是六、七、八月的三大基本任务。

30日 张国焘鉴于红二、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于是日电林育英，询问共产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共中央，电报说：国际代表团“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张国焘还说“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同日 红六军团在筹集了一批粮食后，于是日离开稻城，向理化进发。

1936年6月

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提出救国救民的25条主张。该布告的发布，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也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指明了前途。

同日 奉命前往理番县大秋地围堵红军的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因交通、运输、给养困难关系”，于是日始抵目的地。

2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令四川省政府处分荣经、宝兴等县县长，称荣经县长在红四方面军攻城之前即“昧于大义，弃城出走”，应“严缉归案”；宝兴等县县长“平时不能健全民众组织，筑碉储粮，……事变猝起，又不能固守以待援军”，应“酌予处分”。

同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抵天全，检阅其第九十二师。后因“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兵力不支，薛岳部奉调离川。

3日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进至理化甲洼村，受到早已筹粮备房、等候在此的红三十二军及藏族群众的欢迎。六军团与三十二军会师后，在甲洼向阳喇嘛寺内，举行了有两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共西康南路工作会议。

同日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通报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六军团先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要求各军：“务速猛烈动员，完成6月突击计划，以迎接我英勇弟兄二、六军（团），坚

决灭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此前，当红二、六军团于3月底确定了北进康北的方针后，红四方面军即从政治、军事、物资等各个方面着手迎接二、六军团，为其省吃俭用，准备了大批粮食、牛羊、食盐；规定每个指战员都要为二、六军团的战友准备御寒衣物，强调在两军会师后要向二、六军团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

4日 国民党政府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抵达泸定、冷碛一带。由于该部和川军邓锡侯部、潘文华部均未按蒋介石重庆行营之规定日期到达，行营哀谈“致崇化、丹巴得而复失”。

5日 为“有利于剿匪军事”而修筑的川康公路正式开工。

月初 国民党政府中央军第十六军参谋长兼巴安区警备司令沈凤盛为防止红二军团攻进巴安县城，将川军二十四军傅德全团、十六军工兵营及从康北南逃的“西康宣慰使”诺那的别动队残部全部收缩~~进~~城，并加固工事。

6日 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和五师在翻越了藏巴拉大雪山后，于是日抵达巴安县城附近。见巴安县城有敌人重兵把守，乃决定派一部佯攻县城，主力则绕城而过，前往巴安城北20里的党村一带休整筹粮。红二军团六师原计划溯金沙江东岸而上，策应西岸的红四师、红五师包抄巴安县城，鉴于西藏噶厦政府令藏军隔江用火封锁通道，红六师遂折回，殿红四师、红五师之后跟进。

同日 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宣布取消“中央”名义。报告说：“我们（和陕北方面）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

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9日 红三十二军陪同六军团进入理化县城。

10日 张国焘电复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表示“一致同意……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7月20日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6月20号前后集中甘孜休息10天跟进”。

11日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颁发《行动标语大纲》，分“关于联合战线”、“关于对张学良和对马步芳等五马的西北各派部队”、“关于对西北群众”以及“关于对内部”等四个部分，拟定了数十条标语。

同日 川军四十一军孙震部曾宪栋师第四旅到达松潘，接替胡宗南所部之防务。

13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约千余人，手步枪六、七百支，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于是日由珙县洛亥向王场进发。在王场附近与敌激战约两小时后，向川滇边境转移。

同日 川军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饶国华部1个团于是日和次日协同国民党政府中央军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围攻丹巴县城，被红四方面军守城部队击退。

14日 红二军团从巴安县党村出发，向白玉县开进。17日到达白玉县盖玉、康翁寺一带。

18日 国民党政府珙县县长率团队和驻军1个团越过川、滇省界进入云南境内追踪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

同日 红二军团抵达白玉县城。由于白玉属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的德格土司之辖区，红二军团进

城顺利并受到欢迎。贺龙等二军团领导拜访了白玉喇嘛寺，喇嘛寺支援二军团部分粮食并赠送马匹。二军团在白玉休整5天。

19日 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甘肃南部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一是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马步芳等人；二是甘南敌情较弱；三是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四是甘南利于补充。

同日 蒋介石发出电令嘉奖国民党政府中央军第十六军参谋长兼巴安警备司令沈凤盛所部，奖励“国币10000元”，“以示鼓励”。称该部自6月3日起至12日在红二军团“攻打巴安时能固守孤城”。

21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以川康公路工程颇巨，二郎山一带尤为艰难，特令川善后督办公署派干部前往兴筑，务期早日完工，以利剿匪军事”。

22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川南招抚特派员王逸涛（叛徒，曾任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电重庆行营，密告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复窜川滇交界之扎西、王场、大石盘一带滋扰”。后蒋介石将此密电转川滇黔各省政府，督飭边区各县长“集合团防，协军剿办”。

同日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城附近的普玉隆村，与专程赶来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藏民独立师和驻普玉隆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合。

24日 松潘县“剿匪”民团稟请上司批准组织“骑探40名（其中番民30名，汉民10名），深入匪区密探”。

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据报：兄部卓克基又退绥靖，当非事实”。询问“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如何策应？”指出两广事变爆发后，陈济棠、李宗仁“组织独立军委”，“蒋介石进退维谷，南京空气悲观，胡宗南业已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弟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同日 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提出“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同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指示，在朱德领导下，作出了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纵队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之线前进的具体部署。

同日 红二军团到达白玉县最大的呷拖喇嘛寺，受到喇嘛和藏民的欢迎与帮助。

26日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先头部队九军由军长孙玉清率领，从炉霍出发，拟经色科（今色达县）向壤塘开进筹粮。

同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第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先遣军先出阿坝，为后续部队筹粮。

27日 红四方面军五军驻绥靖所部向驻守崇化的川军二十一军唐式遵部饶国华师发起进攻，溃敌11个连，重新占领崇化，打通了丹巴至绥靖的道路。

同日 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致电“林育英及北方局同志和一方面军首长”，告诉“萧克、王震同志率六军全部于23日在甘孜与我们胜利的会合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及二军可于29日到甘（孜）”。

28日 朱德、张国焘电令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治委员桂干生率部集中丹巴北进，并准备于7月7日撤

收警戒，7月8日向绥靖出动，直接受五军军长董振堂指挥，并要求徐深吉、桂干生“此时须佯言我军要向天（全）、芦（山）进攻以迷惑敌人”。同日，朱德、张国焘就红五军和九十一师行动另电徐向前、董振堂。

同日 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关于《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及全军首长，详细分析了敌情，说明“蒋目前无大兵在西北，封锁进攻均困难”，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同日 丹巴民团“剿匪”大队长禀报与红军作战经过，并请国民党政府中央军十六军军长李韞珩“发给子弹3,000发，以济急需”。

下旬 蒋介石闻悉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川滇黔三省边区“几股汇合，人员约在1000以上，且有机枪、迫击炮等”，“实有久踞川滇黔边之企图”，遂电令刘湘、龙云和贵州省政府以及中央军驻军“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7日内彻底肃清”。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遂遭受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川军田钟毅旅进驻高县、珙县，范子英旅进驻叙永、长宁，中央军柳际民暂编第五旅进驻黔西、毕节、大定，滇军安恩溥旅调回昭通驻防。国民党政府川滇黔三省边区各县还拟具“三省边区民团会剿计划”，决定集中三省边区各县地方武装，加岗设卡，防守要隘，“协军清剿”。游击纵队叛徒王逸涛则带领别动队，往来川南各县，刺探红军川

滇黔游击纵队行踪，搜捕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

29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因康北匪情较前如缓”，于是日撤销由中央军十六军参谋长沈凤盛兼司令的“巴安区警备司令部”防务，交由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特务大队“督同民兵负责固守”。同日，重庆行营又令中央军十六军军长李韞珩率五十三师、六十一师调回雅江，所遗泸定、康定、雅安、巴安一带防务，由刘文辉派队前往接替。

30日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与二军团在甘孜西面绒坝岔会师。

同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以各县土匪迄未肃清，特飭各区划定区域，切实联防”。

是月 红四方面政治部颁发《收容队工作须知》，对“收容一切掉队与落伍战士”作了具体规定。

是月 红军川北游击队在南江县大河坝召开会议，批判了“左”的作法和军阀主义作风，明确了川北游击队留守阵地的任务，选举了赵明恩为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决定重建党的组织，严格军事训练，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后，游击队在群众支援下，又壮大发展到500多人，建立了以南江县桃园寺为中心，纵约百余里、横约二百余里的根据地，多次粉碎了川陕两省敌人的“围剿”。红军川北游击队一直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与敌浴血奋战。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川北游击队在深山老林不了解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及全国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情况。中共中央和四川党组织虽多次设法与之联系，均未成功。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集中5个团7000余人对川北游击队进行围攻，赵明恩、刘子才先后被杀害，游击队战士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1936年7月

1日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68人和红一方面军等10个单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并红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祝贺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望继续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会合。电报还指出，一方面军正转向甘肃、宁夏方面，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

同日 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从炉霍出发去甘孜，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

同日 红军左纵队先遣部队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下，于色科筹得一批牛羊，是日从日清沟出发北进。

2日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二、四方面军领导会面。

同日 朱德电徐向前：“应不等候我们到让倘（壤塘），即迅速向松潘进，勿失时机”。

同日 由红四方面军九军、四军十二师、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红军中纵队在徐向前率领下于是日离开炉霍、色科一带，拟经诺科（杜科）、壤塘、三湾（沙湾）、安坝、查理寺、上壤口、毛儿盖，向包座开进。

同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左纵队先遣部队到达西倾寺（西穷）。

3日 由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十师、十一师和红二方面军组成的左纵队除二、六军团外，于是日和次日在朱德、张国焘率领下，从甘孜、东谷等地出发，拟经日庆（日清沟）、

西倾寺、壤塘、阿坝向巴西、班佑开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随后跟进。同日，红三十二军由陈昌浩率领出发。

同日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

同日 国民党政府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饬蒋介石重庆行营电令，称红四方面军“盘踞丹巴、道孚、甘孜、炉霍一带，已有数月之久”，而萧（克）、贺（龙）“亦窜至理化、白玉附近，以后情况不甚明了”。“希即转饬各方部队，多派侦察，广为搜索，务得确实匪情，并须注意匪之番号及其企图”。

4日 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占领崇化。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到达毕节杨家湾。是年5月率部起义并担任了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的陶树清，根据敌情曾向游击纵队领导提出缩小目标、不歧视起义士兵与绿林武装和开辟新的游击区等三条建议。游击纵队领导非但不予以采纳，反而视为“动机不纯”，于7月5日晨甩掉陶树清等负责的游击纵队一、二支队，悄然转移。游击纵队一、二支队遂遭到国民党政府中央军柳际明旅和地方民团的“联剿”，部队严重受创。

5日 红二、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的番号改为二、六军，另将红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

6日 红六军从东谷出发，到日清沟会同红三十二军北上。

上旬 红军右纵队之九十一师和五军四十五团分别从丹巴和玉科集结到绥靖一带。

7日 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褒扬”西康宣慰使、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深入匪区，舍身为国”。

同日 朱德、张国焘电徐向前、陈昌浩，告知“孙震估计我们必出松潘，提议在平武小河营控制4团预备队，茂州增加6团；积极运粮草到松潘”。朱德、张国焘主张红九军及九十三师首先在壤塘、沙湾补足干粮经查理寺、毛儿盖出松潘附近首先控制有粮地区。

8日 国民党政府四川“剿匪”总部军事督察处在成都成立，郝墨庄任主任。

同日 朱德、张国焘率部向西倾寺开进。

9日 红军从丹巴撤至巴底、巴旺一带，川军二十一军唐式遵部和民团“剿匪”大队占领丹巴县城。

10日 任弼时给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发去电报，说：“我到甘孜后得知：（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二）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三）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北进，一方面军亦需向甘南配合接应。”“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二、六军团。现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或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同日 由红四方面军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缺二十七团）组成的右纵队在董振堂率领下，从绥靖、崇化地区出

动，拟经梭磨、马塘、侧格、杂窝、哈龙向包座行进。

同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南京开幕。13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绝不能因外患之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之工作”。

11日 红二方面军第二军从东谷出发北上。

12日 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到达嘎曲河。

同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委政李先念率八十九师和骑兵团从川境进入今青海省班玛县作木沟，后折回阿坝。

同日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和三十二军经塘摇沟(唐牙)于是日到达西倾寺、鱼头寺(今壤塘县鱼托)。后继续向北入青海省班玛县境，再后亦折回阿坝。

同日 徐向前为大部队过草地能有粮补充，建议中纵队取道阿坝，以便筹集粮食和牛羊致电朱德、张国焘。

13日 朱德、张国焘电复徐向前，指出“中纵队宜速行动，迟则粮食愈少”，“如阿坝有粮，中纵(队)一部当可出阿坝；但你们目前应用一切方法使中纵速吃野菜，能有15天粮以到达巴西、阿西为目的”。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如能攻岷州城，则“战略上大占优胜”，“朱总司令宜速派人去见王钧、曾万钟”开展统战工作。

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转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争论之要点及经过，提出张国焘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表现。电报还指出：“现(任)弼时已到张国焘处，二方面军已随四方面军北上。据弼

时来电，已商得朱（德）、张（国焘）同意，认为极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的干部不会赞成国焘的观点”。“我们相信”朱德“也是不会赞成国焘的”。

15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财政厅长刘航琛谈本年度川省财政收支状况，其中称“剿赤费由军事委员会每月直接支付70万元”。

中旬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进入彝良洛旺。在打垮地方民团、活捉团总以后，向筠连方向开进。

19日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目前在西北地区筹取粮食资材办法》。提出“根据党目前新的策略路线，过去红军中一般用‘打土豪’、‘打发财人’等口号来筹集红军给养军需与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些办法，现在是不适合的”。此《办法》对在少数民族区域和汉人区域筹取粮食资材分别作出具体规定。

20日 徐向前率红军中纵队先头部队到达查理寺。

同日 朱德、张国焘电董振堂，令右纵队在波罗子、杂窝一带筹粮10天，并以一部向松潘佯动，迫使敌人防守松潘城，并查明松潘敌情，相机取松潘。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抄发“川南招抚特派员”王逸涛（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叛徒）关于《招抚工作及治理川滇黔边区个人具体意见》。王称他“自奉命川南招抚数月以来，期于短期将川南边区肃清，但犹未能达到根本肃清之目的。统计目前川滇黔交界边区土匪赤匪，尚达数千之多”。甚至“多数豪绅对共党，现在不但掩护，而是大力的给予帮助，尤其萧（克）贺（龙）窜黔西时，此种现象最为活跃”。蒋介石重庆

行营同意拨给王一支部队，飭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核办飭遵分行滇黔两省府，……令仰该省政府迅即分别查明妥筹核办具报”。

22日 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明“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告知：“国际电台联络从6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同日 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和三十二军分别于是日和翌日到达上阿坝。

24日 川军四十一军军长孙震日前电令所部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全部增援”松潘，第一二二师四旅于是日转告国民党政府松潘县长“在王（铭章）师未到以前，仍请吾兄转知各土官，对各要隘切加注意”。同日，松潘县政府令“松（潘）理（番）游击司令”、土司苏永和“迅派得力可靠之人”前往各处详细侦探已经“回窜”的红军情况。

25日 红二方面军总部及红二军抵达上阿坝，与红六军、三十二军会合。后上述各军在此筹粮数日。

同日 国民党政府四川“剿匪”总部通报“前方各部”，电称“朱（德）徐（向前）残匪以我在懋功、抚边防务严密，不敢犯境，已折窜川边各地，巴塘仍有少数匪部，抚边境内未发现匪踪。”

27日 中革军委给红一方面军各部发出指示信，指出：

目前的情况是蒋介石压迫各派军队对红一方面军及陕甘宁进攻，阻止一方面军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指示信要求一方面军完成规定的任务，以便更有力量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完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

同日 中共中央同意张国焘建议，正式批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吴溉之任秘书长，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同日 朱德、张国焘到达牙磨河（阿木柯河）。翌日向色既塘行进。

同日 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通过草地，于是日抵达班佑、包座地区。

同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在松潘县镇江关与川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三师陈宗进旅“激战终日”。后红四军向黑水芦花方向开去。

同日 四川“剿匪”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刘湘，为“根本肃清”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向已奉命由宜宾移驻长宁的保安第九团团王登谷下达进剿手谕。

2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成都通讯说，你们还在大金川。青海通报说，你们两路出青，一路出甘，前锋到阿坝。但有说你们抵芦花者”。询问二、四方面军“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告知“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同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三十一军向松潘进攻，一路取道黄胜关，一路取道柏木桥。川军四十一军第四旅马泽

部防守漳腊，张熙明旅一个团进守松潘城。翌日，红军与马泽旅于黄胜关附近遭遇，战斗异常激烈。

29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防止红二、四方面军由四川进入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颁布如下“计划纲要”：（一）凭藉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封锁红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区草地内，阻其会合，并由川康抽兵分途追击，“促进崩溃”。（二）除严密封锁、坚壁清野外，结集兵力在甘肃、青海、四川边区重点地区。其中川西主要阵线，一是沿岷江经松潘、漳腊至踏藏，并调重兵控置平武、江油、绵阳、北川、茂县、灌县；二是沿涪江、平武、绵阳段；三是嘉陵江、广元、阆中段及广元、宁羌段。（三）规定追击路线为：一路由大秋地出马塘，二路由懋功出卓克基，三路由金汤出丹巴，四路由康定出泰宁，五路由德格绕（青海）玉树。

同日 国民党政府松潘县长向第十六区专员公署专员报告已成立“铲共义勇队”（其时的松潘县为红二、四方面军由川入甘的必经之地）。

30日 红六军从下阿坝出发，拟经贾诺、箭步塘、嘎曲河、阿木柯河、色既塘向包座进发。

同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三十一军向上、下包座开进，与红五军、三十二军会合。

同日 蒋介石“以离川日久，对于川省军政情形，亟欲明了。特电召川省主席刘湘赴庐山，藉资垂询”。刘湘特派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表前往”，邓于是日离蓉赴庐。

同日 被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负责人甩掉的该纵队一、二支队，在阮俊臣、陶树清率领下，于是日攻打贵州省织金县城，因行动受阻，乃主动撤离。后一、二支队继续转

战川滇黔边区，并联合绿林武装，打击地方民团，惩治贪官恶霸，受到群众拥护，队伍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规定如下部署：（一）川军四十一军孙震所部置重兵于平武，其在后方部队，悉数控置绵阳、江油。（二）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派有力部队，速向西固、文县、南坪之线推进，联络川军孙震部相机夹击。（三）令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派兵接守孙震所遗安县、北川及叠溪、镇坪线防务，并于安县、北川、茂县、灌县各约控置1师兵力。另外，令刘湘除接防泸定、康定、雅安、丹巴线外，并先派1旅由金汤出丹巴追击红军。（四）令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除守现防外，应于崇庆、大邑各控置1师兵力并派兵1旅出马塘追击。

31日 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占领绥靖。

1936年8月

1日 红四方面军全军在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以后，到达包座地区。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到达包座表示“无限欣慰”，并希望“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线，北出发生困难”。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电后当即电复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巴西、阿西（茸）、包座前进颇称便利。两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

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同日 中革军委关于国民党政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防二、四方面军北进封锁计划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明朱绍良的封锁计划主要是凭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将红二、四方面军封锁于川、康、青、甘边区内，“并由川、康抽兵分头追击”。

2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知岷州一带敌人兵力薄弱，敌援军到达岷州需7天以上，故红二、四方面军应速出甘南、速占天险腊子口。

同日 国民党政府松潘县长急电第十六区专员公署专员并转刘湘、孙震、唐式遵和蒋介石重庆行营等，称红军几路并至，其兵力为胡宗南部“驻松兵力20倍”，“吁恳剿匪大军，星夜驰来松坐镇防剿”。同日，松潘县长在另一急电中报告：红军“先头四军团，已向甘（肃）省前进；后续尚有五军团，意在两面就松（潘）觅食，一面打通甘、川、康之线”。“漳腊飞机场，中央军尚埋有多数炸弹、汽油，万一松、漳失守，将资匪用”。

月初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从下阿坝出发，沿红六军的路线向包座进发。

月初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求吉寺会议是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其时，敌人在甘肃南部集中5个师，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由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在循化至贵德和兰州以西的新城经西宁至湟源之线扼守，防止红军西进。不过，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敌人在甘肃、青海的部署尚

未就绪。中共中央西北局求吉寺会议根据中央8月2日“速出甘南”的指示，拟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以便顺利北进。《计划》将二、四方面军分为3个纵队：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为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陈昌浩任政委，8月5日至10日由求吉寺、包座出动，主力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县，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动；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王树声任司令员，詹才芳任政委，8月7日至10日分别由包座出动，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一部向夏河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贺龙、萧克分别任正、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8月12日先头部队由包座出动，21日前集中哈达铺，策应一、二纵队。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计划》要求先头部队在求吉寺、巴西、阿西（茸）筹粮，“除本身补充5斤外，其余应留给后续部队，不得浪费”。

3日 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为热烈欢迎二、四方面军北上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5日 陈昌浩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率左纵队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骑兵师等部队抵川甘交界处的蔡里、公坝、俄界间宿营。同日，红九军军长孙玉

清率该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进至求吉寺附近宿营。

同日 朱德、张国焘签发中共中央西北局求吉寺会议制定的《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中共中央西北局还于同日发布求吉寺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着广泛发展抗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并开展西北部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下，主力红军（由四川）进入甘南地区，必须以“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的组织形式。这一政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号召、动员与团结组织广大抗日群众及一切不当亡国奴的人民，积极起来参加抗日反蒋战争，同时应在斗争中注意满足基本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严厉镇压一切积极反抗或阴谋破坏抗日阵线的汉奸卖国贼的活动。

6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发布《作战前的整理计划》。指出“我们已经胜利的通过了草地，克服了粮食困难，现在已到达包（座）、班（佑）一带，接近了战役地区”。要求各部队“应即利用时间进行下列的整理工作”：（一）由甘孜、炉霍、道孚到包座、班佑的行军总结。（二）依照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关于当前战役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各部深入普遍动员。（三）关于军事方面应即进行的准备事项。（四）关于供给方面的准备事项。（五）关于卫生方面的检查总结与注意事项。（六）关于参谋工作。

7日 国民党政府松潘县长向十六区专员公署专员转报松潘下三寨各土官的报告：红军在辣子山经山脚到包座，“过三日半，有10万余人”。

同日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使《岷洮西固战役计划》顺

利实施，减去侧翼威胁，扩大抗日阵线，给驻守松潘的川军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送去一函，指出“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接防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

上旬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一、二支队在阮俊臣、陶树清率领下，迂回到镇雄、毕节边境，遭到川、滇、黔三省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政府中央军柳际明旅重兵追堵。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一、二支队势单力薄，又不能和纵队领导取得联系，处境日艰。后敌人步步紧缩包围圈，并用重金悬赏缉拿阮俊臣、陶树清，一、二支队被迫折回川、滇边境。10日，陶树清被敌人杀害。

上旬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拟定《庆祝一、四方面军大会合战士讲话大纲》。《大纲》一开始就说：“四方面军全体战士谨向我们的老大哥红一方面军全体英勇指战员致最亲爱的革命敬礼！”“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的眼睛望穿了。……我们（在金川河谷）吃不熟的梨子，在草地上扯野菜钓鱼、吃牛皮”。《大纲》说：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三只铁拳在一条火线上合起来作战，一定更有把握，打更大的胜利仗”。“现在已经胜利的会合了，我们已经一致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坚决的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接到此大纲后，立即利用空隙时间进行练习。

9日 朱德、张国焘为向国民党军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致电陈昌浩、程世才、李先念。

同日 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写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说：“我这次随朱（德）、张（国焘）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伯承）、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需要的问题，陕北同志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

同日 红二方面军拟在阿西茸、巴西、包座一带休息数日。其所属红六军于是日拂晓派队接替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在中包座、上包座对松潘的警戒和送牛及守桥任务。

10日 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发布其对宝兴、抚边、绥靖、崇化、芦山、天全、名山、茂县、懋功、理番等“失守县、屯长”的处分，已为蒋介石重庆行营核准的训令。该训令称：“查县长责在守土，应与城共存亡，……此次残匪南窜，川康边境各县、屯长，昧于守土之责，未能固守待援，以致城池失陷，亟应查明严究”。

11日 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二军、三十二军抵达下包座。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由黔境进入距珙县王场仅60里的斑鸠沟。国民党政府珙县民团和保安团在该县洛表等地防堵。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发表谈话，谓“赤匪迭经国军围剿，死亡过半。现其主力在包座附近，另一部在漳腊北方，是否由松潘窜扰川北，或由甘边窜扰陕甘，尚难判明”。

12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国民党各派统战策略的问题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发出指示，指出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战之目的。其战略方针是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早日实现。打通苏联，是为实现新局面，进行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一环。

同日 朱德、张国焘关于攻取岷县的部署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为“歼灭”红二、四方面军于川、陕、甘边境作了部署。其中规定川康部队，除仍固守现防各碉线外，原定5个追击队，其第一第二两路应即编组小部队，先出马塘、卓克基，向北追迫；另组10团以上部队，先行集结昭化、广元一带，准备进出碧口。

13日 红六军抵上包座，后按计划离开四川，向甘肃南部进发。

15日 朱德、张国焘为对付敌人向岷州增援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同日 负责在川南珙县、长宁、兴文一带“防剿”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国民党政府四川保安第九团团王登谷向四川保安司令刘湘汇报“剿匪”方案。称：“查（川）南六（县）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县）、长（宁）、兴（文）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仍未予匪以重大打击”。该方案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剿匪训旨”，拟定了“具体办法”。

16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总政

治部主任周纯全发布《部队到达岷（州）、洮（州）、西（固）后应注意之点》。

19日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进入甘南地区后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20日 中共中央制订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要求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0月或11月在陕甘大道会师。

23日 国民党政府高县县长电称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一部“约人枪200余，已窜入蒿坝五里坳”。

同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代电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以川省匪情和缓，剿匪经费，前月发70万元，现应每月核减18万元，希转饬各军经理处，列入（民国）二十五年度军费预算内”。

24日 蒋介石重庆行营规定如下部署：（一）川军四十一军军长孙震指挥所部，先抽派10团以上兵力，即日开动，出碧口向文县、武都、西固方面，协力“堵剿”红二、四方面军。其在平武、松潘部队，俟交防后，令其担任维护碧口、广元、昭化、梓潼、绵阳一线交通运输。（二）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指挥所部，增派共至6团兵力，即开昭化、广元，为预备队，归孙震指挥调遣。（三）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应立即派队驰往平武、松潘一带接防，并酌置一部于绵阳、梓潼，集结备用。重庆行营此规定颁布后，孙震部以一二二师、一二四师及军部5个独立连开拔，邓锡侯部派一二五师3个团、一二七师2个团及第八旅1个团前往昭化、广元归孙震指挥。刘湘令范南煊旅就近先接松潘、平武防务，一四九师集结梓潼、绵阳备用。

25日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于是日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

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同日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一部在珙县铜罐坡一带活动。其主力在开向彝良洛旺途中，截获镇雄大土司的几十担布疋，分给穷苦百姓。后纵队转移到大雪山一带。其被纵队负责人甩掉的一、二支队突围人员，在阮俊臣率领下，于9月初找到纵队主力，汇报了一、二支队被甩掉后的不幸遭遇。纵队负责人决定吸取这一血的教训，正确对待起义部队。后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继续在三省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围追堵截下，孤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历尽艰险。虽然纵队的主体于1937年1月解体，但纵队所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和云南游击支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仍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947年。

27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党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30日 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即中革军委）对一、二、四方面军的军事进行部署。

同日 陈昌浩、徐向前对岷州、洮州地区部队行动建议致电朱德、张国焘。

是月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于本月25日至9月6日全部进抵哈达铺。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在北上中战胜敌人重兵的前追后堵和骑兵、飞机的袭扰，克服西北高原无数艰难险阻，排除张国焘不愿到陕北与中共中央会合的阻力，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四军第十师于10月8日在甘肃会宁以东的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第一师及七十三师会师；二方面

军指挥部于10月22日到达甘肃静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二师会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答王怀之和盛明同志

——兼谈长征在川历史的研究

《四川党史月刊》1990年第二期、第三期刊载署名王怀之的《对〈长征在川大事记〉的几点浅见》（简称《浅见》）和盛明的《编纂大事记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简称《工程》），抒发了己见，不无可参酌之处。但有不少意见和论断，失之偏颇，难予苟同。谨陈陋识于后。

一、要有实事求是治史的郑重态度

大事记是历史，应当写真史、信史。我国古代治史就提出“史德”问题。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史贵直书”的思想。中共党史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忠于事实，才能写出信史。而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史学工作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党史研究是这样，党史评论也是这样。

历史是人类活动连续性的表现形式，“人”理所当然的必定成为历史的主体。红军长征是在未能粉碎反革命武装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红军万里长征，要突破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各省军阀部队的追堵，“天上每日几

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① 长征红军在与“天、地、人”的斗争中，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斗是最主要的。作为长征大事记，理当不能“见物不见人”。而且以往许多长征著述（包括大事记），大多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涉足敌人。我认为，如果不反映敌人的追堵，要说长征伟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它首先是在数十万敌军追堵中进行的。要讲长征，就必须讲进行追堵的敌人，否则，“长征伟大”无法解释，也不能反映出长征的全貌，不能衬托出长征红军是英雄好汉。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蒋介石更是不惜血本进行追堵。他先派参谋团入川，后亲自坐镇四川150多天，扮演战场指挥官的角色，还调湘鄂川边徐源泉部3个师进驻川东，调胡宗南部到川陕边、川甘边，调薛岳部3个军入川。为防红军由川入甘、青，他委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任第三路军总司令（其下属马步芳负责“侦防”阿坝地区的红军），还从豫皖边和江西分别调来中央军第三军和三十七军。加上川军（仅百丈关战斗，川军就集中80个团对付红军15个团），以及四川地县反动武装和被国民党利用的少数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围追堵截的兵力是数十倍于红军的。至于长征大事记中敌人追堵部分究竟该占多大的比例，可能不会有硬性的规定。拙作大事记共1440多条，敌方为432条，占30.6%，我方占69.4%，但《浅见》却说“据统计在近1000条目中，敌方有430条，占43%。”通常人们判断或衡量事物达到的程度，总以70%左右作为基本度，《浅见》玩了一个算术游戏，分子不变，压低分母，商数增大，基本度只达57%，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从而质问“究竟是写的红军《长征在川大事记》？还是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大事记？”把近70%弄成57%，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用100%的条目写长征红军并不一定观点正确，用30.6%的条目写敌人追堵也并非观点错误。关键在于能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编写出符合历史真实、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事记。

《浅见》在沿引或摆弄数字上还有不实之处。比如璞玉霍等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作者自己说明是6.3万字，《浅见》却说只有“2.6万字”；郑理、豫人编的《红军长征大事记略》，书末版权页注明8.5万字，《浅见》却说只有“6.8万字”。用编造的数字进行针砭，这又是为什么呢？何况单就字数多少来判定是非，未免失之偏颇，更不能显示见地的高深。

我们知道，大事记有年表、月表、记略和大事记等几种体例。不同体例，条目的多寡及每条的字数不尽一致，不能都是一个口径，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字数。年表最简，月表次之，而“记略”顾名思义每条字数亦不宜多，一般一两句话即为一条。大事记则不同，比上述几种体例，字数要多，内容更充实，每条尽可能地要有情节。不能因为“纪录了60年”的《中共大事年表》中“长征一段不到1万字”，也不能因为《长征大事记略》才85000字，拙作就不能超过10万字。何况长征两年，在川历时达一年零八个月。长征在川这段历史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红军要和大自然斗，和敌人斗，还要和张国焘斗。长征许多奇迹又发生在四川。风风雨雨，惊天动地，该是一幅多么绚丽又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长征胜利半个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所以选在

四川建立了全国的红军长征纪念碑，是有深刻道理的。拙作意欲既反映地方特色，又要从惯用的单一的只写红军本身的纵向研究，向着多元的横向研究转移。兹事体大，宏观微观，大事要事，比那些“年表”、“记略”多一些字数又有何不可？

《浅见》说，拙作“全文只20余条反映筹集粮食的事”。而事实上，拙作不包括四川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的条目，仅红一、二、四方面军筹集粮食的就有58条。

《浅见》说，“翻越大雪山，只两条百来字”，“过草地只3条几句话”，“对雪山草地本身的恶劣情况及红军付出的惨重代价基本未提”。这又有悖于事实。窃以为，编写大事记应不落窠臼，敢觅新径，尤其应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有人写懋功会师，不但有6月11日至16日几个日期，而且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预先安排好了。我则根据各种可靠资料考证、并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实地调查后，才用几十个字在大事记中既点明会师的日子，又点明“在靠达维一侧的”具体地点“突然相遇，两军意外会师”。我还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前，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已经翻越了虹桥大雪山这一史实写了进去。对于中央红军翻越的五座雪山，有不少著述（包括权威著述）是把后面三座的次序排错了，我便点明什么时候“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第三座大雪山长板山”等情况，再交代翻越后两座雪山的史实，以对几座被颠倒了次序的雪山进行订正。而一、二、四方面军是一个整体，三个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应讲到。事实胜于雄辩，整个大事记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及其艰辛的记述则有24条。除中央红军翻越的5座雪山之外，我还将更多的、由红二、四方面军翻越的雪山的山名都作了记述，甚至

把许多雪山的海拔高度也标了出来（因为我多次前往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我分别写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茫茫草地”、红军在草地“吃野菜”、“草地朔风凛冽，天寒地冻，部队减员甚大”；“隆冬季节第二次（原属一方面军的则是第三次）翻越夹金山”，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在狂风大雪中奋勇攀登”，“铺着积雪的大雪山”，不少红军“先后在严寒中被雪山的狂风雪浪所吞噬”；“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以及“在草地采野菜、吃牛皮”等等。我相信，“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

《浅见》说我把“华北事变”、“两广事变”“都给忘掉了”，这也是不实的。关于华北事变，我在日本侵略者向何应钦提出要求华北大部分主权的“觉书”6天以后的6月15日（红军两大主力刚刚在欢庆懋功会师），就在大事记中写了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此事发表的宣言。在6月29日、8月4日、1月16日和25日几条中分别写了博古作日本侵华的报告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并华北”等。至于两广事变，不但在5月18日条写了160多字，还在5月大事记末尾加了专门的注释。在6月2日和25日又提到“两广事变”。这怎么能说是“基本上未作反映”呢？

另外，拙作究竟是歌颂伟大的长征，还是给追堵红军的敌人唱赞美诗，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公论，因为论从史出。如前所述，《浅见》将大事记中敌条占30.6%编造为43%，在此基础上又说：“在另一方面，关于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条目却是寥寥可数。其中写出姓名的只有四、五条，只相当于薛岳的五、六分之一。作者为何厚此而薄彼？”我认为还是让事实来

说话。在大事记中，我写出有名有姓的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含军师级领导人）的条目明明在230条以上，怎么要说成“只四、五条”？另外，由于长征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珍贵的文电没有保存下来，而现有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开。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每天的行止，我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但凡已掌握、并经考证，又应在大事记中记述的，也已用上了。比如毛泽东翻越夹金山后，抵“达维”镇，进懋功城，去抚边，到两河口和参加两河口会议的确切日期；比如“朱德在陈家岗，徐向前在五家口，王维舟驻天全”。我通过自己沿着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路线从头到尾进行实地考察并经过十多年来对长征在川历史的发掘、开拓，还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以前，人们只知道长征时毛泽东在四川境内仅仅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巴西会议。本人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实地调查、考证、研究，发现了毛泽东在四川境内还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石箱子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白沙会议，并对这两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与会人员及会议性质、内容等作出了科学的说明。这些新的建树，这些党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已愈来愈得到有关部门和省内外专家的认可。在大事记中，我对薛岳是用了一些笔墨，因为他不但入川前就“围剿”、尾追中央红军，入川后又在川驻扎一年多。他所率3个军8个师约5万人，武器比川军精良得多，既成为蒋介石乘追堵红军之机打进四川、消灭异己、镇慑四川军阀的实力，又是蒋介石妄想四川“剿灭”红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他死心踏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在四川干尽了坏事。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并动员

全川人民“坚决消灭薛岳卖国匪军”。我对薛岳是鞭挞还是歌颂，读者自会明鉴。

再有，王怀之和盛明为了给我上纲上线，竟采取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的手法，说大事记中“一些条目对敌人有近乎溢美之词”，甚至质问“列条意义何在”？她“抓住”的主要“钢鞭”是我写了“蒋介石饬转刘湘‘严禁各乡绅士，以筑碉为名，强捐勒索’”。说我“将蒋介石所谓严禁强捐勒索的”这“一纸骗人的手令写入党史的大事记”，不但“迷失政治方向”，而且是“美化敌人”，美化蒋介石“真是爱民如子，深虑百姓遭受勒索”。我不明白，王怀之和盛明在对我挥舞大棒时，怎么不将我大事记同一条目中写“手令”前面、揭露“手令”实质的两句关键话也引出来：“鉴于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地土豪借围剿红军而加重对四川人民的剥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我还写了蒋介石“为了与匪争民”、他发电给刘湘：“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来时，对人民毫无干扰，有因饥饿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我交代了蒋介石说这是红军“借此煽惑民心”。蒋介石为了收买民心，消除红军在民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勿为‘匪’所利用”。我列出这类条目，意在揭露敌人收买人心的反革命伎俩，还是在美化“蒋介石爱民如子”？读者也会明鉴。

综上所述，王怀之和盛明为了贬低大事记，竟不惜采用玩弄数字游戏，编造数据，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的手法，来唬弄读者。更有甚者，沿袭早已为人们所不齿的、所唾弃的故伎，动辄挥舞大棒，在学术问题上，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乱扣政治帽子，欲置对方于死地，岂不是“学阀”味

太浓了？这不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和职业道德。

二、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史学是严肃的科学。我在编写大事记时，将多年来搜集的可靠资料进行甄别以后，尽量进行科学、准确的编写，使其真正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浅见》说我写的各类会议太多，“中央会议18次，在川的14次（《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仅4次）。”窃以为，既然党史所包括的三个内容之一，是党由创建，到发展，到成长变化的历史，这里面当然包括党的各种重要会议及其主要参加者和作出的重大决策。何况党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在川最多。而在川召开的好几次重要会议，许多长征著述又很少提及。即使对一些人们熟悉的重要会议的开会地点和时间，搞错了的也不少。比如会理会议，是在会理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铁厂召开，可是一些权威出版物的长征地图竟将会议会址的方位也标错。有的权威著作又将沙窝会议的开会日期搞错（日期准确是大事记的起码要求），并把它和毛儿盖会议混为一谈。为防止以讹传讹，我专门去沙窝和毛儿盖实地调查后，在大事记中除点明8月4日至6日在血洛召开沙窝会议，20日在毛儿盖索花喇嘛寺召开毛儿盖会议外，特意将“准于明4日10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的中央通知收了进去。同时，如前所述，不能以大事记不同体例中字数最简的年表来要求内容更充实、字数比年表更多的大事记。而且即使如《浅见》举出的《中共大事年表》，也将一些重要会议（包括长征中的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列了出来。另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土地革

命战争大事月表》，更是把长征时期重要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全部列了出来，虽然“月表”是应该比“大事记”字数少的体例。我还认为，许多人对于在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常务会议、常委会议等10余次重要会议可能不完全了解。尤其对于红军长征在川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求吉寺会议，不甚了解的人可能会更多。当时，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以后，党中央于7月下旬批准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被粉碎，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从四川共同北上的愿望。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求吉寺会议。我还交代了求吉寺会议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二、四方面军“团结巩固、士气高涨”表示“无限欣慰”，并“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而这样重要的会议，竟成了许多长征著述中的空白和薄弱环节。我把它写进大事记，述过去之未详，补过去之疏漏，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王怀之和盛明为了贬低大事记，仍予以训斥。

《浅见》说，大事记“前言说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了向四川进军。是没有的事”。看来王怀之对这一史实并不了解：通道会议前夕，蒋介石布置了精锐部队16个师于红军去湘西的必经道上，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去钻。而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和“太上皇”李德仍机械地坚持去湘西的原订计划。在通道会议上李德“提请大家考虑，我们……转向北方（湘西），与二军团联系”。但是，“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

乘机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指红四方面军——笔者注）会师。”^①这是李德自己在《中国纪实》中的记述。连“太上皇”李德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敌变我变”的历史事实（还有另外的佐证），王怀之怎么那么武断地说“是没有的事”呢？

《浅见》举出另一“内容欠真实准确的问题”，是“关于1935年2月8日，‘军委在扎西举行扩大会议。’有误。据考，中央军委9日才到扎西，8日怎会在那里开会？”首先，《浅见》说“中央军委”就不准确，是将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混为一谈。1931年1月成立、同年11月正式改称的中革军委，在长征时期没有变动，它是属于政府系统的最高军事领导和指挥机构。由于它和隶属于党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中央军委（1937年8月正式恢复）在组织系统、任免程序、工作重点和部门设置等方面都不同，因此建议王怀之应准确使用重要的历史概念，不应混用（连张国焘在另立“中央”时，称他的“军委”也是“中革军委”，而非“中央军委”）。至于我讲到军委在扎西开会也是写得比较活的，并非专指“8日”，看看原文就知道。中央和军委领导2月6日就到石坎子，7日即抵大河滩，上述两地均为扎西附近的小村庄。在扎西是肯定举行了会议的，这在党史界原本已是“求大同”的事了，只是对会议性质还有争论。如果王怀之对于在扎西开过会的史实还不了解，可参阅《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4期和1990年2期、4期关于扎西会议的三篇文章。

^① 李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实》（1932—1939）第124—125页。

《浅见》说“2月28日条，红军‘进入道孚城’。有误。应为3月1日……占领道孚。”这里，王怀之不但本身对这一史实不了解，而且又根本未将大事记认真读一下。我写“28日夜”，“红军进入道孚县城”，而“灵雀寺喇嘛退入城北寺庙及后山碉堡”，与红军对峙；29日，该寺喇嘛“企图夺回制高点”；3月1日，“红军占领灵雀寺，控制了整个道孚城。”应该说我的交代是清楚的。那么，到底是谁“欠真实、准确”呢？另外，“进入”既不等于“占领”，更不等于“整个控制”，这些起码的常识就用不着解释了。

《浅见》说“‘红军在百丈……持续作战七昼夜’。不确。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86—188页载，为四昼夜。”百丈战斗到底打了几天？最有发言权的应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当然，以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回忆为主写的那份文史资料是珍贵的，但由于百丈关战斗时他们的职务不高，只能是参加与红军部分作战的局部回忆。加之年代久远，个人回忆难免有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的个人回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正因为这样，就需对个人回忆进行考证。而徐向前元帅不但当时了解全局，建国后又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几十年认真研究以后，才非常慎重地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①至于《浅见》讲百丈战斗应为“四昼夜”，那是指鹿为马的说法。徐向前元帅在同一书的470页里写道：“我军坚守在月儿山、胡大林、鹤林场及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的山岗丛林地带，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三昼夜。”徐帅所谈这场拉锯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第471页。

战与“百丈战斗”是两个概念，这在《浅见》所引《四川文史资料》第22辑的183—185页也作了记述，但王怀之似乎没有认真读书，更没有分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自己一知半解，没有搞清楚，却指责别人，此种作法本身就违反了科学精神。

至于《浅见》说蒋介石不是“命令”四川军阀交出政权，而是“嘉慰”。谁是谁非，只要看看国民党人周开庆的《民国川事纪要》第570页蒋介石的“电令”就知道了。

《浅见》说我将“并非大事”、“无关宏旨”的事，“甚者就连国民党通缉一个小学教员（共产党员）也单独列了条”。大家知道，红军长征时期由于蒋介石与四川军阀沆瀣一气，至1935年5月，除少数地区外，四川的中共地下组织均遭破坏。但没有被杀绝的共产党员，仍勇敢地用多种方式投入了以支援红军长征为主的战斗。我选出其中的典型进行反映是应该的。不能因为这些党员没有官衔，是普通的“兵”、“民”，就不予以记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毛泽东也说过：“兵民乃胜利之本”。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的历史，同时也是普通党员斗争的历史，只要是“大事”、“要事”，一样可以在大事记中列条。《浅见》在这里举出的“甚者”，原文为：“刘湘电四川‘剿匪’军各路总指挥”，“及其各军、师、旅和全省各县县长，命令通缉‘当朱毛到时，竟敢接应欢迎，事后仍留后方工作的灵关小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强调‘毋使漏网，是为至要’”。刘湘这个电令之前5天，蒋介石也亲自专门电令“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四川省政府”“通缉捉拿……灵关

高小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①可见敌人是相当重视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席懋昭于1932年入党，一直英勇斗争，1949年11月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渣滓洞，却又被长期埋没。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天全前夕，他率领由他组织的游击队去迎接红军，后正式参加红军。在完成安全护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出川赴上海的任务后不久，被敌人逮捕。西安事变后他一出狱，即奔赴延安。后又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直至1948年第二次被捕。陈云在抗战时期就向四川省委打听席的去向。直到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终于将这位被长期埋没的共产党员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这样的党员虽然普通，却很伟大，为什么就不能选入大事记？我认为，在研究、著述我们党的历史时，必须时刻牢记：党的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当然，我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并不否认领导者的个人作用。这些，大概也是与王怀之“带有根本性质”的“不同意见”。

党史研究应是科学的研究。党史的时代价值不能与其科学性、真实性对立起来，为现实服务应以科学、求实为前提。真实有益的历史启示，不可能从虚假的历史中清理出来，历史研究愈是科学，愈能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既然大事记是以条目形式将每事系于年月之下的历史著作，同一天发生的事，也应以时间先后为序。但《浅见》却说“5月12日，将中央会理会议置于蒋介石致胡宗南手令之后”，是“轻条压重条”，“将次要的敌条置于红军重条之上”。接着，又挥舞大棒，对我上纲上线。我认为，会理会议是重要，但它是“本日14

^① 见本人所编大事记1935年6月26日和7月2日两个条目。

时至晚上召开”（大事记作了交代）。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出的开会通知说“于今14时到（会）”。^①会议参加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说“散会已经半夜了”。^②而蒋介石的手令是在这之前发出的。另外，红军有许多大事（比如巧渡金沙江和利用夜幕掩护进行的战斗）是在夜间发生，难道也应该放在白天发生的敌条之前？我认为那决不是科学的态度。郭沫若曾说过：“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并不嫌长尾猿的尾巴太长而要把它缩短一点，也不因为古代曾有图腾崇拜，而要把爬之类依旧当成神灵。”^③

三、研究历史要发扬严谨的学风

党史是党性很强的学科，对长征在川历史的研究一定要严谨，修史人对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断语，尤其要慎重，决不可掉以轻心。史学评论也是这样。要是评论文章离严谨越远，它本身的名声遭到的损害也越重。那就不是评了别人，而是评了自己。

《浅见》说我“虽用800多字”写了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但未点出：自此开始长征”。不知王怀之是否了解党史界对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一直有“3月28日”、“4月中旬”和“5月”三种不同的看法？笔者198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听到杨尚昆同志代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第12卷第22号文。

② 引自陈云同志给中共会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9日的文章。

表中共中央的讲话就说四方面军5月开始长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大事年表》第104页也这样说。我个人意见归个人意见(毋庸讳言,我个人认为四方面军长征应从3月28日开始计算),但写断语(尤其是对于至今史学界仍有几种不同看法的历史事件的断语)就要持慎重态度。我是将史实写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作判断。

《浅见》说“二、六军团入川前的活动”和“虽在川但未参加长征的川滇黔游击纵队、川北游击队”都是“与(长征在川)主题不太相关的”。我认为,二、六军团入川前的活动,包括“为何决定入川”,“应该怎样入川”和“在川的四方面军又怎样接应”,全都与“长征在川”的朱德、张国焘取得联系的,(当时红二、六军团早已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只能和时在四川的朱德、张国焘联系)。我选用红二、六军团与在四川的朱德、张国焘双方几封必要的电报往来摘要应该是应该的。而既然是“长征在川”大事记,就应该把围绕这一主题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包括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等系统地反映出来。另外,由长征红军为主组建的川南游击队和全部由四方面军指战员组建的川北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牵制敌人,是长征红军直接留下的火种。没有长征,就没有这两支游击队;谈到长征在四川,必须要谈到这两支游击队的来龙去脉。这怎么会是“与主题无关”?

《浅见》说“与主题全不相关”的例子,则是“国民党政府公布《西康省委组织条例》”(《浅见》在这里又改动了文字,原文为《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是“建省”,不是“省委”)。我写上这十几个字真的“与主题全不相关”吗?非也,多年来,许多长征著述(也包括一些权威著述)都说长

征“经过西康省，而没有经过青海省”。我用历史事实说明长征经过了青海省（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曾来信向笔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省对于“红军长征经过了青海省”这一重大史实进行调查的两个主要依据之一，就是笔者《大事记》的有关记述。青海省的调查结论现已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党史界的认可），而长征时却根本就没有西康省（当时，只有四川省辖、仅包括康属各县的西康行政督察区）。西康省是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新县制”、实行“川康分治”时，于1939年才正式成立。我写明1935年2月2日才由国民党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如果不用十几个字作这一交代，长征红军在四川宁、雅、康三属地区（今凉山州、雅安地区、甘孜州，1939年后均为西康省辖）的活动，就不能算“长征在四川”，只能是“在西康省”的活动了。那样，才真正与“长征在川的主题全不相关”了。

《浅见》说，我不应该“写完刘伯承同果基约达歃血为盟时就戛然而止。”我认为，既然是述过去之未详，补过去之疏漏，对于早已“史不绝书”的彝海结盟，在《大事记》中用几十个字作了记述也就行了。我那样处理既不是“为尊者讳”，也不是“为贤者讳”，而是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果基约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既忠于历史事实，又有利于民族团结，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为了顾全大局，又因是《大事记》，我只写了他参加结盟的功，没有提及他是否有过）。现在，既然《浅见》批评我不应把“史不绝书”的彝海结盟在“写完刘伯承同果基约达歃血为盟时就戛然而止”，那么，我就只好在这里把“写完”“歃血为盟时”就“戛然而止”、而不继续写下去的原因多讲几句。众所周知，彝海结盟首先是党和红军民族

政策的胜利，当然，果基约达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个人认为，果基约达在彝海结盟中是立了大功的。但是，结盟才6天，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由100多名中央红军指战员和几百名受地下党领导的抗捐军合队后组建的革命武装，却惨遭暗算。紧接着，许多中央红军干部战士和中共党员被杀，冕宁城西门外一大片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浸透成了深黑色。由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任命的抗捐军政委陈野苹（当时幸免于难、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指出果基约达在袭击抗捐军当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5年9月12日、13日，陈野苹在会见四川省、凉山州和冕宁县委负责同志时，又特别强调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小叶丹（果基约达）袭击了抗捐军”的理由。陈野苹还多次批评了一些文、史著作的作者，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任意拔高历史人物时，不惜捏造史实。陈野苹说：“小叶丹明明是40年代初在‘打冤家’中死的，可是有人硬要说他是解放前夕被蒋介石国民党杀害的。50年代初，有的人甚至捏造小叶丹不仅亲自率领红军游击队、还联合一直与他‘打冤家’的保伍、罗洪家支的武装，与国民党坚持了长达十多年的游击战争。因为这些编造的谎言太离奇了、太荒唐了，50年代后期就不敢再那么说了。可是，这些年又有人要想把50年代初期捏造的那些虚假的东西搬出来，欺骗不懂这一历史的青年和广大读者。他们这样干，难道是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吗？”陈野苹说：“我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历史问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非要分明，功过要分明，功不能掩过，过也不能掩功。写

历史、写党史，对于功过问题，即不要溢美、拔高，也不能缩小、抹煞。”我为了秉笔直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信史，让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曾5次去凉山、到彝海，并向彝海结盟前后的历史见证人（包括与肖华一道帮助组织这次结盟的长征老红军、长征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冯文彬，幸免于难的抗捐军政委陈野苹和健在的其他知情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最后实事求是地把这段历史写进了《红军长征在四川》一书中。受到了冯文彬、陈野苹等历史见证人和许多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评价。《红军长征在四川》一书也获省政府优秀成果奖。看来王怀之既没有弄清这一问题的历史真相，又从来也没有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浅见》说“将青川与平武并列。有误，当时尚无青川之名”。我的原文是“昭化、青川、平武等县城和重镇”，并没有说“青川县”。虽然青川县是民国三十年由平武、昭化二县析置，但“青川”之名早就有了，长征时敌我双方文电中也有，而不是“尚无”。另外，“将江油、中坝并列”，也因原始文电如此，只好照录。这正如长征时西康省并未建立，但文电中早已将它和四川并列是一样的道理。又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是1936年7月5日才奉中央电令，在四川甘孜由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正式组成，但这之前两个多月，在中央的电报中已多次有“第二方面军”的提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浅见》对于编年体的大事记本身历史渊源的解释也不正确：“我国大事记的肇始者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前写的《资治通鉴目录》，是我国第一本大事年表”。——事实上，早在司马光之前一千多年，汉代司马迁修《史记》（特别是其

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等十表）就创造了范围较广的历史年表体例，为以后的史学家效法。而在司马迁之前出现的《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和《汉纪》等，也是编年体的史书。至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更决非是他“编写《资治通鉴》之前写的”。这部294卷的《通鉴》，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卷帙浩繁，不易寻检，所以才提纲挈领编成了《资治通鉴目录》。王怀之和盛明同志所以胡乱解释闹笑话，是对历史常识一知半解和“想当然”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对《浅见》和《工程》的某些材料、观点及导致的结论，大胆申说，直言冒犯，敬请署名“王怀之”和“盛明”的这位同志及党史界同仁给予教正，则不胜感谢。

（《四川党史》1992年第6期刊载此文时有删节）

封面设计: 文小牛

长征在川大事记要

ISBN 7-220-03067-3



9 787220 030673 >

定价: 13.00元